



# 这就是中国

## 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

CHINA NOW

张维为 著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C H I N A   N O W

# 这就是中国

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

张维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张维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ISBN 978-7-208-15979-2

I . ①这… II . ①张… III .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41591号

书 名：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

作 者：张维为 著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5979-2/D · 3452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  
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 目 录

中国力量：中国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中国：不寻常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震撼世界的中国工业革命

“一带一路”：机遇和未来

一出国，就爱国

中国精神：“文明型国家”的底气

盲人摸象读不懂中国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四大“超级因素”

“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历史基因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中国模式：独树一帜的稳健改革之路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

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

中国价值：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

谈谈“中学西渐”

“中西历史比较”解构西方中心论

“普世价值”面临的四重困境

五个视角比较中美民主模式

好民主才是人民之福

西方人权话语的缺陷

“整体利益党”还是“部分利益党”？这才是关键

中国定力：中国人，你要自信

从苏联解体看中国定力

从英国脱欧看西方的制度危机

“美国梦”风光不再，为什么？

中美贸易战小议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从“世纪之辩”到“世纪之变”

后记

# 中国力量：中国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 中国：不寻常的崛起

2019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科技领域，有一家叫作华为的公司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因为美国竟然倾一国之力来打压这家公司。这是中国带给世界的震撼。华为的崛起就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华为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5G领域，在核心技术方面，在确立中国标准方面，都已经赶上了美国，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这使美国害怕了，采取了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对付中国一家民企。但这不仅不能阻止华为的崛起，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只会进一步加速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但这么一个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变成好事。回顾过去20多年，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18年“绑架”华为高管事件，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中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方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这么多年来，我们中很多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一些人表现得十分幼稚，总觉得还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结果发现这彼岸世界是虚构出来的。“孟晚舟事件”暴露出了美国的虚伪和霸道：说好的公正自由呢？说好的司法独立呢？说好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呢？说好的契约精神呢？说好的民主人权呢？统统泡汤了。对于国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思想启蒙吗？对于青年学子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思政课吗？

有人说，是不是中国的宣传太高调，引来了美国的敌视。其实中国人一直只想做好自己的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邓小平同志当年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比不上俄罗斯，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与我们的广东省相当。换句话说，已经长了姚明的个子，还想躲在潘长江后面，那怎么可能呢？而且即使在30年前，在邓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他也明确说韬光养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有所作为。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了，还不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吗？不站出来，谁有能力来捍卫你呢？其实，当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时，就发挥长处吧，把长处发挥到世界级的水平吧。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

我们相信合作共赢，我们本着这样的信念一路走来。但现在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主要国家不信这个东西，只信“老子天下第一”，只信零和游戏。但我想这是历史大潮中的一股逆流，最终它也会清醒过来，认识到合作共赢是唯一的出路。中国人会下围棋，围棋讲究用实力来形成“势”，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势，大势一旦形成，势不可挡。

这70年，中国人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打到了家门口，中国人不得不奋起反击，毛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一仗定乾坤，换来了之后60多年的和平，否则哪有今天的中国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落后，是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的。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乱，中国陷入了一穷二白的境地。毛泽东主席当时曾这样描述中国：“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随之开始了以工业建设为特征的民族复兴，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社会事业的方针。这为后来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比较全面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我们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前30年，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40年的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我们在政治上走过弯路，我们的民生欠账很多，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按照国际标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况，中国的人均GDP甚至低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但多数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四平方米左右。我1983年第一次去泰国曼谷，感觉领先上海20年，我80年代中期去非洲的津巴布韦和科特迪瓦，感觉他们的首都看上去比北京还发达。这就是改革开放历史巨变初期中国的大致状况。然而今天，这些国家怎么和中国比？

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说是“四十不惑”，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所以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飞跃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

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转型经济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这样比较下来之后，我们也许可以更容易地看清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最大的挑战都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在这40年间，中国有7.4亿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有8.5亿人口脱贫。也就是说，世界上近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巨大贡献，世界上的贫困情况将有增无减。有人说我们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这个我承认。但我说一切还是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我曾经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只要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就会对中国的成就由衷感叹。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车20个小时，无论开到哪里，开到黑河，开到海南岛，开到广州，开到重庆，只要不开到海里去，把一路上看到的贫困全部记下来，会少于你在印度这样的典型发展中国家两个小时内看到的贫困。这是不能比的，我们的情况要好很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仅此一点就已经把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甩了一大截。而且我们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比40年前也提高了很多。按照我们现在的贫困标准，今天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也就是两年之内，这些人口都将脱贫。中国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的奇迹，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我在7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过，他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不一样。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是研究发展问题的。他说，中国的东道主老说你不要光看北京、上海，你应该到贵州去看看。于是他到贵州去看了，回来跟我说确实不一样，确实比我们发达很多。他说，你们的贫困家庭，有房子，有地，吃饭有菜。我们那的贫困人口，没有地，没有房子，吃得非常差，还吃不饱。

温饱在中国早已不是问题。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2018年我去过四川的一个贫困县，一位非洲学者也在那里，他跟我说，中国这个贫困县的县城甚至比我们国家的首都还要繁华和漂亮。我去过近十个中国贫困县的县城，基本都是比发展中国家的首都还要繁华和漂亮。

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在甘肃舟曲发生过泥石流，从电视新闻里可以看到，泥石流压倒的房子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空调的，而那只是甘肃舟曲的县城。空调对多数发展中国家首都的居民往往都是奢侈，首先遇到的问题

便是市政供电无法保障空调的使用。所以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应该说我们是全面胜出。当然，我们可以高标准、严要求，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和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经济国家”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不是特别喜欢用，因为它不能准确地界定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就姑且用之。

现在回想起来，感慨万千。二十七八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候，西方一片叫好，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铁幕”国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业绩跟我们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法比，一个天，一个地。我刚才已经说过，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今天大致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今天光是外汇储备这一项——也就是三万多亿美元，几乎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一就超过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总量的总和，这其中包括俄罗斯，包括中东欧16国。

还有就是和西方国家比较。我觉得我们国内一些人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那我们就把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我经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1年我曾和德国《时代杂志》的总编，一位德国资深媒体人，在汉堡市进行过一场对话，他那时刚从上海回去，他说我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了，是不是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美国模式？我说你看得可能不够仔细，实际上上海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今天来看，上海的机场、地铁、商业设施这些硬件全面超过纽约，且不是一般的超过，而是领先15年、20年的水平。

再来看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海人均寿命比纽约高4岁，纽约是79岁，上海在2018年的统计数据是83岁，上海的婴儿死亡率也比纽约低，上海的社会治安更比纽约好10倍都不止，等等。我当时跟《时代杂志》的总编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是认真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美国的长处，但我们也看到别国制度的问题，我们要避免错误。

我经常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发达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这个板块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有四亿多人，这个板块在硬件方面，全面赶上乃至超过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超过美国。软件的关键指标基本上是西方国家的水平，社会治安比美国要好很多。

此外，我觉得还要比较老百姓的家庭到底有多厚。我用得比较多的指标是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我拿2010年美联储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同一年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做的报告相对比，西南财经大学也是用美联储同样的标准做家庭净资产的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家庭和美国的家庭相比，实际上只有一万美元的差距，中国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是66300美元，美国是77300美元，也就是大概50万人民币。美国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拿到中国四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就属于弱势群体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前谁能想到？

有人说你是不是把中国农村家庭给忽略了？我是故意删去的，为什么删去呢？因为我看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它没有把我们农民兄弟事实上拥有的土地算进去，这对我们农民兄弟是不公允的，因为现在土地很值钱。其实，我们哪怕先做个土地虚拟价格的比较，这样再来和美国比较就更加靠谱。但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多了，我国城镇人口有七个亿。这样一比较，差距已经不大，而且这还是2010年的水平，这之后，中国人的财富还在增长，而美国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长。

如果说这个指标可以说明中国经济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一些大型的社会民调则能够揭示中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步。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法国益普索都在中国做民调，在回答你认为你的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问题时，中国人认同自己国家道路的比例最高。以2017年的益普索民调为例，中国有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4%，在法国是1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的“黄马甲”抗议运动持续这么久。2018年，我跟一位极度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 (Bernard-Henri Lévy) 辩论过，他推动了利比亚的战乱，他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我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好你自己国家的事。) 我引用了这个民调，我说有超过80%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没有想一想这中间有多少人因为人权问题而感到不满吗？他拿中国的新疆说事，我说，你们把利比亚搞乱了，把叙利亚搞乱了，你们还想把新疆搞乱？No way!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顺便说一句，现在要了解“黄马甲”运动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可能不用问法国人了，问一下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那里的大数据会告诉你。如果黄马甲继续卖得好，就说明这个运动可能还要继续下去。2020年的美国大选大概也可以在义乌通过大数据来预测了一看哪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太阳帽卖得好。这也说明全球化已经把

中国与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不看好中国，他们说你光是量的增长，没有质的增长。实际上中国质的增长也非常快，包括科研、创新，等等，恐怕中国进步的速度是世界上最最快的国家之一。刚才提到的华为的崛起就是一个缩影。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如中国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设备、智能手机、电网，中国有全球最好的特高压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还有自主产权的5G技术。中国的水电、火电、第四代核电也都世界领先，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几乎都在中国，包括“八纵八横”的高铁工程，包括珠港澳大桥，包括隐形战机、大型运输机、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页岩气开发，等等。此外，中国还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集群、最全面的产业类型，这一切形成了一种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集成效应和辐射效应，所以中国的进步不光是量的提高，也是质的飞跃。

我的结论很简单，通过我们70年的奋斗和探索，应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购买力平价，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具有世界最大的也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所有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还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至少美国做不到。不管我们今天还存在多少问题，我们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起来，我们有再多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和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国际比较，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前行，我们的前景必将更加辉煌。

## 中国的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2019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辞去了部长职务。特朗普的内阁部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人，已经离职的还有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特朗普一个推特让他下台了。被辞退的还有司法部长、退

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环保局局长，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John F. Kelly）、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莉（Nikki Haley）等高级官员。

美国主流媒体的一篇评论说，马蒂斯是特朗普政府中的最后一位“成年人”，他也辞职了，剩下的都是“孩子”了，美国怎么办？也就是说，美国很多人，其实也包括欧洲很多人，都认为马蒂斯是特朗普内阁中唯一心智还算比较成熟的、能够对特朗普的种种冲动型决策作出平衡的人。现在特朗普连他也容不下了，特朗普的内阁中就剩下一批任性的、心智不那么成熟的“孩子”了。某种意义上，我也同意这种看法。以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例。他于2018年10月4日在纽约作了一个被称为“新冷战”的反华演讲。我当时在新加坡，通过电视看他演讲的直播，我看出了两点：第一，这个人不自信，从他游移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不自信；第二，这个人的心智不很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不很成熟。他先是说，中国应该感谢美国，因为是美国一手造就了中国今天的成功，然后又话锋一转，说中国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干涉美国内政，要换掉美国总统，简直匪夷所思。这么多年来，中国要卖出几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大客机。一台在中国生产的iPhone 7，售价至少649美元，但属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占不到1%。中国对美国出口一套售价450美元的西服，中国获得的利润是5%，美国获得的利润是84%。无疑，美国拿了中美经贸合作利润的大头，但美国占了便宜还卖乖，还要对中国打贸易战，想从中国拿走更大的利润。

其实是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美国企业从中国赚的财富未能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惠及多数老百姓，所以就产生了美国富人的财富还在增加，但中产阶级的规模却缩小了的现象。而中国正好相反，虽然我们在中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没有美国多，但我们的制度还是保证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有一段掷地有声的话，可以看作对彭斯那番言论的最好回应。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过程，不仅如此，中国这种崛起最不寻常的地方还在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任何战争，没有侵略和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崛起，这不得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

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以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后期为例，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的年代，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动乱和革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非洲瓜分完毕，其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间断。

在非洲以外，1854年爆发了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侵占印度支那，并于1865年实现了对印度支那的控制。1860年英国与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

我自己粗略估算，两场鸦片战争后，中国给英国的战争赔偿足以让英格兰建立养老全覆盖，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养老金制度。现在我们都懂得什么叫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西方大国崛起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来自血与火，来自战争，来自殖民，而中国则来自自己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气和牺牲。

我们继续讲一点历史。1860年，法国还进军叙利亚，并在拉美干预墨西哥内政，扶植起了一个亲法的皇帝（1861—1867）。这段时间意大利经历了血与火的国家统一（1858—1870）。差不多同一时期，1871年，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惨遭镇压。同一时期，还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场战争宣告了法国拿破仑的第二帝国覆灭，宣告了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

在北美洲，1846—1848年爆发了美国与墨西哥战争，美国获胜，使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大片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今天特朗普总统要在美墨边界建墙，墨西哥人调侃，我们无非是想回到过去属于我们的那片土地。

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阵亡的军人达62万，占交战双方军人总数的30%—40%。但大家不一定了解，美国南北战争也有英国的影子，因为美国南方实行的是奴隶制，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南方的农业，特别是棉花，是英国纺织业和

其他工业原料的最大供应地。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南北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为了维持其工业原料基地与美国力求摆脱对英国依赖的一场战争。

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确切地说是1867年，美国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杀戮。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驱赶印第安人，建立所谓印第安人定居点，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6年，上千万人口的印第安人减少至20万，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当时，中国和美国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美国通过殖民和杀戮的手段无偿获得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产：土地。

美国华人的命运也非常凄凉。1870年时，华人曾一度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帮助美国修建了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和自由。所谓西部牛仔的自由，只属于欧洲白人男性移民，其中多数是欧洲来的穷人。

回顾这段历史，是要看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如何之不易。在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侵略掠夺之血腥，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一千多万人，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本土人口也只有两千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进行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全球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实现的和平崛起意义非同寻常。有一次，我在北京一所大学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讲座，一位同学问我，中国崛起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还大，中国不还是输掉了鸦片战争？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回答的，确实，1840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但中国还是挨打，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大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意识还没有在百姓心中形成，而英国已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所以相比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英国已经具有了当时中国所不具备的许多能力，如民族凝聚力、战争动员力、现代工业能力、现代贸易能力。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在1840年的时候，若中国哪怕有一个省能够接近当时的“现代国家”的水平，比方说，广东省先发展起来了，并接近了英国当时的工业和贸易水平，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意味着至少这个省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这一切足以阻遏当时的英国。今天中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若论国防实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一举全歼了“皇家苏格兰团”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

那次讲座上还有一个年轻人间：中国物质财富方面成就巨大，但你看我们的市民素质还相当差，特别是和日本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说，谈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点历史感。我承认我们的市民文化和素质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千万不要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中国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他们昨天还在田头种地，今天已经开车上高速公路了，这首先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市民文化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在城市里生活，节奏快了，人口密度大了，就要有一些新规矩，做事要排队，上地铁要先下后上，讲话的声音要轻一点，等等。其实，我们的大哲学家、大经济学家管子，早在公元前600多年就说过，“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市民的素质一定会逐步提高，但要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回头看，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还不算慢，而且越年轻的中国人，这方面的素质越好。

另外我还说，如果你要比较中国和日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当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后了一步，便丧失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最后落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成功后，立刻加入了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日本勒索赔款达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偿投资教育、开办工厂、建设城市、扩军备战，日本的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地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到1900年，日本已经基本扫除了文盲，而中国是到2000年才基本实

现这一点，比日本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日本在现代化原始积累和后来发展的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国库空空，中国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综观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之前和“九一八事变”之前，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呈上升态势的两个时期，但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中国最后是从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并终于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经济规模上对日本的真正超越。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是在2010年超过日本的，现在接近日本的三倍。

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不少人把注意力放在人均上，忽略了综合实力超越的意义。经济总量的超越、综合实力的超越也意味着投入科技等各项事业的资金会大幅超越日本。比方说，中国2016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费用为1.54万亿元，占全世界的20%，仅次于美国，超过欧盟28国总和，日本则排在美国、中国、欧盟之后列世界第四，总R&D投入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

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比中国多很多，而中国除了屠呦呦，却没有获奖的呢？其实道理也不复杂，因为诺贝尔奖得奖一般都是奖励二三十年前的成就，具有滞后性，日本在2008—2016年诺贝尔得奖人数比较多，并非因为最近几年日本发生了科技革命，而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鼎盛时期，他们GDP和研发投入冲到了世界第二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将2006—2016这十年，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排在前1%的顶尖论文，中国的论文被引次数已经占12.8%，排在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英国排第三，德国排第四，日本排第五。

我不是说，中国在所有方面都超越日本了，日本还有不少方面比中国做得好，但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自信起来了。40年前，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曾指示随行的央视记者，多拍一下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那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里有电冰箱，在当时的中国这绝对是奢侈品，邓小平同志当时也是希望通过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激发中国人民奋斗和追赶的斗志。40年过去，弹指一

挥间，中国崛起了，物质生活和生活条件全面赶上了，中国百姓的住房条件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新工业革命方面，可能也领先日本了。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的，是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双手干出来的，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应该引以为豪。

## 震撼世界的中国工业革命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在中国，一个地方你隔了半年再去，就发现它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这种精彩，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看到。我们也经常听到另一个说法，中国人一生可能体验过老外几辈子的生活。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何从世界历史的比较中解释这种精彩。我们现在都在谈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从英国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的，那是从18世纪下半叶至今约250年之间发生的，而我思考中国精彩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也就是40年内，可以说几乎完整地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又开始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把中国的崛起称为“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所以今天中国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都经历过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生命体验，这种经历对于多数国人来说，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概括，而且“精彩”还在继续，我们国人，包括“90后”“00后”也会不断体验这种精彩。这使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的时候，被问到：如果你的生命还能再来一次的话，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家？84岁的汤因比毫不犹豫地说—中国。他预感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将改变这个世界。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艰苦奋斗、筚路蓝缕，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腾飞，我们几乎是以每十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过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完成了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多年，我们大致完成了以电力、内燃机、家用电器、石化工业和中高端基础设施等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与西方几乎同步地进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初是追赶，然后是逆袭，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今天世界正处于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和运作的方式。应

该说，中国已经进入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种中国奇迹。我们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是一次完全和平的崛起，这是非同寻常的奇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洲近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如果以英国人瓦特在1776年发明蒸汽机为标志，那么也就是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西方和中国都有不少学者认为，民主、自由、法治等条件引爆了工业革命，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叶，但英国当时已经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击败了它的主要对手西班牙。英国在1588年就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早在1600年，英国就成立了自己向外扩张的“国企”东印度公司，极力拓展自己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活动。英国的奴隶贸易始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也就是工业革命前夕，奴隶贸易达到鼎盛期。从1689年到1763年，也就是工业革命的前夜，英国和法国发生过四次战争，特别是第四次战争，英国大胜，英国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今天的加拿大，获得了今天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已经通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掠夺，拥有超过自己国土面积数十倍的殖民地。英国早已通过蔗糖贸易、奴隶贸易、烟草贸易等成为当时世界综合实力绝对领先的国家。英国已经通过国家力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包括商品、劳力、资本、原材料市场在内的统一国际市场。中国学者文一认为，正是这种巨大的跨国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其他原因，引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换言之，所谓工业革命，它一般有几个特点：革命性的新技术、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和产品销售等。下面我把中国工业革命的历程大致梳理一下。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5年前后基本完成。它有两个标志：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产品很快就占了中国普通消费品的半壁江山；二是1988年开始的沿海开放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世界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走向世界。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场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也很快解决了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剩余劳动力转向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主要靠市场调节；员工亦工亦农，分布点多面广，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无穷变化。乡镇企业大都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其他轻工业。

1987—1988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袭来。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许多发达经济体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中央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人力资源相对便宜，教育水平较高，也有初步的基础设施，科技开发能力也比较强。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所奠定的基础为这个战略的实施，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提供了较好的初始条件。中国沿海地区，当时人口近两亿，与美国人口相当。中央当时大胆地提出，沿海加工业要开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是一头，销售市场是另一头）放到国际市场上。这个名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于1988年初被呈交给邓小平，他写了个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是军人的风格，他的语汇也是军事语汇。“千万不要贻误战机”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个战略的实施，使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为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中国动起来了”。中国人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梦给唤醒了，社会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有个调侃的说法，叫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这显然夸张得厉害，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企业家像任正非、马云，确实在“跑单帮”。华为的任正非，手拉肩扛在三四线城市为香港的公司做代理，推销程控电话设备；马云开了个翻译社，请退休老师帮忙做翻译，赚点小钱，还卖鲜花、礼品、药品等杂货。他曾经就在离上海东方卫视不远的地方到处揽活，人家看着他还有点儿犹豫：翻译这活儿能交给他干吗？所以上海人今天还在后悔，还在讨论为什么上海当年没有留住马云。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勇往直前的初生牛犊，不要小看自我创业的年轻人，他们中可能就有未来的任正非、未来的马云。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我把时间节点放在1995年左右，主要是这一年前后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从国家宏观目标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中国确定了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康”目标，这个目标于1995年提前完成了；二是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业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至少在量的方面，做到了世界第一。同样在1995年前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告别了票证制度，这说明中国“短缺经济”的历史结束了，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顺便补充一

句，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初级基础设施，特别是普通公路、铁路、民航等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我们现在推动“一带一路”时常说，“要致富，先修路”，也是对这个时期中国经验的总结。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致从90年代初开始，我个人认为，大约在2010年基本完成。我倾向于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因为这个谈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继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邓小平的“九二谈话”就像是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号令。1992年前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中国在电力工业、家电工业、能源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城镇化、中高端基础设施等方面出现了全面的需求。这一年，中国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东省提出了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浦东开发开放计划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同一年，中国还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文件，所以1992年经常被称为中国公司的元年，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家群体开始崛起。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标志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及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变。大家知道，中国加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配置，为中国产品开辟了有史以来最广阔的市场。出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西方制造业也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这一切大大加快了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我之所以把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间定在2010年左右，主要是几个指标：一是到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占据世界总消费的50%，铜消费占36%，铝消费占41%；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大家不要忘记，199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仅为2.7%，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就成了19.8%。换言之，中国在2010年成了世界制造之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内部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全面配套的产业链。之后不久，中国在2013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并基本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整个中国亮起来了”。1978年中国人的用电量只有2500亿千瓦时，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电，城市电网不稳定。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用电量已经是4万亿千瓦时，2011年中国发电量超过美国。过去到国外，特别是大中城市，感觉就是人家亮，我

们暗，现在反过来，我们亮，人家暗。在个人层面，我又想到了任正非和马云。当时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已经开始投入独立研发，从模拟通信设备开始，进入数字通信设备，直接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马云还在做翻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当时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一个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谈判，这算是马云有限地参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项目没有谈成，他倒是发现了美国的互联网，这个人悟性了得，回来就搞“中国黄页”。他很自信，尽管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所以马云也是很快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直接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爆发。如果我们以中国首次获准接入互联网的1994年为起点来算的话，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这场工业革命在中国进展神速，中国起初是追跑，然后是并跑，最后在部分领域中开始领跑，到今天应该说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这场革命的见证者，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使用的手机品牌的变迁，从爱立信、诺基亚，到三星、苹果，再到今天的华为等许多中国品牌，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在这场工业革命中，从2G到5G，一路从追赶到超越的见证。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数字通信进入了2G时代，欧洲是GSM标准而美国是CDMA标准，欧美之间PK，中国只能旁观，设备是爱立信的。从3G开始，中国人参与了标准制定，提出了TD—SCDMA，后来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当时中国人做中国标准很有争议，产业链也不成熟，多数国内外厂家也不愿意用。最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中国移动拿了牌照，带头使用。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说用欧美标准挺好的，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制定自己的标准上。现在中国人都懂了，标准竞争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对于中国话语同样如此，中国话语就是在确定中国的政治标准，西方一直以为它可以垄断政治标准，我们在这里坚定地说NO。

好在最终在这场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争中，中国坚持下来了，到4G时代，我们信息产业部发4G牌照的时候，中国三大运营商拿到的都是中国的TD—LTE牌照，这是国家对中国占有话语权的TD标准的重要支持，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向成熟，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到了5G时代，中国的华为公司就开始领跑了。

现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应该说，中国已经超越欧洲，进入了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第一方阵”。中国现在在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微信革命、网购、外卖平台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跑的地位，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元素，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场革命正在改变中国和世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场革命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整个中国连起来了，整个中国快起来了，整个世界连起来了”，还有就是“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率先做到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呢？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简单地讲三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包括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妇女解放等，包括独立的国防体系、初步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等。第二，民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开放，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只要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就去试验，就去做，但绝不盲从。第三，我们的历任最高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技，重视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使中国抓住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下面要讲的“一带一路”也是如此。

## “一带一路”：机遇和未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2019年两会期间，王毅外长举行了记者会，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美国有一些人想和中国脱钩。而想和中国脱钩，就是和机遇脱钩，就是和未来脱钩，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和世界脱钩。我认为这段话说出了中国自信。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公开怀疑甚至诋毁“一带一路”的主要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受他们影响的媒体，我想王毅外长的这段话也可以引申一下，西方大国如果继续排斥“一带一路”，那也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如果与机遇和未来都脱钩了，那么也就与世界未来脱钩了。反过来也一样，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抓住了“一带一路”，就抓住了机遇、抓住了未来，这也就赢得了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总书记把“一带一路”比喻成中国这只大鹏插上了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对中国整个开放空间布局的一个长远的统筹考虑。中国

模式的特点是，一旦认定，马上就行动起来，所以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也是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截至2019年3月，已经有123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也就是说，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信任和支持。这么多国家的认同，就意味着发展的机遇。我记得那天王毅外长一口气举了八个例子来说明“一带一路”给参加国带来的合作共赢的机遇。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些案例。

第一个案例，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非洲东部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建在埃塞俄比亚，是完全采用中国技术和标准建成的。第二个案例，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这是由大型国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建设的，技术难度很大，因为那块海域被称为“恶魔之海”，但中国人硬是把桥建成了。第三个案例，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那是由中国民营企业吉利集团和白俄罗斯合资建设的，生产吉利的博越SUV。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感谢中国帮我们实现了轿车梦。”谁也没有想到，“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企业家李书福，现在已经是德国奔驰公司的最大股东，对他来说，这个在白俄罗斯的项目可能也只是小菜一碟。第四个案例，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现在哈萨克斯坦生产的小麦可以直接通过连云港发往东南亚，这是打通“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案例。第五个案例，东南亚正在施工建设高速铁路，这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高铁建设。第六个案例，在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这为当地创造了将近五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第七个案例，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一条施工难度很高的隧道，使当地的百姓仅用十来分钟就可以坐火车穿越崇山峻岭。这是中铁隧道集团做的项目，也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隧道项目之一，几十公里的隧道要经过七个不同的地质断层，欧美公司望而生畏，但中铁集团硬是把它“啃”了下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程力量的品质。第八个案例，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短短几年间，现在已经累积开行了一万列。中欧班列主要有三条大通道：一条是西部通道，主要连接中国中西部，包括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经霍尔果斯出境；一条是中部通道，连接我国华北地区，经二连浩特出境；另外一条是东部通道，连接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从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经满洲里开往欧洲。

我们现在谈“一带一路”讲我们给别人帮助讲得比较多，实际上我们也应该适当讲讲“一带一路”给我们的企业带来的利益。“一带一路”之所以广受欢迎，

是因为我们奉行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而且中国模式的做法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主要驱动力是市场。只要坚持这一条，不用担心中国当冤大头，企业家会根据市场经济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80多个不同类型的工业园区，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许多都采用中国企业熟悉的“园区+物流+企业+住区”的方法，园区提供法律、物流等平台服务，吸引了很多中国企业，也吸引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中国很多项目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良好的口碑，有了这些，中国企业的合同就不断，西方之所以对中国“一带一路”耿耿于怀，很大程度上就是妒忌。西方指责中国有几个说法，一个是中国给别国贷款，造成了所谓的“债务陷阱”，但中国贷款和西方贷款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贷款大部分是建设性贷款，产生了许多优质资产。还有一个指责是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个在非洲多数国家没有人相信。中国每两年举行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参加这个论坛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比参加非洲联盟自己高峰会的人还要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被西方看作是对“一带一路”持一定疑虑的领导人，最近《南华早报》记者采访他，他说：“我们同中国做邻居有2000年了，但他们从未试图征服我们。欧洲人1509年来到东南亚，两年就占领了马来西亚。”至于西方声称的“债务陷阱”问题，马哈蒂尔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是非常友好的商人”，而那些国家是否从中国借入资金，是他们自己的决定。马来西亚也会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记者又问他，如果只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如何选，马哈蒂尔说：“目前我认为，美国做事情非常反复无常。这时候，我们得接受，中国与我们很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想从中国增长的财富中获益。”

今天美国还在拼命阻拦“一带一路”倡议，但西方的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意大利不顾美国的反对，不久前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是西方七国中率先和中国签署这个协议的国家。此外，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叫它的盟友都不要加入，结果英国带头加入，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加入了，没有加入的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但现在这些国家中也有人在探索是否能够加入。

下面我来谈谈未来。为什么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未来比较自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明型国家”，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9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的主笔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就是“文明型国家正在崛起”（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 “Civilisation State”），他读过我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这本书的英文版（*China Wave: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我们有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我老说，中国人要自信；中国学者要自信，要用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西方。当然，他把我们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泛化了。他是这样说的，西方过去一直宣传“普世价值”，但现在中国说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印度也说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俄罗斯说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土耳其也说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甚至连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保守主义学者也说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应该说，拉赫曼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事。这对我们进行“文明型国家”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我归纳过“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详见后文），现在简单剖析一下“四超”与“一带一路”未来的关系。

首先，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口大约是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迅速扩展，每天都有至少上千名中国的工程师在飞往世界各地。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使中国得以形成全球最齐全的产业品种和最完整的产业链。短短4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消费能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游客。但中国人热爱储蓄的文化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使中国仍然保持了全球最大的人民币储蓄和外汇储备，中国也迅速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中国2018年的国内消费规模已接近6万亿美元，这还是按照美元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消费市场更大。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一切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最重要的、超级规模的人才、商品、资金和市场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会越来越好。

其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具有超强的地缘文明的辐射力。中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自15—16世纪欧洲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力量上升，海洋文明和海权的重要性压倒了大陆文明和陆权。以大陆文明为特征的古代丝绸之路走衰直至消失。迄今为止，全球产业链几乎都是沿着海岸线配置，导致了内陆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衰落。现在以“一带一路”创举为载体，推动互联互通和各项要素流动，中国内陆地区和许多内陆国家从商贸开放的后方一跃成为前沿。例如，欧亚班列使中国的新疆、四川、重庆和河南郑州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和中东欧板块都成了世界商贸开放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正在纠正过去四五

百年所形成的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主导。

如果说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海上文明影响了世界四五百年，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那么“一带一路”创举正开启一个海、陆文明再平衡的进程，它可能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和长远的增长期。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一带一路”可能推动建构一种新的地缘文明，即超越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的零和逻辑，不是以邻为壑，而是合作共赢。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互利合作的过程才能完成。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意味着中国有极为丰富的传统资源来塑造新型的全球化。比方说，与西方历史上近千年的宗教战争和冲突不同，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关系。中国宗教有非政治化的伟大传承，这些都为今天的全球治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处理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宝贵的传统资源。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对于其他传统和民族更为尊重，中国也因此而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中性的公共产品，在国际事务中也更能主持公道。

这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过去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航空联系，大都要经过欧洲国家中转。你从西非的加纳去东非的肯尼亚，要到伦敦转机，这是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以自我为中心所遗留下来的非洲航空秩序，但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国家内部建设现代交通网，包括高速公路网、铁路网和区域航空气网。西方媒体散布的“中国正在非洲搞殖民主义”的谣言也因此而不攻自破。

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模式交织所形成的许多中国理念和实践，如民本主义、合作共赢、协商民主等已经成为引领“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民本主义意味着“一带一路”高度重视改善民生，政策要落实到民生方方面面的改善，“一带一路”所提倡的“要致富，先修路”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和实践的产物。“合作共赢”的背后是中国文化中“推己及人”“同舟共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伟大传承，而“一带一路”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堪称新型国际关系的黄金法则，近乎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信奉的“协商民主”理念和实践。

2019年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做了演讲，当时我在现场，她已经或多或少准备离开政治舞台，所以她的讲话也越来越直白。她当时说，中国已经崛起，我们西方要正视这个事实，要在国际治理的体制安排中，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改革中，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们在这方面走得太慢，所以中国人就决定自己开始干了，他们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他们大规模地推广“一带一路”，等等。当然，这是她的一家之言，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国际治理体系需要与时俱进。旧的体系需要改革，否则无法适应中国和整个非西方板块的崛起。比方说，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的需求，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却迟迟不予以回应，而中国顺势而动，切中时弊，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一下子就得到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这也使我想起了1987年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所说的话，当时我是翻译，邓小平说，“你们南方委员会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南北问题还有南南问题。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五分之一越来越富，五分之四越来越穷。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人类就没有进步。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这番话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对西方也有好处。但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玩赢者通吃的游戏早已上瘾了，要改邪归正，谈何容易。但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该讲的理一定要讲，而且中国人这么说，也这么做。中国人相信，最终一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崛起的中国今天有实力自己带头这样做，结果是中国通过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带头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化，许多西方国家一下子不知所措，全面地不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比人强，一些西方国家也已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与中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 一出国，就爱国

2014年，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中国人，你要自信”。我当时讲了一个故事。一次，我在上海一所大学里做演讲。讲完之后与听众互动，有人提了个问题说，张老师啊，你的演讲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但是现在很多人要移民，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留在中国。下面一些听众也笑了，觉得这是很刁钻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问对人了，我认识的海外华人移民太多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我做过小小的研究，中国人出国之后，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概率最保守的估计是70%，我说这个效果比劝他们不要移民还要好。如果你想移民纽约，我给你支个招，因为我对纽约非常熟悉，可能不亚于

上海。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出发，然后降落到纽约的任何一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作从“第一世界”的飞机场到“第三世界”的飞机场，美国的基础设施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建的，怎么和中国的比？我还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你尝试一下，看看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住一夜，尝试一下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住过，确实很害怕。我有个朋友在纽瓦克的医学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这医学院到底质量怎么样？他说不错。我又问哪个专业最好？他说枪伤科。你只要对美国这个国家有点儿常识性的了解，就知道，这个国家内部还分“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那对不起，你的命运很可能是非常凄惨的。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留学生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的“第二世界”，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你可以问问他们，过去20多年，实际收入有没有增加？如果买了房子，房子有没有增值？对未来在美国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在有些方面是不错的，但我们要平视美国，既要看到美国的长处，也要看到它的短处。

如果今天还要让我再做一个类似主题的演讲，我可能会说，“一出国，就爱国”，现在这个比例应该比五年前更高了，至少有80%，因为我们许多“90后”“95后”都加入了“出国看一看”的大军。“90后”“95后”大概是中国最自信的第一代，他们没有贫穷中国的记忆。他们还是“手机的一代”，他们一出国，就会发现，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他们今天抵达美国，会发现美国是个“五没有”的国家：没有高铁、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没有共享单车、没有安全感。而这一切在中国都已经是标配了，这背后反映的就是中国全方位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

这使我想起了四年前，上海有一个研究机构请我做一个讲座。他们正在做一个关于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知道我走过世界100多个国家，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很乐意，然后我就说，能不能让我看一些其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的研究。我看了两份材料，但看了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是，我们可能过分谦虚了。因为我看到的研究材料，都是说上海跟纽约的差距有多少，跟伦敦差距有多少，跟巴黎差距有多少。我说，我在这三个国际大都市都生活过，我自己感觉不完全是这样的。上海在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比人家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加实事求是一点儿呢？这样你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你的竞争对手，看到人家的长处，也看到我们的长处，所以我就提了个建议，我说能不能以我个人为例，讲讲我在国外长期生活的时

候最怀念上海什么，这些令人怀念的东西可能就是上海的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个城市文化建设规划，实际上首先要考虑这个地方、地区人民本身的文化偏好。毕竟我们城市的未来首先是要让本地的百姓，让中国的百姓感到高兴和幸福。所以我进行了一些横向比较。当然，这里只是用上海作为一个例子提供一种思路，我们也可以用成都、用南京、用自己的家乡，来进行对比。目的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特别是看西方世界，从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先谈硬件。上海全面领先这些城市—纽约、巴黎、伦敦，在硬件方面是明显地超过，比如机场、码头、地铁、高铁、商业设施等，都是如此。

在软件的关键指标方面，上海也是全面超越纽约，与巴黎、伦敦也有得一比。上海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水平、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都比纽约的数据要好，其中人均寿命上海比纽约高出四岁。这些指标与巴黎和伦敦比，多数也不相上下，上海的社会治安比它们都好。从涉及一个国家的文化偏好的角度，我们还可以比较如下这些方面。

一是餐饮文化。我说“一出国，就爱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的味蕾实在是太发达、太丰富了，多数国人到国外一下就感觉到这个差异，国外吃的东西怎么能和中国比，落后至少一千年吧。我们这么多留学生一出国，就开始怀念自己大学的食堂，本来在国内念大学的时候还对食堂说三道四，出国之后就在想“哇，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吃一顿”。中国是“百国之和”的国家，历史上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光是主要菜系就有八个，其他地方菜系更是数不胜数。我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欧洲最好的菜系是法国菜系，但中国八大菜系中拿出任何一个菜系，可能都比它丰富多彩。因为法国菜是法兰西民族一个民族的菜系，而中国作为“百国之和”的国家，它的菜系都是由历史上许多菜系混合而来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精彩性，一般文化是没有的。

跨国城市比较有一个指标是人均餐馆的数目，人均餐馆数目越多，这个城市的餐饮指数就越高。但我认为光这样比是不行的，应该加入中国人的文化偏好。比方说，不能光是比较餐馆的数目，还要比类型，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天天吃热狗、汉堡、麦当劳，中国人食不厌精，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所以要比较餐馆种类的丰富性，这个维度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

另外，中国人亲朋好友聚餐，喜欢有个单间。在中国，餐馆设单间是普遍的做法，稍好一点儿的餐馆都有单间，但国外设单间的餐馆非常少，大家都坐在大堂里就餐，大概连中国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所以说，如果我们比较城市的餐饮水平，把餐肴的丰富性和餐馆的单间数也放进去，餐饮指数就能够反映中国人的文化偏好了。

我只是用餐饮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进行任何比较之前，在标准设计上，要尽可能考虑一个民族的文化偏好才有意义。我们自己制订城市规划的时候，更要全面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偏好，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以人民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二是家庭文化，中国人为家庭所做的付出远远超过西方人。我几年前曾参加过一个内部座谈会，讨论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当时有一位从事电影国际传播工作的官员说，中国电影走不出去，为什么？因为老外想看的中国电影就是功夫片、武打片，其他片子他们没有兴趣，我说不可能啊！我记得20年前我在纽约就看过一个电影，叫《喜福会》。它讲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三个母亲跟她们的女儿讲自己年轻时候的往事，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女儿听得入神，然后每天都讲这个故事，电影内容就这样展开了。我边上的美国老太太看了以后流泪，她说这种场景在美国早就见不到了。这背后就是西方社会，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用中国人的标准看它的社会结构，已经属于社会解体的结构。我以2014年的数据为例，在美国的家庭结构中，传统家庭只占整个家庭总数的19%，所谓传统家庭是父母+孩子。其他80%左右的家庭叫非传统家庭，非传统家庭包括不结婚同居的、没有孩子的、同性恋的，还有大孩子生小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家庭，有研究认为这种家庭缺少父爱，是美国犯罪率高的一个原因。而在中国，传统家庭还是主流。我们把中国人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拍成好的影视作品，可以打动好多老外。

三是市井文化，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习近平总书记主政后第一次见记者就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想把每天平平常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上海叫弄堂文化，在北京叫胡同文化，下棋的、打牌的、泡茶的、练太极拳的、早锻炼的、晚上跳广场舞的，等等，这种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你在国外是看不到的。比方说，把中国的广场舞拍摄出来，一定会触动、感动很多老外。我碰到很多老外看到中国的妇女跳广场舞就激动，说50来岁已经退休了，生活这么丰富多彩，在国外得工作到六七十

岁。很多妇女在家中还掌握着财权，“大妈”这个词现在已经进入英文的金融词汇了。为什么呢？就是前两年华尔街分析师认为国际黄金价格要跌，中国大妈说不会，她们认为金价要涨，一起买黄金，金价就涨了。这背后实际反映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

四是商业文化，上海的商业大概是世界最便利的，市区步行五分钟就有24小时的便利店，现在还有淘宝、京东等网购。中国现在每天的快递包裹数量超过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快递包裹数量的总和。这是一场“线上、线下”的消费革命。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欧洲多数商店周末要么关门，要么缩短营业时间，中国人觉得很不习惯，中国人觉得商店就应该开，每天都开，至少开到晚上10点钟。网购更是希望快递明天就送达，但这在全世界都是奢侈，在欧洲送货是论周算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周末不送，节假日不送，而且费用很贵。如果你要加快速度，那还要增加费用，一般是加倍。中国许多“剁手党”每天都要下单，可能一周下的单比老外一年下的单都多。碰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你可以以年为单位来问他们，你去年网购了几次，他会告诉你，三次、五次，多数可能不超过十次。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怎么能以年为单位来问，以周为单位可能还可以，而对“剁手党”，要以天甚至小时为单位来问他们的。

五是与网购有关的一个大背景，这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移动互联网方面，中国领先全球，而且不是一般的领先，是甩人家几条街。“一部手机，全部搞定”，订机票、酒店也好，聊天也好，玩游戏也好，公司的业务也好，付款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可以在手机上实现，非常方便。这么多的功能都整合在微信等平台上，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做不到。今天中国的手机支付数量已经是美国的70倍。“90后”一出国就爱国，与手机文化有关。一出国，你在中国可以享受到的手机便利大大减少。一位台湾的朋友习惯了大陆的手机便利，说回到台湾好像回到了原始社会。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其实也与中国文化有关，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本来就有很强的圈子文化，中国人可以随时随地拉一个群，拉几个群，西方文化会认为你拉群，要征得他的同意，否则就属于侵犯他个人的隐私权。中国人在这一类问题上开放得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文字。中国的文字比其他国家的文字更为凝练，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中文能够处理的信息要远远多于西方文字……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红色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仗打出来的，所以红色文化是很重要的文化传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台湾的一位资深学者，他研究国共关系，研究为什么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搞清楚了，国共最大的差别是你们共产党有红歌。他说我们没有，国民党的歌都是软绵绵的，国民党党歌也不提神。现代社会里，精神低迷的人比较多。我在国外教书的时候，有的外国学生会告诉我，他有时要靠吃药来提升精神。我心里想，这样的人要是到中国，和大家一起唱唱红歌，也许就治好了。那些歌曲曾激励过整个民族去抗争。红歌背后是一个民族的阳刚之气。

我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有人问我中国模式能不能照搬，我说很难，也没有必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仗打出来的，我们有独立的国防体系，独立的科技体系，独立的政治体系，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对美国说NO的国家。不具备这些，就无法拥有中国模式。

我走遍全世界，接触过各种文化，尊重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但中国人有几个文化特质与其他民族是明显不一样的。一是中国人的勤劳，中国人到哪里都是最勤劳的。我们现在为什么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么快，因为中国人比人家勤劳。只有中国有这么勤劳的农民工，这么勤劳的快递小哥，换一个国家的人，你给他钱，他都不干。

二是向上。不管到哪里，中国人总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民族没有这个特质，中国的崛起也离不开中国人的这种特质。

三是总体的平和，比方说，晚上突然停电了，纽约停电，巴黎停电，上海也停电，没有任何警察干预，治安情况一定是上海最好，纽约最差，巴黎其次，这就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可能都不用加“之一”。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你在美国可以吃完饭散散步？饭后散步在美国多数城市都是奢侈。比方说，纽约市除了一些重兵保护的旅游区，像时代广场等，其他地方你是不能随便散步的。巴黎是个好城市，但现在治安非常差。当地华人说现在就两种华人：一种是被抢劫过的，一种是将要被抢劫的。纽约市长在2018年10月说过，过去25年纽约第一次实现了连续一个长周末从周五到周日没有枪击案，但到第四天又有了。相比之下，中国这种安全感，不仅仅有我们人民警察的功劳，不仅是高科技的功劳，而且还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上崇尚和平，不崇尚暴力。在中国，你可以开车到任何一个

村庄，你都感觉是安全的，你可以和当地的老百姓交流，你可以买当地的土特产，但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都是奢侈。安全与和平像空气一样，你生活在其中感觉不出来，但一旦出国，你就开始感觉到了，良好的秩序、社会的安宁是多么一种奢侈。总之，你在这个世界上走的地方越多，你就会越热爱这个国家，享受这个国家的文化。

# 中国精神：“文明型国家”的底气

## 盲人摸象读不懂中国

读懂中国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如果按照人口来算的话，中国大概是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规模，欧洲国家平均人口是1400万，而中国是14亿。所以解读中国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每个人摸到的都是象的一部分，他摸到象的耳朵，就说象的形状像一个大扇子；他摸到象鼻子，就说象是一根弯弯的圆筒。从外界看中国，有盲人摸象的问题，其实中国人看自己的国家，也有这个问题，你看到的可能永远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一般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经济总量很大，通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近三倍于日本；但是我们一定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的人均GDP还比较低，排在世界第70位左右。一会儿是世界第二，一会儿是世界第70位，对于学过辩证法的中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老外大都没有学过辩证法，总认为不能一下子全球第二，一下子又全球第70，你的弹性空间有点太大了。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究竟如何从宏观上读懂，真不容易。打个比方，这有点像天气预报，你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35℃，谁都相信，因为这个国家非常小，面积是北京市的 $1/23$ ，上海的 $1/9$ 。但你要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平均气温35℃，谁都找不到感觉，因为国家太大了，东北冰封雪冻之时，海南岛还是烈日炎炎。

我还可以打一个比方。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房价贵，但突然有个人说中国房价不贵啊，2016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不到8000元/平方米，你说他讲得对还是错？所以究竟怎么读懂中国，我觉得还真需要在指标体系上做一点儿创新。我们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哪怕是一些规则简单的运动，比方说举重，也分重量级、轻量级等不同的级别。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复杂性比举重不知要高多少倍，怎么可能简单地用人均

## GDP这一粗糙的指标解释清楚呢？

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GDP总量，是根据我们的人民币和美元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你换一个叫作“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来进行比较和评价，也就是算算某种货币事实上能够买到多少东西，算算老百姓用这种货币能把多少经常用的商品放在篮子里，结论就与人均GDP之间的比较相差很大。英国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他做长时段的、上千年的购买力平价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比方说，我们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是2010年。但是他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199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经超过日本了。麦迪森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前就预测过，他说根据购买力平价，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结果在2014年的时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依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除了官方汇率的计算方法之外，还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其实，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统计方法，但我个人认为，相对而言，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比官方汇率计算的方法可能更接近真相。

“中国经济总量比较高，但人均GDP还比较低”，这种解读方法，也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指标在国际上的排名总体上远远高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排名。

我多次提到，当下中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是可以和美国、欧洲比一比的。实际上中国发达板块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已经超过美国的中位水平了。整个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位净资产均在2007年处在最高值，然后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而一路走低，到2013年的时候，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中位净资产是12.2万美元，整个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当然更低，也就7.2万美元。如果说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上限，一个是下限的话，那么折成人民币，相当于50万—84万人民币的区间，我认为中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是可以与之有一拼的。美国这个水平如果拿到中国的发达板块进行比较，那恐怕有相当大的比例都属于弱势群体了。所以按照这种评价指标比较下来，结果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资料全都是公开的，而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敢相信中国人可以比美国人富裕。其实哪怕不看这些指标，只要在美国生活过，就会知道，中国很多普通家庭比美国的普通家庭更为富裕。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人均预期寿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指标。北京、天津、上海、浙江，都是80多岁，均超过美国，美国是79岁。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这四个省级行政区，加在一起的人口是1.5亿，这就是说中国有1.5亿人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美国了。吉林、辽宁、山东、江苏，以及福建、广东、海南，还有山西、陕西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和美国相当，为77—80岁。这两部分加在一起是5亿人，也就是说中国有5亿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和美国相当，甚至超过美国。

还可以比较一下社会治安。对于这个指标，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就是命案。中国的命案发生率，在2017年是每10万人0.81起，是世界最低之一，并且这个纪录保持了四年。中国的命案发生率低于公认治安比较好的日本和瑞士，大大低于美国，美国的命案发生率几乎是中国的六倍。

还有一个指标是民调，其中一个民调是统计民众总体对国家的经济、国家的状况是否满意。这个民调是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不满意度是11%，美国是64%，其他国家，如希腊和法国不满意度是80%—90%。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有一定权威性的国际民调，法国益普索于2017年公布了25个国家跨国民调结果，在被问及“你的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时，有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美国为34%，法国为11%。

我举这些例子想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我们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人均GDP不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总体还不错？

我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可以简单地比较纽约和上海以作为说明。这两个城市我都非常熟悉。如果按照官方统计的人均GDP，纽约比上海至少要高四倍，但是实际在纽约生活的话，就会发现问题。上海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比纽约家庭高，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比纽约高，上海的社会治安比纽约好，并且多数上海人对自己城市的未来比纽约人乐观。此外，上海街上开的车比纽约的好，上海人用的手机、家用电器也比纽约人的好。所以我们能得出结论，即使我们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上海在人均GDP只有纽约四分之一不到的情况下，实现了比纽约好得多的社会指标。这只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真的成功了。

当然，还可以有第二种解读，那就是除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之外，恐怕GDP的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方法与美国人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很多美国

人统计的东西我们没有统计进去。中国住房自有率是世界最高之一，而国外GDP统计中很大一部分是房租。中国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进入GDP的只有物业费，房产本身哪怕升值了几倍，只要没有买卖，就不会进入GDP的统计。中国农村的许多经济活动也是不进入统计范围的。过去40年，农民兄弟的房子从土房变砖房，变瓦房，变楼房，这当中很多的活动，包括劳务等，是没有计算进GDP的。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街头小贩等非正式经济活动，我们是放水养鱼，根本不计算这些经济活动，而美国是全都计算的。像意大利，连贩毒、卖淫都计算到GDP中去。中国现在新经济的规模居世界第一，手机支付的交易规模是美国的70倍，这一类经济活动现在也没有完全统计到GDP中去。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规模以上企业”的概念，但西方一般不用这个概念。总之，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现在的统计方法可能低估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总量。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从西方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的指标，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创造的，而我们很多学者在使用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靠这些西方指标，恐怕是会误读中国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但基尼系数能否准确地读懂中国呢？西方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7，所以不少学者推测中国要进入动荡期。但我们需要仔细看一下基尼系数的定义，我们会发现它计算的是货币化的收入，以中国相对弱势的农民来说，他们货币化的收入不多，但他们事实上拥有土地，拥有房产，而这些都没有进入基尼系数的计算中去，如果计算进去，就不一样了。另外，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刚才讲了，人口是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规模，传统定义的基尼系数对于计算中国这样超大型人口的国家，究竟有多大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即使我们采用基尼系数这个统计方法，但把人口规模缩小，比方说，分省来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在一个省的内部，基尼系数大都还在比较合理的区间。换言之，基尼系数的适用性可能与国家的规模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个指标是用出境人次用来衡量国家开放度。我们现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出境游人次是1.3亿。出境人次的统计标准是现代国际法，以之来分境内、境外类型，但事实上欧洲大都是小国家，我们从北京飞到上海是1小时40分钟，这个时长在欧洲要飞过十来个国家了。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看的话，那么，凡是有能力乘高铁、乘飞机的，都可以说是有出境能力的。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看到的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自己从来不用这个概念，因为它偏颇得厉害。世界银行的报告里说，现在全球仅有13个经济体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变成了发达经济体。这个清单中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十多年前人均GDP就超过北京、上海，是人均两万多美元，但这个国家的首都，十年前的时候，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只是因为这个国家突然发现了石油，这些石油由几个家族控制着，引来了外国公司投资，从而一下子人均GDP就很高很高。其实这样的国家离现代化还差得很远很远，而中国的发展水平早就超过了它。世界银行报告中还提到一个超小型国家，叫毛里求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岛国，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这个国家也越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像这样的国家靠一个旅游业就可以把GDP撑起来，但如果由于某个突发事件，让旅游业受到打击，它马上就又变成发展中国家了。

所以跨国比较，要有“规模”概念，否则连读懂中国的门恐怕都进不了。一个国家大到一定程度，大到人口等于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地步，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一个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的国家，不能用如此简陋的方法进行跨国比较。对用西方发明的这些指标得出来的结论，也要有所保留，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才行。我们要进行指标体系的创新，唯有这样才能读懂中国。考虑到规模的话，像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虽然它靠旅游业就可以一下子人均GDP看起来比较高，但这样的小国通常也是超级脆弱的。甚至连新加坡都很脆弱。一位新加坡政要曾对我说过，新加坡是如履薄冰的国家，虽然人均GDP很高，但要是来个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事件，新加坡恐怕就没有了，它的经济会被完全毁掉。所以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也有大国的优势，我们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最终总会亮起来，这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记得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陈平教授曾经说过，世界银行把大小完全不同、类型差别如此巨大的国家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好像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一样，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标准看，世界银行的这种研究是不严谨的。但即使退一万步，我们就按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来进行衡量，中国的发达板块早就超越了人均GDP 1.2万美元，也就是说早就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中国的其他板块只要向中国的发达板块学习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单列出来，这个衡量方法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实际

上，低收入有低收入的陷阱，中收入有中收入的陷阱，高收入有高收入的陷阱。过去数十年，西方话语创造了名目繁多的“陷阱”，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用中国道路的眼光来看，过去数十年全世界最大的陷阱其实就是两个，即“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一个低收入国家或社会一旦陷入这两个陷阱，大致结局就是走向混乱乃至战乱和绝望，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或社会一旦陷入这两个陷阱，基本上就是从希望走向失望，我们的台湾就是这样的情况；同样，一个高收入国家或社会一旦陷入这两个陷阱，基本上就会经历失败或走衰，今天欧洲很多国家和美国就是这样。凡是在国家崛起过程中能克服这两个陷阱的就基本成功了，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读懂中国和世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定要跳出西方话语。一个中国学人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正在到来。以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为例，西方主流政治学者这么多年来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使然外，西方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本身也存有大量缺陷。它们离真正的科学相距甚远。西方主流政治学者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没有预测到中国崛起，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上台；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没有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社会科学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数学模式，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极端丰富性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学界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一个“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伟大时代已经来临！

要读懂中国崛起，我们要对中国有一个整体把握，否则就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我自己主要采用三个方法：一是看大数据，看比较权威的大型民调，而且要多个数据比对着看；二是要实地考察和调研，只是坐在书斋里看数据，经常会错得离谱；三是把中国分成板块，看板块和板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着重说一下第三点。如果粗粗划分的话，中国由两个板块组成，一个是巨大的发达板块，其硬件和软件的关键指标，几乎都达到甚至超过多数西方国家的水平，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个板块不是所谓一般发展中国家，因为只要实地考察过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0%，而中国已经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非洲是50多岁，印度是60多岁，而中国农村都是70岁以上，所以我们这个新兴经济板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板块。过去十来年，中国这一板块的总体增长速度高于发达板块。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这两大板块之间形成了高度良性的互动，我叫作“ $1+1>2$ ”。它不

是我们有些人所说的，欧洲与非洲的关系，这么讲的人肯定没有真正去过非洲。实际上，我们中西部地区这些年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早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我接受过《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我说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不要把这个钱用在军费上，中国不要和美国打仗，要打的话，美国也没有赢的可能。关键是美国要把这个钱投入到改善基础设施上。美国的基础设施太落后了，真的要好好改进。我不是拿上海的标准这么说，去我们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看一看，去我们重庆看一看，你会感到震撼。

话说回来。实际我们在一个省的内部往往也有两个板块，一个是发达板块，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板块，这两个板块肯定也不是欧洲和非洲的关系。中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有规模效应。如果发达板块更多地代表了质量，那么新兴经济板块就更多地代表了数量，两者一结合，便实现了良性互动，中国因此而崛起得非常快。西方老是用平均法，那是静态的，再看中国两个板块的关系，这才是动态的，这种良性互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非常大，中国发展的机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很多静态地看是劣势的情况，动态地看，其实都是我们的优势。

总之，要读懂中国，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许多研究要超前进行。中国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在指标体系方面，要进行大量的、原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好。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整体把握，从而形成强大的定力。

##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老是读不懂中国，除了上节提到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使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在数千年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家。大家可能还记得，2016年年初的时候，德国时任总统高克在上海同济大学做了个演讲。高克原来是东德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所以他在讲话中反复影射中国像东德，侵犯人权，等等。这种心态不少西方人都有，他们把中国看作一个“放大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我们和欧洲学者有不少交流，了解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也经常指出他们的这

种盲点和愚昧。我经常说，中国和东德之间有几个差别。第一，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而东德当时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中国今天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每年出境游人次达1.3亿。第二，一些西方人还想当然地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比喻成东德和西德的关系，认为台湾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以为大陆人羡慕台湾，甚至会像当年东德人涌向西德那样。但我告诉他们，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正好相反，如果一定要像一些西方人那样把一切都政治化，那么今天用脚投票的是台湾人。估计有50万台湾同胞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工作、学习、生活，在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大约有200万人—要知道台湾的人口也只有2300多万，不如上海人口多。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想把这样的问题政治化，但西方许多人喜欢政治化，我们也只能奉陪了。我曾对台湾的前景做过不少预测，其中一个预测是台湾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之后的发展趋势是，从希望到失望，然后到更大的失望，如果没有大陆的帮助，将走向绝望。过去20来年台湾的演变，不就是这样吗？坦率地说，以台湾今天的制度，不要说与大陆竞争，连上海都将竞争不过。

第三，从中国国家特质的角度讲，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观点是我八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正式提出的。那一年我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其中阐述了这个观点，该书销量过百万，译成近十种外文版本，海内外反响总体很好。这也许从一个角度可以说明，许多人或多或少地认同“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这种解读饶有兴趣。

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呢？“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种特质决定了她的与众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特质，就像基因那样，决定了中国今天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我们都应该知道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但除了中国，另外三个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今天的埃及人跟法老、跟金字塔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同一种民族，不是同一种血缘，不是同一种文字，今天的埃及人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后，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而中国人是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我们的文化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文明型国家”，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概念——“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几乎就等同于“现代国家”。它包含了我们

今天熟知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清晰的边界，拥有国歌、国旗、国徽，等等。

民族意识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需要建构的。比方说，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当时当地的华人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更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有意识地推动形成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历史上，欧洲国家大都是宗教国家、家族国家，互相之间无休止地打仗，血流成河，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使日耳曼人口几乎消失了四分之一。最终于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此欧洲开启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亦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王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推动形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意识。结果法国就具备了超强的现代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击败了普鲁士。后来，铁血宰相俾斯麦远交近攻，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形成现代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加入欧洲列强，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作为传统国家的中国。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历程。传统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和宗法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由知书达理的乡绅处理村里家族间的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缺少国家治理的技术手段，更多地依赖道德教化来实行统治。

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小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后的1895年5月，严复第一次著文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朝野上下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又进一步道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

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民族融为一家，形成了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梁启超指出了孙中山最初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隐含着大汉族主义。后来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

梁启超曾多次感叹，传统中国的中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几乎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也没有现代财政，老百姓更是没有国家的概念。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是四分五裂的中国、内战不息的中国，是一大批自治的部落，上面加上一个国家的名称而已。“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国、家室的总称，即“一姓之天下，非万姓之天下”。费孝通说过：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回想甲午战争的时候，那还是“朝廷的战争”，甚至被称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朱自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国土，一扫我们民族的百年屈辱。今天我们更能理解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更能理解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说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一个觉醒的、高度团结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了。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我还可以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他从大历史观出发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他的

主要观点是：从孙中山的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看作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整体。他认为，民国时期，初步建构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包括各种现代政府的机构设置，但这个结构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政治精英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今天若到贵州山区扶贫，只要给贫困户一张银行卡，现在还可以绑定手机，国家扶贫款就可以直接打到他个人的账户，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数目字管理”，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做不到。黄仁宇还认为，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重构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监察、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支撑和制度支撑。

换言之，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古老文明所形成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这就是我今天谈的“文明型国家”的真正形成。

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及三位学者。一位是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他把中国称为“文明国家”，英文是两个名词，civilization和state，中间是一个连接号，表示两者属于等同的概念。他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这句话讲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但它的潜台词是，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法治、现代的国防、现代的经济，等等，换句话说，白鲁恂用这个词时，更多地带有负面意义。

第二位是英国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先生，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

式，他自己也告诉我，这不是他的本意，但出版商认为这个名字有利于书的销售。与白鲁恂不一样，他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中性和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肯定。他认为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特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

但是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两种特性之间会有某种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比方说，他认为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比方说，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某种挑战。

第三位学者就是我自己。我比马丁·雅克更往前走了一步。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我在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慎重结论。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既是古老文明，也建成了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国家”，翻译成英文是“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表示“文明型的”，修饰后面的“国家”这个名词。“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白鲁恂的“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要积极得多。

我认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这种“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

我多次做过这样的比喻：这就像汉语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时，不会以英文世界的喜好而改变自身；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了后者：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美国可以借鉴的东西也不少。

话说回来，为什么西方老是误读中国？因为西方总是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话

语来解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比方说，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西方主流政治学者演绎的发展逻辑是这样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走向民主，而民主的概念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这种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历史观是单线条的，最终发展到西方政治模式终结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这也是西方老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放大的东德”的深层次误区所在。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首先，历史上它曾长期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有重要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中国开始落后了，这种落后有其深刻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又迅速地赶上了，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西方，这种赶超之所以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一与原因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比如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今天仍然被十分看重，即政治机器不能空转，政府要致力于改善百姓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中国今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忽视民生也是今天西方模式走下坡的主要原因。

这背后反映的是两种哲学观，一种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单线发展观，认为西方代表了最好的制度，历史发展到西方模式就终结了。另外一种是认为历史上存在各种发展模式，它们之间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互相竞争的，某一模式即使过去很好，但骄傲自满，就会停滞，就会落后，其他模式就会赶上来，历史进程是多线的，是动态的。

以多线历史的角度看，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崛起的中国，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必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和整个人类的命运。

## 四大“超级因素”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提“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我说很简单，首先，我认为它揭示了中国崛起的逻辑。中国当代的制度安排继承和借鉴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政

治思想、治理原则，这使得中国可以克服民族国家等西方话语中的诸多问题，实现中国当下不寻常的崛起。

第二，这是一个事实阐述，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的叠合体。

第三，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话语要有底气，要有点儿派。一个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又融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能不厉害吗？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进博会”演讲所说的：“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中国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的认可，以后很可能是中国认可不认可西方的问题。

“文明型国家”的四个特征，我称之为“四超”，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 第一，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习惯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说法，但仔细再想想，这不是一般的多。我们每年都有春运，以2019年为例，春运时有近30亿人次在路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概等于把整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和俄罗斯、日本的人口数量加在一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口众多，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的最大机遇。做产业的人知道，能在中国做到最大，你在世界上可能就是最大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这样的人口规模下，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

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普通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400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人口之和。相比之下，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印度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那种高度的文化同质性，也就是相同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那种凝聚力。印度曾经出现过自己古老的哈拉帕文明，但后来中断了。印度历史上动乱不断，比较长的统一时期是从19世纪开始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语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

总人口的10%。

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而且拥有相当的生活质量。

中国崛起所产生的超大与超强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国可比。中国的制造业、电子商务、国内外旅游、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流、高速铁路、人工智能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一旦改变自己，往往就能产生改变世界的效应，甚至引领世界的发展，引领有关标准和规则的改变。

比方说，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居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产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在下一代汽车也就是电动汽车方面，全球汽车制造商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增加3000亿美元的支出，而其中近一半预计将投向中国。世界汽车巨头几乎都认为中国市场代表了新一代汽车产业的未来。

再比方说，现在世界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中国的人口数量和教育水平，意味着我们的大数据远远多于其他国家。有一种说法是，工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石油，信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大数据。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70倍，中国人每天创造的数据，无论广度、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对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工业革命、新科技革命意味着什么？对未来世界许多产业的标准确立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影响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 第二，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亲西方势力主导的所谓“民主化”，俄罗斯还会不断地解体下去。

印度是人口大国，但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疆土内的整合程度也远不及中国，许多反叛运动还没有平息，种姓制度也阻碍了人口流动和社会活力。

钱穆先生曾经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松散组成，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20来万，小于中国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从来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罗马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3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西汉相当，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中国当时已经有了郡县制、户籍制度、编户齐民等。而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很难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为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一般认为到了16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才开始摆脱这一漫长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寻求统一，之后的历代政治制度几乎都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统一之后就一脉相承。

辽阔、统一的疆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使我们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中国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可以实现“西气东输”、高铁“八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兴板块，但仍然不出中国，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推动的沿海开发、沿江开发、沿边开发，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把中国的边境省份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特别是欧亚铁路的建设，包括渝新欧铁路，连云港、义乌等地至欧洲的铁路等，还有正在建设中的从云南通向东南亚的铁路大通道，把中国与俄罗斯、中亚、欧洲和东南亚国家连成一片。

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缺少地缘优势的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各级地方政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县际竞争与合作等特点都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些特征有关。

中国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是个“洲”的概念，就是飞机飞三个多小时，在欧洲已经飞过十几个国家，在中国却还在一个国家里边，还是讲中国话，吃中国菜，享受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这是少有的精彩。

结合人口与地域这两个“超”带来的挑战，我经常强调这个观点：一旦能克服挑战，创造的就是人间奇迹。我举个例子。中国的高铁技术为什么是世界最好的？很简单，因为你首先要能够应对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一个春运30亿人次的国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人口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接回来，实现了这个突破，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国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高铁技术要能适应东北的冻土，要能适应江南密集的河网，要能适应云贵高原，如果这些地理条件都能适应，那技术肯定是超越其他国家的。其他国家没法比，中国远远领先，我把这个叫作超越。

### 第三，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成果。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所难于望项背的。

比方说，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环境复杂等，中国人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就突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以食为天”“治国先治吏”“居安思危”“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等理念。其实，远在远古时期，中国许多独特的治国理政的传统就开始形成，如领袖要率先垂范、政府组织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最高领导权力接班过程中的“禅让”制度等。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开创了治理超大型国家制度安排的先河。

中国今天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背后也离不开中国传统崇尚平等这一重要基因，例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血缘出身决定的土地垄断就被摧毁，这推动了土地的自由流转，但这导致了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所

以历史上的许多朝廷都采取“常平仓”来储粮备荒，也就是运用价值规律，调剂粮食供应，稳定粮价。在粮价低的时候，进行收购，在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出售粮食，以避免“谷贱伤农”，同时避免“谷贵伤民”。例如，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标准，所以古代就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也就是说，早上还在种田，晚上就当了大官。欧洲一直是世袭制，直到19世纪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他们的文官考核制度。中国的这些制度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安排。

中国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是一种平等精神，它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却给后来中国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文化和心理基础。

#### 第四，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包括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这对于今天这个充满宗教冲突和对抗的世界仍有启发意义。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在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许多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56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过去40年中的中西文化近距离大规模相遇，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虽然崇洋媚外思潮在中国还有不小的市场，但中国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大势正在形成，这是非常之好的事情，因为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是在对外部世界保持广泛联系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其意义自然非同凡响。这使文化创意产业、中国影视业迎来了春天，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这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国产片

再次超越进口大片，有人说，“家国情怀燃了，现实主义火了，新锐导演热了”。

在中国大地上飞驰的最现代的高铁，背后也有丰富的中国文化记忆：高铁奇迹与中国历史上的“线性文化”的伟大工程相联。中国历史上的大运河、万里长城、茶马古道、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属于“线性文化”的一部分。认识到这种自古对交通的追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网络上流传各种高铁美景、美食全攻略地图。比如把中国的高铁图夸张地绘制成一张城市地铁图，然后写上：“从上海到昆明，朝发夕至，早上你还在上海吃着小笼包，晚上就能到云南吃鲜花饼啦。光想想心里就美呀！”这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带来的独有精彩的浓缩：“八纵八横”的高铁，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出行的便利，而且是这种便利激发出来的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世界上最深厚丰富的人文景观、世界上最有滋有味的华夏美食。

总之，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本身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一个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简陋的西方话语所能描述的，绝不是他们所说的所谓“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种过分简约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远为丰富。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不断的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还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義。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反之，如果中国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优势恐怕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也可能会变成自己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土地，“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纷争和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崛起对中国自身，对整个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伟大意义。

## “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历史基因

我多次讲过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在历史上曾领先你，有其原因。后来落后了，有其教训。现在又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领域内，超越你了，也有其原因。这些今天赶超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强于西方的原因是正相关的。我想谈谈对三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中国历史上领先西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中国后来为什么落伍了；第三，中国是如何赶上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应该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几乎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一切在于比较，没有绝对的好，只是相对而言历史上的中国更加先进。就像今天，我讲中国成功，也是比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干得更好，虽然实际上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古代中国也是一样，现在回头看，也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在当时确实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同时代的国家做得要好。

中国当时领先欧洲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传统。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把人民看作国家的基石，看作“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看作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也就是说，治国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也就是不仅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而且要长寿。中国本土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世济民”。在此之外，我们的先哲还提出许多民本、民富的具体政策。比方说，孔子及其弟子一直主张轻徭薄赋，重视农业

和民生。这些思想在17—18世纪传到欧洲，给欧洲的人文学者和统治者都带来了震撼，欧洲大经济学家魁奈（Quesnay）主张学习中国的重农政策和土地政策，法国和奥地利的国王也模仿中国皇帝在天坛举行亲耕仪式。

中国的民本传统除了“富民”，还有其他内容，如“教民”。孔子说的“有教无类”，通过教育“人人皆可成舜尧”这些理念远远领先当时的欧洲。中国古代还有“常平仓”政策，通过国家储备，防止“谷贱伤农”，也防止“谷贵伤民”。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所谓“新政”中的农业政策，就借鉴过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这些事实也说明，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已经含有不少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这为中国后来接受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作了政治文化方面的铺垫。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天命观”。可以说“天命”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但它与欧洲历史上的“君权神授”不同，对于国家最高权力来说，“天命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最大的监督和制约。在中国历史概念中，“天”总是用来表现最为重要的意义，如“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换言之，“天”不只是大自然的天，更是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以及世间万物的汇聚，代表最高的正义和权威。统治者代表“天”去统治和保护民众，一旦统治者违背了“天命”，开始蹂躏百姓，“天命”就将被收回，人民有权揭竿而起，实现新的“天命”统治，即历史上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用今天的政治哲学来看，“天命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契约论”，也就是荀子引用孔子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民心向背”，是对皇帝的警训。中国学者赵鼎新曾这样说，“天命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一个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中国的“契约论”，比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要早两千多年，卢梭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要认识“公意”，实践“公意”，并提出了一整套法律安排来落实这种契约。然而在卢梭去世之后的两百年，法国的

政治制度的建立几乎一直相当动荡。

我于2017年在荷兰参加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NEXUS Conference）时，主持人对所有在场学者抛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拿破仑曾说过，权力背后总有某种不安，今天这种不安是否变得更强烈了，因为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极端反华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第一个发言，他说：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走向孤立主义，自由主义模式受挫，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面临来自中国等反启蒙、反自由主义国家的挑战，中国“专制主义”模式也乘势走强，这带来了西方的广泛不安，西方世界要重振自由主义。

主持人随即请我谈谈看法。我说，西方这种权力的不安，源于权力脱离人民。如孔子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就是人民，脱离人民就有覆舟的危险。当时，中共十九大刚刚召开，我提到十九大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无往而不胜。西方今天乱象频出，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政治权力既严重脱离本国民众，也严重脱离世界人民。

与“天命论”平行的还有中国古人“天下为公”的思想，早在《礼记》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认为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这后来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为中国社会所广泛认同，对中国的历代朝廷都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道德制约，这些都是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难以想象的事情。

第三，选贤任能等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从宋朝开始，科举制就非常成熟了，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总体的社会自由度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是小农社会为主，而欧洲是农奴社会为主，土地属于农奴主，相形之下，小农生活的自由度远超农奴。至于知识界的自由度，中国学者刘梦溪曾这样描述中国古代文化中“狂”的自由态度。他说，“狂”字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本载籍中是个常见词。中国还有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写意绘画、书法狂草等传统。有儒家的圣人理想，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道教的崇尚自然。这种“狂”的程度和范围在古代欧洲文化中罕见。某

种意义上，西方人天天嘴上挂着“自由”，可能正好证明了古代欧洲人享受的自由太少了。

那么欧洲后来是靠的什么超越了中国呢？以我之见，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如果我们从16世纪算起，可以说欧洲很长时间内都在打仗，从四五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例如，从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欧洲主要国家在多数时间里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西班牙是81%的时间，英国是53%的时间，法国是52%的时间。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虽然本身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借此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开始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包括后来打败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和贸易。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在与东方的贸易中发了财，便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曾这样论述殖民时代的贸易：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不是英国本身。

此外，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供应，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白银。现在回头看，明朝李自成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发不出薪水了，我们的货币不够了，因为种种原因，西班牙贸易体系出了问题，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供应量迅速减少。之前一年之内可能有60多艘船运着白银到中国来，当时一下子全年只有六七艘船，减少了十倍，这就出现了货币供应的危机。清朝的覆灭也与此有关，英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在1870年左右开始由“银本位”转向“金本位”，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钱大跌，对清朝的经济造成了打击。这些都是中国被欧洲超越的重要原因。

这些情况也说明当时的中国朝廷缺少国际眼光，缺少我们今天讲的处理国内、

国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尽管中国是发明纸币的国家，但到明清两朝，中国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都没有成功。中华民国时期发行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

第三是中国自己的认识问题。中国朝廷迷恋于中国自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天下没有比中国更富庶的地方了，心理上妄自尊大，心态上不思进取，政策上闭关锁国，等等，使中国人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我记得学者许倬云曾这样感叹：“19世纪前半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贸易，经由长程海路运送商品，将美洲白银带来中国，中国的货品运往欧美……在东方，英国已建设新加坡，控制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蒙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以军事和贸易、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也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当时的中国。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世界，西方特别是美国，仍依赖这两个手段对世界进行控制。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唯恐天下不乱，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时常制造紧张局势，包括发动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那么，中国是如何赶上来，甚至在不少方面后来居上的呢？

首先，作为“文明型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传统和选贤任能传统。中国共产党重新诠释了“天命”的概念。毛泽东主席直接把中国人民称呼为中国共产党的“上帝”，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力量的直接来源。在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政治语汇中，人民的意愿、认同及支持，被看作高于一切的信念，这是新的、具有人民性的“天命”，中国共产党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自己的使命和天职。

其次，中国较好地解决了“军事”和“金融”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这是自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

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1949年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70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过去的军队打不过西方，而新中国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在金融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国家财政体系。这无疑是500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人民币纳入了货币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当然，在金融问题上，我们还需谨慎。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陈平教授曾在伦敦见过当时已经90多岁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我们是他生前会见的最后一批中国客人。他在会见中讲到了一个观点。他说，纵观历史，西方强国一个接一个走衰的主要原因都是经济金融化，也就是玩钱生钱的游戏上瘾了，难以改邪归正，当年的荷兰如此，后来的英国如此，今天的美国看来也是如此。中国今天强调金融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是有深刻道理的。经济学家史正富把金融分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和“为自我服务”的金融，美国今天的麻烦就是“为自我服务”的金融百倍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也要防止其外溢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防范金融危机，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最后，中国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不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但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无疑，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并将继续影响整个世界格局未来的演变。

##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爱国主义有自己的特点，中国

人有宝贵的“家国情怀”。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少地方都有“闪唱”活动，大家唱得最多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美得令人心醉，唱出了绝大多数普普通通中国人的真实情感。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首优美的歌曲《我的祖国》，以及这首歌曲曾经引发的一起舆论“事件”。2016年年底，观察者网刊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在香港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一首歌，一个时代”。她要在场的听众，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听过的人生第一首启蒙歌曲。在场的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不紧不慢地说：我的启蒙歌曲好像是《我的祖国》。没想到整个会场就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而且歌声越来越响。龙应台本人是不认同红歌的，第二天，她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时候，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也就是说，这无非是简单而美丽的旋律而已。

但尴尬的是她做讲座时也提到了她自己的人生启蒙歌曲，包括《绿岛小夜曲》，一首曲调优美的情歌。绿岛是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她认为这首歌不只是首情歌，而且也是一种对威权政治的抗议，所以她的文章引来了不少议论，认为她采用双重标准。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谈这类问题的时候，不能采用双重标准。

《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多数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它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源于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首歌几乎完美地诠释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这首歌里的“家”就是我们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这首歌里的“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永远结束了西方大国可以任意欺负中国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元帅所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汉字中“国家”的写法跟其他语言不一样，一个字是“家”，一个字是“国”。这是中国人对国家的基本定义，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是千千万万无数个“小家”和国家这个“大家”的关系。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从“舍己为家”到“保家卫国”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展现了中国人特有

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西方很少。

从个人来讲，中国人可以为自己家庭做出很多牺牲，这是一般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曾经看到一个美国记者写得很长的报道。他在深圳采访了农民女工，女工跟他说：“上班后连着几个月，我把工资的一半都寄给我父母。”这在中国文化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永远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位记者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自己的工资不完全是自己的，一半是属于家人的？这对他来说很新奇。实际上心存对父母的感激，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父母并不一定要你的钱，甚至还要通过许多方式帮助你，但这种父慈子孝的伦理是多数中国人的文化传承。

由此而延伸到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我的祖国》实际上唱的就是家国同构。歌词里有“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的词作者，特别令人尊敬的乔羽先生，曾接受过采访，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说长江、不说黄河？”他说，一条大河更好，因为长江只有长江一带的人比较熟悉，黄河只有黄河边上的人比较熟悉，而几乎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心中都有自己故乡的河。“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他就这样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人这种家国情怀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因，就是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人有超强的“国破家亡”的集体记忆，这是一种极其悲惨的记忆。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国经历了这么多次西方列强的入侵，这么多的战争创伤，这么多的战争赔款。我们的首都北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占领过、“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占领过、日本侵华战争时被占领过，我们的土地上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些惨痛经历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国破家亡”的创伤。国家完了，中国人的家也完了。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大陆本土几乎没有遭受过外敌入侵，“二战”时被日本人偷袭的夏威夷，离美国大陆很远。对美国人来说，2001年发生的“9·11”袭击是美国大陆遭到的第一次直接袭击—如果不算美国独立战争的话。

抗战时期还有一首爱国歌曲，叫《松花江上》，词曲作者叫张寒晖。他当时人在西安，看到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后，几十万东北普通百姓流亡到了西安，有感而发，做了这么一首悲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

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背后也是这种“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这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家国同构”是中国人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

西方势力总是抹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其实西方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在历史上一直是战争的祸水。西方民族国家诞生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战争史。无论是欧洲移民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杀戮，还是拿破仑发动的“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征服整个欧洲的战争，抑或是后来导致数千万人阵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中希特勒“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要征服世界的企图，背后都有那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

今天的世界虽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还是需要十分警惕西方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乃至灾难。

2016年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左一个爱国主义，右一个爱国主义，甚至呼吁美国人只买美国货，呼吁美国公司只雇用美国人，在场的美国听众不停高呼“USA，USA”。今天世界上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一到国庆节家家户户都挂国旗，到处都在开国庆派对，但是西方国家却习惯采用双重标准，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接受，认为是要搞扩张和侵略。这是颠倒黑白的。

中国国内也是一样。国内一些亲西方的人士甚至发明了“爱国贼”这个概念。创造“爱国贼”这个概念的人，反对的不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而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把一些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的极端行为的个案进行夸张，污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爱国贼”骂的不是“贼”，骂的是“爱国”。这样做是不明智也是愚蠢的。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传统总体上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传统。他不只是爱一个国家，也是爱一个伟大的文明，一个没有中断的、数千年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它的内涵比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中国人基于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对于西方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是一种超越。我自己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

光荣与梦想》，我在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是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毛泽东；是普通话、四川话、广东粤语、上海方言；是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桂林山水、陕西兵马俑；是川菜、粤菜、鲁菜、淮扬菜；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梅花三弄》《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广东骑楼、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昆剧、京剧、粤剧、黄梅戏；是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战、台儿庄血战、抗美援朝；是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神舟号飞船、高铁八纵八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这是一种包容性极大的、既有个人志趣又有人类情怀的爱国主义。现在我们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也有我们“文明型国家”的伟大历史传承，特别是对“人类大同”理想的憧憬，这些都是中国“爱国主义”特别出彩的地方。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一就是爱国主义。中国近代以来的任何一种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潮，只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才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没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不可能在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国大业；没有爱国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爱国主义，中国不可能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个爱国主义的逻辑将在中国崛起的未来岁月中继续不断得到展现。

这使我想起了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当时毛主席说了这么一番话，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能背出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后来，我看到过傅作义将军的回忆，1936年他也在陕西，是国民党的抗战将领。他说，毛泽东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手下连8000人都不到，但他当时就敢说这样的话。毛主席的自信源于他坚信人民的伟力，坚信中国人民一旦动员起来，就一定可以创造人间奇迹，果然，讲完这番话后不到14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败退台湾。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70年矢志不渝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回望中国崛起的历程，我们的历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习近平也好，都一直认为，中国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种把爱国主义精

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中国人从来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随着“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人要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之辨。“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强权政治。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迄今为止的逻辑几乎都是“霸道”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西方喜欢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国家往往不择手段，可以政治上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诱导、文化上渗透，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保留直接军事干预的权力。中国历来主张“王道”，但它从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个道理：“王道”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王道”就是乌托邦，甚至使国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协和万邦，实行“王道”，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有所作为，更多地主持正义和公道。中国确实是最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实行“王道”的国家。从人类历史的大势来看，霸者可以气势汹汹于一时，但终将因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实行“王道”者终将得道多助，赢得最为广阔的世界。

据报道，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前总统—94岁高龄的吉米·卡特—通了个很有意思的电话。卡特本人透露说，特朗普在通话中表示，他对“中国正超越我们”感到不安。作为在任期内与中国正式建交的美国总统，卡特先生对中美关系一直比较关注，2019年1月他还给特朗普写信，建议特朗普召集几位“受人尊敬”的中国问题顾问，成立一个小组，在幕后协助他来改善美中关系。

卡特表示他认同特朗普关于“中国正超越我们”的说法，但他对特朗普说：“你知道原因吗？我在1979年使对华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你知道从那以后中国发动了几次战争吗？零。而我们一直在打仗。”卡特说美国在242年的建国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所以美国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总是想迫使其他人采用美国的原则”。他还说，美国浪费了3万亿美元在军费开支上，“而中国没有浪费一分钱在战争上，这就是他们在各个方面正走在我们前面的原因。如果美国拿出这3万亿美元用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拥有高速铁路、不垮塌的桥梁、良好维护的道路，还能剩下2万亿美元”。卡特说，相比之下，因为

没有战争，中国得以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最长运营里程的高铁，美国拥有多长的高铁？大家都知道的：零。

对于卡特前总统，我也直接接触过，确实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他讲的中美两国发展状况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王道”和“霸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吗？不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产生的必然结果吗？总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天下观包含了许多中华文明的智慧，中国人民从中受益良多，整个世界也将从中受益良多。

## 中国模式：独树一帜的稳健改革之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翻译室的主要工作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令我十分怀念的一段时光。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说话大都有很强的个性风格。比方邓小平讲“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说“我当过财政部长，甜酸苦辣我都尝过”；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谈“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毛泽西”。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这类地地道道的中文表述最难翻译。一是如何把握其准确含义，二是如何找到对应的英文表述。当时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业务学习，大家把自己每天翻译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译成初稿拿出来一起讨论，最后请翻译室的几位老专家定稿。回想起来，这是很管用的做法：群策群力，从初稿到最后定稿，采用民主集中制，最后编成一册一册的“翻译难点”。我现在还留着不少，这些小册子成为我们替领导人做口译工作的宝典。

我们当时讨论过邓小平经常说的“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究竟怎么翻译比较好，当时有翻译成“the Chinese model”的，也有翻译成“the China model”的，还有翻译成“the Chinese approach”的，等等，后来大家商定多数情况下还是翻译成“the China model”，觉得这样说话感比较对。后来国内学界和舆论界，就能否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发生了激烈争论，我个人对此还觉得挺奇怪的，因为这个概念我一直在用。

我是最早在学术层面提出“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我记得大约在十年前，《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我，问：你们高层有人说，没有“中国模式”。我说，我

研究后觉得有“中国模式”，中国有充分的言论空间，我不仅把我的观点写出来而且还发表了。

确实，当时我国的中央文件中使用更多的是“中国道路”这个概念，但现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也得到了广泛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曾说过，“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存在已经得到了确认，但我们不向外输出这个模式。

那么“中国道路”这个概念和“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认为两个概念在狭义上有所区别。中国道路，更多一点儿意识形态色彩，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之相对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则更加中性一点，主要指中国自己的一整套有关发展的做法和思路。不过在广义层面上，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都是指中国人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这两个概念是混合、交替使用的。其实，“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即“the China model”在国际交流中可能还更加方便一些，一讲人家就懂。而“中国道路”迄今还没有找到最佳的英文译文，如果查谷歌“中国道路”，首先跳出来的可能是大量交通信息—南京路、北京路，还有一条中国路，以及“一带一路”等。另外，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也有利于国际比较，比如可以说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比较，但如果说中国道路和美国模式，好像就不一定妥帖。

说“中国模式”，我们首先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先生对中国模式研究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使用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1988年邓小平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则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外国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意味着“示范、样板”，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不用“中国模式”为好。“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

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所进行的概括性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经验归纳。就像我们过去40年中用过的“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等等，指的就是对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的意图。我自己曾经于2006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国际版上撰文“中国模式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谈中国模式对非洲产生的影响，我讲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并没有引起过别人的误读。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能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与时俱进了，那么这个模式走衰的进程就开始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模式面临巨大困境。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种与时俱进的模式，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具有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以我自己的观察，国内主要有两类不赞成中国模式的声音。一类声音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认同或者基本认同中国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经验和理念，但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因为“模式”这个概念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固化的感觉，甚至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但如我上面所解释的，“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一种经验的客观总结，这就解决了表述上的分歧。所以对于这类声音，我没有任何担心。我们的分歧是表述措辞上的分歧，他们最终会接受“中国模式”这种表述方法。

还有一类声音是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这些声音只认同西方模式，认为只要跟西方不一样，就还没有转型到位。这类声音否定中国模式也不奇怪，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坦率地说，过去40年，要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恐怕中国

连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我的一位学者朋友曾这样调侃后一类声音。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没缺陷的完美国家呢？当然，有人认为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的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在“变化”中。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变的国家呢？哪个国家在几十年里没经历巨大变化？当然，美国两百年没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但是哪个国家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呢？当然，美国不特殊，美国的经验可以扩散，而且扩散了对他国无害，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这个调侃很能说明问题。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照搬“美国模式”而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天下难觅，失败的情况却比比皆是，连美国自己今天都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今天的“美国模式”恐怕更多是反省的对象，而不是照搬的榜样。

下面，我简单地和大家探讨一下邓小平是如何谈论中国模式的。邓小平主要从三个角度谈论过“中国模式”：

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比方说，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二是评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评论中国革命时，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他也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应该要求其他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做。他还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这使我想起了

6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苏联要搞“老子党”，中国就是不买账，双方必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

三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当时我担任翻译，邓小平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1988年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让我们简单比较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方面所采用的不同模式。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两种改革模式：一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另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

“激进改革模式”的特点是“双休克疗法”：以西方政治模式为蓝本，一下子把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一夜之间完成了所谓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双休克疗法”的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选择了这种模式，结果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我曾在1990年6月去苏联考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张旗鼓地推动他的激进改革模式的时候。到了苏联，真是感触良多。我没想到一个能生产原子弹、宇宙飞船的国家，竟然生产不出一双好看的鞋子。当时在莫斯科最大的商场里，女式皮鞋就是一两种款式，从小号到大号，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人们还要排长队买。街上的餐馆非常少，吃饭很困难，到处都要排队，饭店中午的营业时间很短，从12点到下午2点，错过时间就没有饭吃了。苏联经济显然出了大问题。另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人民的心中已经没有威望可言，谁都可以拿他开玩笑。俄罗斯人有幽默感，苏联社科院的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个人要去刺杀戈尔巴乔夫，带了一把枪去了克里姆林宫，但过了一会就回来了，人们问他怎么了，他说，“想刺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雄心勃勃地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改革，但自己的威信却已荡然无

存，可以想象他的改革不会成功。

与之相对，“保守改革模式”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坚持原有体制，计划经济为主，辅之以极为有限的市场调节。这些国家对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充满恐惧，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很慢。以我个人的观察，前些年的古巴大致就是这种情况。

2005年夏天我去古巴考察了十天，住在一个工程师的家里，对古巴当时的“短缺经济”感同身受。几乎所有食品都需要票证，如猪肉、羊肉、大米、面粉、食油、鸡蛋，甚至连古巴盛产的食糖，也是配给制。我的房东把他的购货本给我看，本上记录了各种各样的配给。我问房东，经济困难是不是美国制裁造成的，他说这是一个原因，但也不这么简单，他比较中国进行的改革，说关键原因是政策不对，比如食糖，价格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另外，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不能进出口任何东西。

当时的古巴，也进行了一些市场调剂性质的改革，比如允许个体户从事一些经济活动，但一旦出现了所谓投机倒把、贫富差距扩大之类的问题，政府就开始紧张，然后就开始所谓的“纠偏运动”，结果经济失去了活力。当然，古巴也有它的成就，比如它的配给制保证了公民基本的生活水准。古巴是根据人的营养需求，特别是卡路里摄入量来安排配给的，在发展中国家，你往往能看到很多营养不良的人，特别是儿童，但古巴似乎没有这个问题，配给制保证了人民基本的营养标准。另外，尽管经济非常困难，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不过，从当时和古巴朋友的聊天中，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古巴已经人心思变，人们已经很公开地谈论中国模式了，包括相当级别的官员。今天古巴领导人更是积极主张学习中国经验，中古关系也进入了非常好的时期。

比较下来，中国避免了“激进改革模式”，也避免了“保守改革模式”，立足自己的国情，探索出了一种我称之为“稳健改革模式”的道路。1987年10月，邓小平会晤了来华访问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迥异，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了后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双休克疗法”及

其严重的后果。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国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推动的是“稳健改革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大规模经济改革，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显著改善。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发挥了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经济体，现在还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

##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

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很有道理的。读书是学习，实地调研也是学习，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学习，特别是做政治学研究，一定要对政治有感觉，一定要有实地调研的基本功，躲在象牙塔里，从书本到书本，是出不了真学问的。2007年，我在德国参加过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后互动，一位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问他：“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不耐烦地说：“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问他：“您知不知道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也就是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位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另一位学者问：“博茨瓦纳？”我问：“您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

说：“我去过，当时这个国家的人口才170万。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均寿命不到40岁，因为艾滋病严重失控。”

这时，又一位学者问：“那么哥斯达黎加呢？”我问他：“您去过这个国家吗？”他的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在2002年考察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西方国家津津乐道的所谓采用西方模式而比较成功的国家。但实地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以中国人的眼光、视角和标准审视一下，就会知道很多西方人做的学问，实在是不敢恭维一错得离谱，怎么叫人信服。走的地方多的最大好处，就是不大会被别人忽悠。我们之所以敢于对西方荒谬的话语频频亮剑，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的把握，对外部世界的把握，比他们扎实。

我随后反问他们：“还有什么例子吗？”“要不要让我来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或者更多？”我当时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国家海地。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点击量很高。中国没有采用西方模式而迅速崛起，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有为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混合经济、对外开放、三力平衡。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之前我们讨论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也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有点像人的基因图谱那样，大致决定了中国模式的以上八个特点。下面，我分别对这八点作一些解释：

第一，实践理性。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

是”思想的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中国因此而决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一般都从“条文”开始，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一般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中国模式的实践理性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等可能导致国家制度崩溃和国家解体的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第二，有为政府。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是一种“百国之和”的国家，是由历史上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而成的，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如果只代表部分人或部分地区的利益，国家就会走向混乱和崩溃。

中国的有为政府及支撑它的党政体制，本质上是中国这种源远流长的统一执政集团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领导核心”，负责“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而彻底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盘散沙”局面。

纵观整个发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以达成，结果就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而中国的强势、中性、有为政府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与西方同步进入了信息社会，甚至在不少领域内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当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

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即使是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往往也要靠中国的党政体制和强势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稳定优先。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中国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优先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总结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深刻结论。

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勤劳致富、丰衣足食，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动，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第四，民生为大。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小康”“全面小康”“两个一百年”等目标，都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和发

展。

中国过去4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损害了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联合国统计，过去40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近80%。世界上仍然有十来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而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搞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民主化”。结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民生受到损害。

第五，渐进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里，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这里要补充的是，渐进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各项具体措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建立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在总体战略上，这是渐进，但就建立特区本身而言，则很快就作出了决定，而且很快就开始了实施，效率非常高，体现了渐进改革战略指导下的中国速度与效率。

渐进改革也包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在多数情况下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回头看我们走过的路，过去40年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中国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第六，混合经济。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了“市场原教旨主义”。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社会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收入、就业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同时，中国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今天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我记得，2016年“双十一”那天，我正好在英国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我拿着我的手机说，今天是中国的“双十一”，网上交易额是1207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中国阿里巴巴这一家公司一天的网上交易额，就超过了印度2015年全年的网上交易额。英国学者说，这正好说明阿里巴巴作为民营公司的巨大成功。我说，对，但不完全。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马云本人的智慧、阿里巴巴本身的开拓精神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国家网络治理的整体安排，否则中国市场恐怕就不是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的天下，而是美国亚马逊、脸书、推特的天下。此外，阿里巴巴的成功还有赖于国家大力投资的4G技术和遍布中国的4G基站，以及国家投资的一流基础设施，特别是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的工程，还有国家投资的5G研发和部署，更不要说国家常年对电力和教育的大量投资，等等。这一切几乎完美地说明了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当然，混合经济模式还有许多改进的余地，通过改革，可以做得更好。

第七，对外开放。过去40年，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要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的战略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是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

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八，三力平衡。中国模式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基本上实现了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这个特点在与美国模式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美国人说它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如何好，但它制度中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本质上都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在政治领域之外，还有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这三个领域又衍生出政治、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美国的资本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应该是过去20来年美国多数人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能创造财富、展现效率。随着改革开放，资本的力量迸发，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有副作用，如果没有必要制约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以及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而在中国模式下，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规范和制约的。

从中国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中性和有为，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40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我们将会看到，中国模式的这一特点对于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现在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很受重视，不少国家希望学习中国模式，但坦率地说，借鉴一些中国经验是可以的，但照搬中国模式是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仗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又与美国打了两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以中国有高度的政治独立性和强大的国防力量，还有独立的科技体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可以对美国说NO的国家，一般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前30年和后40年的关系。不过，中国的许多理念和具体经验仍然对外

部世界很有启发，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先试验再推广”的做法，中国各种“工业园区”的实践、中国各种发展规划的制定等，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有所启发，如今这些经验已经在许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受欢迎。

## 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令人感叹万千。从宏观视角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里的“第二”还是根据美元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在2014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此前所说，中国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在这一崛起中，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为4亿人，超过了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中国还向全世界输出了最多的游客，2018年约为每年1.5亿人次。中国基本实现了全民的养老和医保，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这个覆盖率美国迄今还做不到。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其丰富和精彩程度明显地超过同时代的外国人。“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给中国人带来了难得的生命体验，我们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迅速变迁。我们先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体验到“中国活起来了”，然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体验到“中国亮起来了”，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体验到“中国连起来了”。而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已经身处世界的“第一方阵”，而且前景看好，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我们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掠夺别人的资源，但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福祉的最大提高，我们还成了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连续很多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30%，超过美国与欧洲之和。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的崛起过程几乎就是一部战争。他们对外扩张、殖民，掠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建构有利于自己的世界贸易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实属不易：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是按市场价格买来的，不是抢来的；中国的

产品是根据国际合同卖出去的，不是通过战争向他国倾销的；中国还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当短缺的国家，一切资源都要么靠自己开采，要么靠等价交换。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呢？原因应该有很多，我想和大家简要地探讨八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奠定的基础，包括政治制度的确立、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独立的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的建设，以及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教育普及、基本医疗等社会事业，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必要的初始条件。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宏观整合能力，保证了中国的安定团结和有序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世界最充沛的优质劳动力，培养了世界最大的工程师队伍；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和后来的土地使用权多样化，使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的有产阶层；中国实现了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建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铁网，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了世界一流。

第二，时代定位。中国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到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都要对自身所处的时代大势作出一个总体判断。20世纪80年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调整了过去对时代的判断，从“战争与革命”调整为“和平与发展”。我们过去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国内建设侧重钢铁等重工业，或多或少忽视了轻工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此外，在1987年举行的党的十三大上，中国又正式作出了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

我总是强调一个观点：一切在于国际比较，国际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理解许多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数十年西方对时代的定位。他们认为这个时代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代，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结果是“颜色革命”迅速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最终导致中东难民大量涌入欧洲，搅乱了欧洲政坛，只能说西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苏联当时对时代的定位是什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说苏联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也很天真，认为世界进入了“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时代。勃列日涅夫的定位，导致了“假大空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定

位，说明他是被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忽悠——“全人类价值”应该由世界人民来共同界定——被忽悠的结果就是国家解体、经济崩溃，苏联人民70年来社会主义积累的大量财富被西方洗劫一空，苏联男性的平均寿命下降到60岁以下。由此可见，“时代定位”十分重要，否则会犯“颠覆性错误”，甚至“一失足成千古恨”。

第三，合作共赢。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之路，推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既对西方国家开放，对苏联阵营和原苏联阵营国家开放，也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开放。中国的合作共赢政策体现在中国加入WTO及其带来的变化。WTO是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的加入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流通，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也使世界各国人民享受到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红利。中国执行的是一种“嵌入式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这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这显然减少了大国军事对抗的风险。特朗普当政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双方都会受损，但美方受损将更大：美方即便开始时气势汹汹，最终会发现只能继续维护双方互利共赢的贸易格局。

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中国今天还积极推动建设“一带一路”。中国人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原则，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推动了整个世界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道路。以中国经济今天的体量，以发展中国家今天整体崛起的速度，以合作共赢理念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尽管西方主要国家搞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但最终结局将更可能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形势比人强，少数西方国家最终将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世界潮流。

第四，趋利避害。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回望这些年西方主要国家推动的全球化，其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应该顺势而为。但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会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会带来灾难，甚至中断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所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战略。

中国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中国不仅不放弃社会

主义，而且还将社会主义的优势来驾驭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脱颖而出，超越资本主义，使大多数中国百姓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在拥抱全球化后，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往往不是他们“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外国资本控制，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甚至国家陷入了分裂和战乱，如南斯拉夫、苏联、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

中国对互联网革命，也采取了大力推动、趋利避害、民生导向的方针，拒绝了西方把互联网政治化、变成“颜色革命”阵地的企图，使中国互联网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勃勃生机，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从而走到了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最前沿。

第五，内涵增长。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着超级繁重的任务，面对着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中国立足于通过自己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找到解决各种难点和矛盾的办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探讨方方面面解决各种难题的中国方案，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如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等等。

实践证明，中国人相信“危”也是“机”，相信挑战就是机遇，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各种挑战的过程。十年前春运数十亿人次返乡还是我们交通面临的最大难题，但随着高铁“八纵八横”和世界最大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春运如今已经变成了展示中国技术、中国管理和中国人“家国情怀”的一张名片。

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使中国经济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这种内涵式增长和发展为主的道路正越走越宽广。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内涵式增长有助于我们保持定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和挑战。

第六，跨越发展。从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来看，新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往往也是竞争加剧、战争频发的时刻。以蒸汽机和纺织工业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和以电

气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加剧了西方列强之间为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争夺和战争。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说，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奋发“补课”的40年。我们以大约每十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趕过来，实现了前面所讲的“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之所以注重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和平发展，必然受到生态、环境、能源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不可能也肯定不会走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老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条件和外部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只能走创新发展之路，超越旧式的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与奋斗之路，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项壮举，但中国人就是这么一路打拼，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甚至牺牲，最终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第七，安全保障。和平崛起需要安全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保障来自我们强大的国防，来自意识形态安全，来自我们的“总体安全观”。对于故意挑起各种争端的敌对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和“红线”，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对中国的意图和原则产生误判。

最后就是中国人的“文明基因”。中国人民珍爱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多数时期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百倍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船队规模，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中国人的古训历来是“国虽大，好战必亡”，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代的中国又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西方入侵和民族屈辱，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宝贵。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郑重承诺，即使发展强大起来，中国也不会称霸。

中国成功实现了和平崛起，这对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二战”后，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西方大国通过自己的软硬

实力，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中心—外围”二元依附体系，即西方大国处于“中心”，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大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这种“中心—外围”的依附关系又被剥削成为“外围供养中心”的格局，“中心”国家掌控着“外围”国家的经济命脉，赚得盆满钵满，“外围”国家则迟迟发展不起来。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实质性地突破了这种“中心—外围”结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迅速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作为单独一极，中国既是“中心”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也是“外围”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原来的“二元依附格局”正在变成“三元互动格局”，并且中国还是这个格局中极具主动权的一方，是影响“中心”与“外围”的关键力量，这为我们推动“一带一路”走向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有利于推动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改革，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一起走和平发展之路，一起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中国价值：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 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

2016年，国务院通过了“八纵八横”的高铁规划，中国速度震撼世界。“四纵四横”的说法已经成为历史，“八纵八横”翻开了中国高铁的新篇章，中国的高铁运营里程在2017年底已经达到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运营里程的三分之二。按照这个新规划，2025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数将达到3.8万公里。

谈到中国高铁的巨大成就，我想起了八年前的一段往事。八年前，我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后不少地方请我去演讲，我记得2011年8月，我在上海一家单位谈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我比较喜欢互动，希望大家提问题，越尖锐越好。在互动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媒体人站起来，提了个问题，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不久前发生的“7·23”高铁事故吗？当时两辆开往福州的动车在温州市境内出了事故。他挖苦我说，这难道也是中国震撼吗？他问我：为什么政府不向老百姓谢罪？

我请这位年轻人坐下来，和他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个事故肯定是个悲剧，我们要调查，究竟是什么原因，调查清楚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当然，我也告诉他，这不是高铁事故，是动车事故，两者速度差别是以每小时250公里为界。我说衡量火车的安全水平，要有个参照系，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一辆春运火车的载客量可能超过德国火车十年的载客量，而到2011年上半年为止，动车和高铁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安全运行了大致五年，这种安全记录应该是相当好的。

我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所以我也问了他几个问题：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中国的动车和高铁是研究生水平，美国、英国的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的火车是幼儿园水平——每年造成的死亡事故是以千人计的。只要去孟买看一下，每天早上开进孟买的火车，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铁道游击队》，车顶上扒的是人，门上拉的是人，每天都有很多事故发生。研究生也可能犯错误，中学生也可以指出研究

生的错误，但总体上看，中学生要达到研究生的水平还是不太容易的。用这么一个事故来否定中国铁路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是不明智的。我们云贵高原都建了动车高铁，中国一个省建设高铁的难度可能就超过整个美国的难度—但我们也建成了。我坦率地对他说：恕我直言，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的问题，而可能是政府把像你们这样的人宠坏了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对的，但在很多地方，和谐社会变成了“花钱买和谐”，实践证明，花钱买不到真正的和谐。当时的情况，大家可能都记得，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的言论几乎都是抹黑自己国家的，把世界上最精彩的国家描绘得一团漆黑，背后一定有一股邪恶的势力。不少主流媒体也失去了定力，跟着网络媒体走。当时网络上的主流话语是西方话语：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铁道部是坏的，所以国企生产的高铁肯定也是坏的。事故出来后网上疯传各种谣言，有个叫秦火火的造谣说政府给外国死亡游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当时的情况连一些美国人也看不下去了，我记得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2011年曾刊文，标题就是“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

我当时是真的担心。我在苏联解体前去过苏联，在南斯拉夫解体前也去过南斯拉夫，我知道这两个国家是怎么解体的。长话短说就是两步：第一步是他们的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是他们的政治精英，包括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也被西方话语忽悠，认为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们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接下来就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人民的财富被西方洗劫一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的最著名人物当数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果导致了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俄罗斯人称之为“第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指的是14世纪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浩劫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然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居然有胆量参加1996年俄罗斯的总统竞选，他的得票率未超过1%，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把他抛弃了。

2011年的时候，中国很多知识精英也被西方忽悠得差不多了。亏得我们的高铁最终通过自己过硬的技术，站稳了脚跟；亏得我们的领导人坚定地支持高铁的发展。今天高铁已经使中国人的出行变得如此便捷，甚至改变了许多国人的时空观。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明这样一点：中国高铁这么精彩的一个

故事，这么成功的一个案例，但是一旦你自己没有自己话语的时候，人家就可以把它扭着讲，反着讲，把你最大的正资产，变成你最大的负资产。什么“高铁呀，请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良心”，什么“政府要向人民谢罪”，等等。换言之，我想指出，话语太重要了，我们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说得好，我们要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背后是真正的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能更加顺当，更加精彩，否则是要出大问题的，甚至可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我有一段时间老说这句话：如果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所忽悠，那么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你们当时手里是一副好牌呀，怎么打成了那个样子。

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人是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致力于改善民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只要哪个国家做得好，我们就向它学习，我们从善如流。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整个西方世界却一直在不断意识形态化，不断地政治化，最后导致了什么？当中国人出境去旅游、去留学等，碰到普通的老外，他都会问，中国的人权怎么这么糟糕？西藏为什么不能“独立”？台湾为什么不能“独立”？我之所以说，一出国，就爱国，也跟这个有关。偶然回答一两次这种傻问题，那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天天回答，回答100次后，你一定会变得非常爱国。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认为我们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了。我们对所有问题都需做出清晰的回答。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把中国说清楚，把世界说清楚。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的胜利，我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在今天中国崛起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这种谩骂一方面来自西方，另一方面则来自国内。知识界、媒体界还有一些人不自信，还是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当然的结果，就是他们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我也认为，建立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向国人说清楚，向世界说清楚，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要从僵化的西方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和西方话语霸权，并在这个进程中建构中国话语。替西方话语当搬运工、当打工仔，是没有出息的。对于西方话语，我们可以进入，但也要有能力跳出，一旦跳出西方话语，就会发现海阔天空。这就是中国今天真正需要推

动的一种思想解放—从西方僵化愚昧的话语中解放出来。

我一直主张，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国内外的普通受众也能听懂；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话语，国内亲西方势力谩骂自己的国家和制度时也采用西方那种强势但浅薄的话语，这种时候我们有必要强势地予以回击。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这无疑十分重要，这些话语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定海神针，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光有官方话语是不够的。在今天西方话语仍然比较强势的情况下，在社会日益开放、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世界上，光有官方话语已不足以解决“挨骂”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大力推动学术的、民间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建设，弥补中国话语建设中的短板。总体上看，学术话语比较中性、理性，有利于与知识界的沟通，也有利于从基础理论上解构和颠覆西方的话语神话。而学术话语建构的切入点，我个人认为，可以是西方话语在中国学术界渗透最深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和法学；民间话语比较接地气，有利于我们解决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国际化的话语也很重要，我们要以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话语和西方打交道，从而为确立中国话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最近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世界老二”不好当。过去苏联是老二，被美国扳倒了；日本是老二，也被美国扳倒了。现在中国是老二，美国也想把中国扳倒，为这种扳倒而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西方话语，虽然特朗普上台使美国的话语霸权和软实力遭受重大挫折。如果今天西方还有人来对中国人说，你们必须接受所谓的“普世价值”，你可以建议他：你先去说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看他信不信。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么多年来，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非常之深，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么精彩的崛起故事，今天很多人还是讲得不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些年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导致很多学者和官员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西方。要想在西方话语的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非常之难，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方天天说中国人权问题，但我们都知道西方自己的人权问题也不

少，然而我们不少人在面对西方的质疑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没有发展到你们这个阶段，所以人权达不到你们这个水平。我个人认为，这是“弱势话语”，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这等于是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让他来做法官裁定你做得如何，这是不行的。

有人问我说，你怎么用中国话语来回应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指控？我说，很简单：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用联合国的人权标准来看美国。你可以告诉美国人，21世纪对人权最大的侵犯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十多万无辜的百姓被杀害，超过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是造孽。美国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向全世界解释清楚，怎么有资格来跟中国谈人权问题？这个话讲出来，全世界都高兴，整个第三世界都高兴，甚至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会高兴，因为他们也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一场非法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战争。

我们要力求从根子上对西方话语进行反思和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式的解构。从我自己研究和实践的情况来看，这样做的效果非常之好，而且往往具有颠覆性，当然这背后是扎实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突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主流政治叙述是基于一种极其浅薄而又充满偏见的分析范式，即所谓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范式，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又只能由西方一家来界定。他们把西方实行的那种多党制和普选制，界定为民主和“普世价值”，认为唯有采用这种模式，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才能被以西方为首的所谓“国际社会”所接受。在这种话语主导下，中国政治制度被描绘成“专制的”，是民主制度的对立物。正因如此，西方可以不停地质疑：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的这种政治逻辑，你就是支持专制；只要你不向西方政治模式靠拢，你就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西方媒体人也可以不屑于学习中文，不屑于在中国做真正的社会调查，就可以武断地批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切，指责中国的人权纪录、预测中国将要崩溃，等等。

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其实早已成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颠覆非西方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话语虽然可以忽悠一部分人，甚至在不少国家造成了政权更迭，但今天随着“颜色革命”的“褪色”，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随着西方人民自己也意识到西方政治模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反思甚至质疑西方政治模式及其话语范式。

我自己在国际场合第一次推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中国话语是在2008年年底，当时我在印度进行考察和演讲。那年11月，孟买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但印度的反恐精锐部队，花了九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印度舆论哗然。我在德里大学做中国发展模式的讲座时，在互动环节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中部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领导人在两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三天内就覆盖了所有1000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000多万灾民。这位印度学者听了之后，好像有点不服气，他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good governance（‘良政’）比bad governance（‘劣政’）更有效率。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证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励精图治’‘良政善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我可举出一百个例子，从伊拉克、阿富汗、海地、利比里亚等民不聊生的国家，到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如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同样，‘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国家。”我回答完，会议厅内陷入了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在反思。”

现在“良政还是劣政”这个分析范式已经为西方不少有影响力的人士所接受，例如：21世纪理事会主席尼古拉斯·伯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和《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他们合著的《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就明确赞赏这个范式；战略分析家、《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的作者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也肯定这个范式。2017年11月我在荷兰参加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时再次提出这个观点，赢得了很多掌声。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范式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西方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已经无法解释当今这个复杂而精彩的世界，而“良政还是劣政”范式更能把这个世界说清楚，包括把中国和西方的事情说清楚。我相信，这种中国话语也将影响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 谈谈“中学西渐”

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一定听说过一个说法，叫作“西方中心论”。过去两三百年西方世界崛起，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中心论”，一切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是愚昧与专制。我们国内学界不少人迄今为止还是“言必称希腊”。在他们眼里，只要中国做法和西方的不一样，那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乃至最终被西方社会所接纳，甚至不惜拆掉“故宫”建“白宫”。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审视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指出其不实之处，这也是今天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要从精神上强健起来，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中心论”。

五年前，我曾在荷兰做过一个谈中国道路的讲座。互动的时候一位法国学者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中国似乎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

“现代性”的英文叫“modernity”，在西方话语中，它一般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理性思维，以及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所谓的现代性，但这是一个大题目。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这位欧洲学者的。我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地点是海牙，就在离这个会场不远处有两个地方值得去看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斯宾诺莎是荷兰17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另一个是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瓷器博物馆。在斯宾诺莎的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是多么的渴望。他通过研究之后发现，中国不是一般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当时讲这个话很了不得，是革命性的。他说中国是自然法的国家，中国是相信自然规律的，他说这种国家治理更符合人性。而17世纪的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斯宾诺莎遭到了宗教迫害，被基督教会除名，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很有勇气，专门跑来海牙与他悄悄地见了一面。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

国家，它不像欧洲政教合一，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的、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为什么要去代尔夫特瓷器博物馆，因为它是荷兰的瓷都，类似中国的江西景德镇。荷兰在17世纪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最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中国进行贸易，把中国的大量瓷器运到欧洲，卖给欧洲各国，赚得盆满钵满。当时中国的瓷器有点儿像几年前的iPad、iPhone，整个中国的瓷器贸易在17世纪的欧洲是由荷兰主导的，荷兰因此发了大财。

中国瓷器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不仅是瓷器本身质地的精良，欧洲的瓷器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模仿，但到博物馆一看他们模仿的各种各样的中国瓷器，就是做得不像。一直到很晚，大概到了19世纪荷兰才掌握了制作瓷器的工艺，开始有自己的青花瓷。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还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瓷器上的图案所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主要还是宗教，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几乎都是民生，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自然的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从神学世界到人间，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我对这位法国人说：“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最重要的起点之一，就是中国。”

我们可能都听到过一个概念，叫“西学东渐”，也就是西方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实，历史上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中学西渐”，就是中国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的方方面面。

中国有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叫朱谦之，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著书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就是意大利。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商品和文化思想也传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大家都知道，威尼斯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回到欧洲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一时洛阳

纸贵，欧洲人通过这本游记了解到原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庶的大国。商人发现了财富，哲学家发现了思想。

我们现在说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数人说是林则徐，也有人说是魏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震撼，特别是对日本的崛起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一下子使亚洲知识界的很多人意识到欧洲已经明显地领先亚洲了。作为比较，我们 also 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于14世纪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给欧洲人带来的震撼只会大于当时《海国图志》给亚洲人带来的震撼，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一下子翻印了无数的版本。欧洲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在东方还有这么发达、这么了不起的文明和国家，所以他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探险，想到中国来寻求财富，也寻求思想。

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乃至对欧洲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伏尔泰，他是中华文明的“铁粉”，他说过很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这样写道：“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有些学者说，伏尔泰可能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可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向往。其实只要我们还原历史，还原到伏尔泰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和中国，去看看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会明白伏尔泰的评价所言非虚。欧洲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上半叶一直在打仗。当时欧洲多数国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战乱不断的原因是宗教之间，或者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进行的无休止的宗教战争，有学者做过统计，整个17世纪，欧洲大约只有三年没有战争，前50年有一年没有战争，后50年有两年没有战争，德意志民族经历了30年宗教战争。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一般认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战争而死亡。当时的中国是什么状况？是康乾盛世。中国早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多年中，不管当时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中国都是规模最大的统一的国家、总体和平的国家，而与天天在打仗的欧洲相比，伏尔泰把目光投到远方的中国，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

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歌德赞美中国和东方：“在那可爱的东方，我感到月的

光辉，树枝飘动的湖面上的幽光，在夏日中带来沁人肺腑的清凉。”中国古代文人的“月光”的意境就这样传到了欧洲。伏尔泰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看作对歌德这个诗句的注解：“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

可以说，从整个16—18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中学西渐”，也就是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不断地涌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的房门上贴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莱布尼茨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信息技术的基础。莱布尼茨还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则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双方可以优势互补，组成一种世界文化。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中国学者楼宇烈是这样概括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它促使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社会安定得令人羡慕和崇拜，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哲人统治，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一大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把中国的理性、大一统看作中国和平与强大的根本原因。

现在人们普遍把亚当·斯密当作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则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自由放任”，而这个概念源于法文的“laissez-faire”，一般认为它是魁奈从老子“无

为”的概念翻译而来。魁奈还专门谈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重视农业和民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国王约瑟夫在1764年也曾效仿，亲自参加了表示亲近农业的耕作仪式。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有这么一段描述：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我们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国家崛起和种族主义理论在欧洲兴起的过程。种族主义者认为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种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本人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停滞”的国家，以反衬西方所谓的“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后来也影响了不少中国人。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人提出过质疑。中国思想家严复早在1906年就发文，指出黑格尔哲学实质上是反自由的，同时还带有以进步或历史规律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进行征服的意味。中国思想家章太炎也对黑格尔提出批评，指出中国的庄子哲学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这些观点与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哲学家杜威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哲学家罗素反思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一致的。

中国学者刘梦溪有一本专著，专门考究中国历史上的“狂”，疯狂的“狂”，狂飙的“狂”。他说这个“狂”实质上就是一种自由，它在我们的文化中渊源流长；他说我们很早就开始有武侠文化，这是一种超然的自由。我们有自由文人的传

统，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桃花源记》。我们有绘画中的大写意、书法中的狂草、道家的崇尚自然、佛家的崇尚顿悟，这些都是崇尚自由的表现。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知识的自由。而这种传统在欧洲是很少见的。这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欧洲是不行的。欧洲在多数时间内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土地制度是直接农奴制，而中国是小农经济，小农家庭有自己的一片土地，而欧洲的土地在多数时间是不能自由买卖的，所以把中国说成是专制，把欧洲说成是自由，应该说是张冠李戴。欧洲人正是自己的自由太少了，所以拼命争取自由。回头看这一切，黑格尔也好，孟德斯鸠也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真是非常有限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地位”。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几乎全面领先于当时的欧洲。

今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上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学西渐”运动，一方面是有感于今天西方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另一方面亦有感于不少学者，包括中国学者还是陷在“西方中心论”中难以自拔。我这几年在西方做讲座，经常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借鉴中国人的“解放思想”，借鉴中国人的“实事求是”，否则西方的制度恐怕还将一路走衰。但不少朋友都对我说：张老师，你为什么老是要唤醒那些不想醒的人呢？让他们继续睡着不也挺好吗？

## “中西历史比较”解构西方中心论

之前探讨告别“西方中心论”，着重讨论了“中学西渐”的历史，强调西方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起源之一是中国。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了一份礼物——一本1688年，也就是17世纪末，法国出版的《论语导读》。马克龙介绍说，《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伏尔泰等法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产生过启发。这部《论语导读》的法文版原著据说仅存两本，一本送给了习主席，另一本存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所以习近平主席当时就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马克龙的话是一回事，现实是“西方中心论”在今天影响仍然很大，许多中国人也深受其影响，自信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有信心做下去。大家知道，历史上，“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曾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又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追根溯源，几乎都源于某种“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所以我们说，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树立四个自信，我们要从源头做起，要正本清源。

“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主流叙述大致是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到漫长的中世纪，然后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产生了工业革命、民主制度和现代世界。实际上这种叙述是晚至19世纪欧洲崛起后才形成的。但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要解构“西方中心论”，那一定要从古希腊说起。在解构“西方中心论”方面，一些西方学者作了相当多原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论点，使我们今天可以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

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关于古希腊文明的全新解读。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西方对古希腊文明的主流解读是西方学者虚构出来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撰写了一本专著，其标题就很有意思：《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这本书的第一卷就叫《构造古希腊：1785—1985》（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另一种观点认为，古希腊文明融入了许多东方文明的内容，因为历史上古希腊文明已经中断了，多亏了位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才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所以古希腊文明有东方的渊源。这种观点在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

马丁·贝尔纳的主要观点是：古希腊的政治制度、科学、哲学和宗教并非原创，而是源于亚洲近东的希伯来—腓尼基文化和非洲的埃及文化，尤其是古埃及文明，这在欧洲人眼里就是东方。但是从18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崛起过程中种族主义等因素的上升，古希腊文明被描绘成欧洲雅利安人的文化先驱。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极大争议，该书也因其颠覆性观点而荣获199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贝尔纳追述了欧洲学者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是如何通过重塑古希腊，进而完成对欧洲身份的重塑。他说，欧洲“迅速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真实的历史是古希腊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土地看成是“欧洲”，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欧洲人，无论是语言、人种还是血缘，都表明古希腊和欧洲雅利安人没有关系。贝尔纳认为，古希腊在文化上与东方联系密切，甚至被看作东方的一部分。还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只是后来被重塑成与东方没有关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谓的理性的欧洲和非理性的东方、民主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

贝尔纳的观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且这种争议还会持续下去，但我个人认为贝尔纳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古希腊文明来源的多样性。贝尔纳也至少纠正了一个错误，即欧洲史学界，特别是德国新古典主义学者，把古希腊文明“雅利安化”，即所谓高贵的希腊人独立创造的，只有“西方或者欧洲继承了下来”的近乎神圣的古希腊文明。这种观点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中国学者钱穆曾把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与中华文明作过一个比较，他是这样说的：古希腊是“有民无国”，也就是说，古希腊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松散组成的，所谓城邦大都规模很小，少则上千人，多则十来万；古罗马是“有国无民”，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常年征战，疆域很大，与中国的西汉规模差不多，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在公元5世纪，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而走向解体。相比之下，钱穆认为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坦率地说，这是欧盟今天都梦寐以求的。但这些在欧洲很难实现，因为欧洲文化里缺少统一的基因。今天中国崛起了，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或者叫“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好处：无论是人口带来的市场规模，还是地域规模带来的全面辐射力，无论是悠久传统带来的定力与智慧，还是丰富文化带来的精彩与恢宏。

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推出的“历史终结论”是错的，但他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

代国家的标志，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他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其基本标准是“统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也就是说，官员升迁依照能力标准，而不是像欧洲历史上的世袭制。福山说：“坦率地讲，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要素，公元前3世纪就已存在于中国了，这比它们在欧洲出现早了1800年。”他还说过，秦代中国的官僚政府“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福山的解释是客观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解构。

而约翰·霍布森在其专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则认为西方世界实际上经历过一个“东方化的西方”的过程。欧洲主流观点认为，文艺复兴主要指的是对古希腊各种各样的经典著作的发现，从而开始了一场文艺复兴，使欧洲走出了中世纪。霍布森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当年发动十字军东征，打到今天的小亚细亚这一带，突然发现了大量已经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的文献，包括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的东西。然后欧洲人再把这些文献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或希伯来文。换言之，古希腊文明本来已经销声匿迹了，多亏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后来又经过了上百年的翻译运动，才使欧洲历史衔接上了已经销声匿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而在整个过程中，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本身也都包含了许多东方的元素。实际上，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史学家和主流史学著作很少提及这些，就像他们也很少提及欧洲启蒙运动中这么多大家都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智慧一样。

霍布森还提出一个观点：“7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致地中海实际上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内湖，（西欧）成了亚非全球经济中的一隅之地。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发展尤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加拿大学者格温·戴尔（Gwynne Dyer）也在他的专著《战争》（War）中指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下，亚洲的伊斯兰地区保存了在欧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腊典籍。在欧洲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欧洲人得以把欧几里得、托勒密、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文字。戴尔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从中国和印度的发明中获益匪浅，而中国的许多发明就是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欧洲的。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 Diamond）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

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中也指出：“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包括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也承袭了希腊的学术。”

15—16世纪的欧洲被“西方中心论者”称为“伟大的航海时代”，但中国在总体上还是领先欧洲的。虽然中国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欧洲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就经济规模而言，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35%。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相比，规模也要大得多，郑和宝船长度超过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比80多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大百倍。

朱谦之认为，“在13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的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中国的纺织技术和造纸等技术也可能是经过意大利传到欧洲的。13世纪十字军东征后，曾经中断的意大利通往中国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欧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宋末元初抵达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他回到欧洲后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意大利乃至后来在欧洲多数国家都引起了轰动，西方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繁华和发达的国家。

英国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马克思当年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其实，不少“西方中心论者”大概也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探讨这些事实了。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国与欧洲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情况。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列出了几十种16世纪之前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重要技术，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龙骨车（比欧洲早15个世纪）、铸铁（比欧洲早10—12个世纪）、风筝（比欧洲早约12个世纪）、弓形拱桥（比欧洲早7个世纪）、独轮车（比欧洲早9—10个世纪）、弓弩（比欧洲早13个世纪）、深钻技术（比欧洲早

11个世纪)、活塞风箱(比欧洲早14个世纪)、瓷器(比欧洲早11—13个世纪)、河渠闸门(比欧洲早7—17个世纪)等。

最后再谈一点感想：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所谓的“疑古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等，全面怀疑中国先秦以前的历史，全盘否定中国远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统统称之为“神话”。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考古发掘的大量发现，这个学派的影响力早已式微。中国史学有“信史”的传统，也就是把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地下文物的印证结合起来，成为真正的“信史”。我想，我们的史学家能不能采用同样的精神和标准去考证一下古希腊的历史，崛起的中国不能老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至少应该用大致一样的标准去考察欧洲的历史，考察古希腊的历史，看看古希腊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称为“信史”，为形成中国自己的“西方学”打下基础。

比方说，亚里士多德全集已经出版十卷了，它最早的版本到底在哪里，我请教了一位史学界的朋友，他说，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残片，是德国考古学家在1890年发现的写在纸草上的文献，叫作《雅典宪章》，编号是“纸草131”(Papyrus 131)。纸草是一种植物，古埃及人发现去掉水分后，可以用来写字。《雅典宪章》经考证属于公元2世纪的作品，现在被界定为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可能是他学生写的，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这个文献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其他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版本大都是12世纪以后的了，离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至少有1400年了。当时中东地区有一个“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翻译运动，将其典籍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但现在阿拉伯文版的东西好像也找不到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典籍如《左传》《汉书》等，虽然也是到了唐代有雕版印刷才开始普及，但我们出土的一手古代文物和文献比欧洲要多得多，也要早得多。比方说，我们的《老子》有湖北郭店村的楚简，我们的《道德经》有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我们的《论语》有河北定州的西汉竹简，我们的《尚书》有清华竹简。这些都是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东西，离我们古代先贤生活的时代很近。

当然我自己不是史学家，更不是古希腊史专家，但我觉得用对中国史学同样的要求来要求西方史学和古希腊研究，并不过分，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个倾向，就是轻率地否定古希腊，认为古希腊历史肯定是伪造的。古希腊历史的很多谜团还需要大量的扎实的研究。中国学者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在掌握古希腊语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的一手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才能最终拿出令

人信服的成果。

谈中西方历史的比较，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历史上，西方文明从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从中国文明中借鉴了大量东西，才有了西方后来的成就。今天也一样，不同文明之间应该互学互鉴，中国文明也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借鉴了许多东西，所以才有今天中国的全方位崛起。

## “普世价值”面临的四重困境

“普世价值”，英文叫“universal values”。顾名思义，就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价值。这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自由、民主、人权”等，看作“普世价值”，也就是人不分民族、国籍、种族，都应该接受的价值观，所以西方还有一个概念，叫“价值观外交”，也就是基于所谓“普世价值”来推动的外交。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所谓“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看一看“普世价值”面临的“历史困境”，也就是第一重困境。

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一般说：西方国家一直在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说早在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就已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其实这是有悖于基本历史事实的。

法语和中文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它的名词分为阴性和阳性。所以法国人喜欢说他们的语言是一种比较精准的语言，比如用中文说“我晚上要见一个朋友”，法语做同样的表述，一般情况下要说出“un ami”或者“une amie”，也就是男性的朋友，还是女性的朋友。当然法语也有模糊的办法，你不想说见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你就说“我晚上有个约会”。

这就使我想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这是中国人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名称，其法语原文是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Citoyen，我们翻译成“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但学过法文的人可以看出，这个名称中间的“人”和“公民”(l' Homme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是男人

和男性公民，所谓更为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男性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再确切一点儿是白人男性，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回顾历史，就在这个“男性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通过三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兰普·德古热 (Olympe de Gouges) 的法国女性起草了一份《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也就是1944年，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才在法国得到实现。

1776年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是一批在美国很受崇拜的人，他们都是欧洲白人移民，大都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美国众议员是按照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在没有废除奴隶制的前提下，黑奴的公民权属于奴隶主，五个黑人折算成三个白人。

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是当时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 (1861—1865) 废除了奴隶制，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其后不久美国又颁布了新的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取消。

之后就是我们曾经谈过的，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殖民地掠夺的过程，他们迷信武力，迷信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3000多万人，法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阵亡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更加惨重，达9000多万人。西方种族主义者喜欢鼓吹所谓“理性的”西方、“经历过启蒙运动”的西方，和“愚昧的”东方、“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的东方，对这种谬论的最好回击就是指出，为什么“理性的”西方会发动给自身带来灭顶之灾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一定的反省，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

但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主要国家的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也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于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写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经过去了187年。

其间，美国国会在1882年专门通过《排华法案》，这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基于种族歧视的移民法。190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无限期延长《排华法案》的议案，这曾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05年在上海等很多地方曾爆发过抵制美货的运动。这个法案的废除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了，而对华人的正式道歉则是2012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的130年之后。

我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也就是说，即使“普世价值”这一概念能够成立，那么其内容在过去200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普世价值”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程序困境”。“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西方主流媒体经常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人们不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自由、民主、人权”是西方认定的“普世价值”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世界上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同“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就是不接受这一点，它要保留发动战争的权利。再比方说，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大量的价值。中国人高度重视“仁爱”“团结”“和谐”“责任”等价值，这些价值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呢？如能，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不能，那就要解释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换言之，所谓的“普世价值”首先就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总该有一个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筛选程序，总该让世界各国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么大的事，却只能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公正可言了。

换言之，“普世价值”要“普世”，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经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比如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来进行讨论乃至谈判，最终形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才是真正的“普世”。否则的话，就会是少数西方国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把自己界定的一些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然后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利益与福祉的巨大损害。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十年发生太多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不都是如此吗？今天的委内瑞拉也是如此而岌岌可危。我们老说，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人发奋图强，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但崛起的中国今天还要追问西方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你比人家发达，你就可以欺负人家，谁给你这个权利的？这是不允许的。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就是要发挥这个作用，我们今天对“普世价值”的话语进行解构，也是要揭露西方这种霸道逻辑、强盗逻辑的不义之处。

第三，“普世价值”概念本身也存在困境，或者叫理念困境。西方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但这似乎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人们不妨设问：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自由、民主、人权”才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美国民主花这么多钱，这应该算“民主”还是“钱主”呢？英文中民主叫“democracy”，但美式民主花这么多钱，更像是“钱主”，我创造了一个英文单词“monetocracy”；鉴于西方民主给很多国家带来了混乱乃至战乱，有学者朋友发明了“democrazy”一词，也可以翻译成“疯主”。

西方到处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明确地回应，即使抽象的“民主”某一天成为“普世价值”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自己独特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属于“地方性知识”，就像任正非所说，“美国不代表全世界，美国只能代表世界的一部分”。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像把希特勒选上台这样的深刻的教训，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望一个，失败一个。从今天西方自己面临的种种危机来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大量的缺陷，甚至积重难返，坦率地说，几乎看不到希望。

“自由”也是一样，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同时监控那么多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

公民的网上言论和通信，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通话，这种美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是全世界应该效仿的吗？最近有个笑话，美国人对德国人说：听说你们要买华为的5G设备，请你们务必不要买，中国会通过华为监控你们。德国人就问美国人：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买华为？美国人说：我们从默克尔的电话里听到的。加拿大不是号称有言论自由吗？但加拿大驻华大使就孟晚舟事件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后，马上被加拿大政府解职了。其实，所有国家的言论自由都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人权，情况更是复杂。比方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并参加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但美国坚决不加入这些公约。换句话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美国不属于人权。我曾跟美国人说，你们迄今还有超过2800万公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如果你们能够从人权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就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愿意这样做。其实，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多数人民是难以想象的。美国的枪击案这么多，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击，能不能从人的生命权来看待这个问题，好好保护美国老百姓的生命权？即便美国的制度效率低，但能不能在20年内想办法做到至少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人人都可以饭后随意地散散步？

从西方国家内部来看也是这样。比方说，瑞典的社会福利比较高，但这种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是西方国家里为数不多的至今还有国教的国家，英国国教是学校的必修课。这种规定在法国就会被看作政教合一，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认为他们是世俗国家，一个政教严格分离的世俗国家，他们无法容忍英国人的做法。但法国公立学校禁止穆斯林女学生在教室戴头巾，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而这些在英国和美国目前还是难以接受的。

人权领域内有分歧，也有共识。比方说，全世界都认为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硬是在2010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所谓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而刘晓波是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300年的。我当时就撰文质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审评委员会，这样做究竟是出于同情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如果说这是前者，那他们就是公开蔑视人权；如果是后者，那他们就欠中国人一个道歉。

在解构西方话语方面，我推荐一个方法。一些西方国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来忽悠人，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的抽象概念适度具体化，然后再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不大会被西方话语忽悠了。抽象地谈这些概念，自由挺好，民主挺好，人权挺好，谁能反对？但如果把这些概念适度的具体化，所谓言论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刘晓波把中国殖民300年的言论算不算言论自由？美国大规模地监听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的电话和电子通信，算不算限制言论自由？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的，“钱主”算不算民主？把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最后，是“普世价值”的“法律困境”。这个困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能不能超越主权的问题。西方经常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但《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以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被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

但西方一些势力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如果今天到伊拉克去了解一下，当地很多老百姓会说，我们不喜欢萨达姆，但过去我们就一个萨达姆，现在至少有一百个萨达姆，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萨达姆，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内战。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人权高于主权的话，那么现在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我们是不是要呼吁对西方国家进行制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是明显地违反人权，欧洲国家大部分老百姓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侵权人权，那欧盟为什么不带头制裁美国呢？这个问题一旦展开之后，就可以把其他问题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是百分之百的霸权主义。

其实，在2014年，西方也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俄罗斯总统

普京用同样的理由出兵克里米亚，支持克里米亚俄罗斯族群保护自己的人权，并让那里的公民通过公民投票加入俄罗斯联邦，此时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突然谈起了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全世界都笑了，好一番热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 五个视角比较中美民主模式

前段时间，任正非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美国不可能摧毁我们，世界也离不开我们，因为我们更先进。”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他还说：“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啊。北方不亮还有南方亮。美国不能代表世界。美国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还有比这更掷地有声的话吗？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该做的事一定要做，美国是最承认实力的。唯有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

中国话语的崛起有一个绕不过的坎，就像华为的崛起也有绕不过的坎。华为的坎是西方的技术垄断，但华为迎难而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突破了这种垄断，实现了超越，最终得到对手越来越多的尊重。中国话语崛起的坎是什么？是西方话语，这背后是西方的整个政治和文化软实力。但这个坎我们一定要过，也一定能够过。比方说，西方迄今还或多或少垄断着民主的解释权，尽管西方民主早已弊病丛生，但还享受某些话语红利，还可以忽悠世界上不少人，包括一些中国人。我们也要向华为学习，迎难而上，在解构西方话语的同时，建构中国话语。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何谓民主。

应该说，民主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民主话题讨论的难点首先在于如何界定民主，关于这一点整个世界都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如果你问西方人，他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说，不就是“多党制+一人一票”吗？我认为这叫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形式可能反映实质，也可能不反映实质，但形式不等于实质，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民主问题的逻辑起点。

但如果用中国人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来讨论民主，西方也很难理解。面对这样的定义困境，我们有没有办法，以中西方都听得懂的语言来讨论民主呢？我认为是有办法的。2016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次比较中西方民主的演讲，是一次有意义的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基于那次演讲，再结合这些年的情况发展，我来说说我的观点。

我认为，既然我们一时还无法就民主的定义达成共识，那我们就暂时借用一下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1863年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首先要指出，林肯当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观点时，他所说的“民”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妇女，也不包括华人，因为美国在1882年还通过了《排华法案》，剥夺了华人的基本人权。而美国真正给黑人投票权是1965年，但这不妨碍我们暂时借用一下林肯的这个论述来讨论民主问题，我认为西方学者也不介意。所以我暂时就把民主界定为“民有、民治、民享”，作为working definition（姑且可为一用的定义），然后把这三个方面中美双方的情况逐一进行比较，以此我们可以就民主这个话题得出一些比较慎重的结论。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美国是最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推销其政治制度的国家，所以我们单挑美国出来比一比。

先从“民享”开始。所谓“民享”（for the people），也就是“为人民”。中国模式即便再不完美，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过去40年，中国有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从40年前的零，到2018年为约4亿。

同一时间段内，美国是什么情况呢？美国的情况是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4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调查，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与1978年，也就是与40年前的水平大致持平。但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却缩小了很多，由1971年占美国成年人口的61%下降到2016年的52%。

从家庭净资产来看，中国家庭净资产增长迅速，美国中位家庭净资产则下降了不少。2016年美国中位家庭净资产为97300美元，迄今还没有达到2007年的最高水平（139700美元，约合2018年人民币94万元）。如果按照1美元=6.75元人民币计算，那么97300美元约等于65.6万元人民币。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美国整个国家的中位净资产的水平，在中国应属于什么水平，在上海应属于什么水平。家庭净资产的计算方法为用一个家庭的房产和金融资产等总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我的判断是，根据美国整个国家今天的家庭中位净资产，美国中产阶级至少在中国的发

达板块，应该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了。

新中国成立前，上百年的战乱导致中国的彻底贫困。美国作家白修德 (Theodore Harold White) 于1946年发表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Thunder Out of China) 所描绘的旧中国给人的感觉就是今天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造成了上千万人的伤亡，整个国家哀鸿遍野，经济彻底崩溃，人均寿命才40多岁。而短短70年，中国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多数百姓的财富大幅增加。40年前，怎么可能想象比较中美两国百姓的家庭净资产？今天，中国一点也不害怕这种比较，这也从另一个视角说明了：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在“民享”方面做得比美国要好很多。难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1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民主出了什么问题”的长文，引用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当时的民调：2013年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到满意，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1%，英国为25%。文章认为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停滞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给西方制度带来的重创，二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

这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观点：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民主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样的话，但它引用得不准确，我的原话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现在证明我当时的预测也是对的。

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一下：40年间，中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22.8倍，而美国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却没有增加，当然中国收入的起点低，但这样的巨变还是了不起的。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两个国家百姓的家庭净资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点，“民有” (of the people)，也就是“来自人民”。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平民文化的传统，中国政府的“民有”程度显然高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高于美国这样资本力量影响过大的国家，也高于英国这样贵族传统很强的国家。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90%来自普通家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来自普通家庭；即使所谓的“红二代”领导人，至少也在各级岗位上经历了30多年的历练，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才可能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

反观美国，美国国会议员中富翁占50%左右，而美国普通民众当中百万富翁的

比例只有1%，特朗普本人也是超级富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干脆将今天的美国政府描绘成“1%有、1%治、1%享”的政府，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美国学术杂志《政治前景》(Perspectives on Politics)在其2014年秋季号上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学者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该研究比较了从1981年至2002年间美国政府制定的1800多项政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几乎都是由代表商业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制定的，而基层民众组织和普通公民对决策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如果后者与前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后者是无能为力的。

第三点，“民治”(by the people)，或者叫“人民治理”。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索的问题。尽管西方声称，如何实现人民治理，西方已经找到了答案，就是每四年一次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还有国会议员的选举，即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就是“人民治理”，但西方相信这个说法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如今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选完就后悔”的问题(elect and regret)，当选后一年内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率低于50%的状况已不在少数。以美国国会为例，根据盖洛普民调，其过去五年的支持率一直低于20%。如此之低的支持率，美国国会还宣称自己代表美国人民，已十分没有说服力了。

说白了，你无非就是制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只要选上，之后不管支持率多么低，在法律上，你还是可以代表你的国民。把这种状况说成是“民治”和“民主”，怎么令人信服？这正好印证了法国思想家卢梭当年对英国民主的批评：英国人只有在四年一次选举的时候是民主的，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奴隶。美国人选出了小布什，他治国无方，发动了两场愚蠢的战争，也没有察觉金融危机即将爆发，结果给美国造成了那么多问题，最后支持率只有20%左右，但还是照样代表“民治”，这不是对“民治”的最大讽刺吗？

2019年1月，我参加了瑞士的达沃斯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4.0与全球治理新架构”。在讨论中，一位美国的资深学者认为，新的全球治理架构还是需要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我表示赞同，但我认为如何界定民主才是关键，它必须是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的共识，而绝对不能是美式民主，不能是这种连美国总统本人今天都很不满意的民主。这位学者问民主还能有其他形式吗？我说，你讲这个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你真的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好，你们就留着自己用，千万不要拉其他国家一同下水，中国是肯定不奉陪的。

那么，过去数十年来中国人是如何探索自己的“民治”和“民主”的呢？在此，我想引入“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这两个概念。如果说西方主流观点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认为“普选制+多党制”几乎就等于民主的话，那么中国则把重心转到了“实质民主”的探索，认为从“实质民主”出发，也就是从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和结果出发，来探索“程序民主”，而不是相反。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中国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所谓“更高”，指的就是更高水准的民主，特别是要尽可能地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关切，同时又能避免西方民主制度明显的弊病，如资本力量影响过大、民粹主义、短视政治等。所谓“更切实”，就是能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政客开空头支票的“清谈俱乐部”。

从民主的“目标”和“结果”出发，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质量，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请注意，邓小平把“人民的团结”和“改善人民生活”放在一起，现在看来，这是很有远见的。西方政治模式把多少国家搞乱了，搞得人民四分五裂。乌克兰陷入内战、叙利亚陷入内战，伊拉克和阿富汗几乎天天都有爆炸事件，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所以“阿拉伯之春”怎么能变成“阿拉伯之冬”？邓小平的第三条标准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我经常用这三条邓小平标准，或者叫中国标准，来评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的质量，并给它们打分。如果我们用A表示最好，D表示最差，那么对于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得分就是D，对于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得分是C-到D。对于中国台湾地区，我给的分数是C-，没有降到D，很大程度上是靠中国大陆的帮助，因为大陆经济的腾飞，给台湾创造了机遇。

总体上看，中国民主建设也是围绕着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条标准展开的。中国比较注意融合中国历史传统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模式中的有益元素，大胆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这种探索的内容非常之广，比方说，领导人产生的方法，美国是选举，我们是“选拔+选举”。中国人自己治国理政的许多理念充满智慧，源远流长，如“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等观念是中国社会上千年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像西

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我们选贤任能的制度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如历史上的“察举”和“科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传统及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最终形成了“选拔”与某种形式的“选举”相结合的制度。今天，一个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历练远远超过西方领导人。中国高层领导人大都在基层长期锻炼过，很多都治理过两三个省，至少管理过一亿人，还在党、政、军不同部门长期工作过。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西方那种所谓“只要制度好，傻瓜也能治国”的神话已走向终结。过去中国没有崛起，西方可以忽悠全世界，现在中国崛起了，人家就要说，你看看中国是怎么做的。西方世界里的冰岛，领导人无能，国家就走向破产。美国领导人无能，美国的国运就全面走衰。

其实，除了“*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些标准外，我想如果用中国标准，我们还可以加一点，也就是第四点：“*with the people*”，即“与人民在一起”。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就是各级政府与全中国人民一起干出来的。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叫人民军队，我们的警察叫人民警察，我们的铁路叫人民铁路，我们的教师叫人民教师，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人民”这两个字是千钧之重啊！习近平总书记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什么是不能改的？“人民”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绝对不能改的，不仅不能改，还要发扬光大，它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上克敌制胜的法宝：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正因为我们坚持了“与人民在一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了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这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我想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第五点：“*to the people*”，就是我们常说的“到群众中去”。比方说，我们决策过程的最大特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民主集中制”。旧民主集中制是苏联模式的产物，最后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而中国汲取了苏联民主集中制度的教训，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新型民主集中制”。比方说，国家五年计划的制定，现在已经定期化、制度化，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协商，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方法，最后才形成有质量的共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大概都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成功执行奠定了中国迅速崛起的稳固基础。西方人经常感

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没有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奥巴马的医改计划，换个总统就偃旗息鼓了。中国是一届接着一届干，直至成功，西方经常是一届对着一届干，坦率地说，怎么和中国模式竞争？

我的结论很简单：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一切在于比较。从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在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我认为中国模式相对胜出，而且前景看好，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不足和挑战，我们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做得更好。但哪怕就现在这个水平，中国模式也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并且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 好民主才是人民之福

现在网上有一种观点，叫作“不要比烂”。你说，阿富汗、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一个比一个糟糕。他问，为什么要比烂？你说，印度搞了民主，但印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他问，为什么要跟印度比，不能跟美国比？你说，美国多数人的收入在过去40年中没有增长，结果导致了民粹主义泛滥和特朗普上台。他又问，不要比烂，你为什么不和北欧国家比呢？其实，和北欧国家也是可以比的。

这种说“不要比烂”的人往往有一种心态：容不得别人说中国好，容不得别人说中国进步快。这些人大都还生活在对西方世界的无比憧憬之中。只要中国的制度和做法跟西方的不一样，就是中国不对。

其实，所谓“比烂”，其始作俑者是西方人，不是中国人，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制度并不好，但其他制度还不如民主制度好，所以西方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其实就是“比烂”的最早版本。这句话被许多人视为经典，一说到西方民主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就说这是“最不坏的制度”，结果导致很多人、很多国家，不思进取，即使他们的民主已经变成了“烂民主”，他们还是觉得心安理得，反正其他制度都不如我们的好。

这就引出了我想讨论的话题，我称之为“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烂东西，或者叫坏民主只能是坏东西”。我去过很多地方，对西方民主的忽悠给其他国家造成的困境和灾难，感同身受。我的结论很简单：谈民主问题，一定要区

分“好民主”还是“烂民主”，否则要出大问题。

早在2006年，我就给《纽约时报》国际版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中国模式，同时也批评西方输出其民主模式，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这样做。我写道：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大量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了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长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结果是令人沮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我当时引用了两位美国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写的专著，书名很有意思，叫《从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从整个20世纪90年代举行所谓的自由选举之后，一些国家马上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战，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战，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战，布隆迪和卢旺达内部开始大屠杀，一百多万人丧生。

其实，西方强行在非西方世界推行西方民主模式，是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多于幸福。后来的“阿拉伯之春”成为“阿拉伯之冬”也是这样。2003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推行了一个阿拉伯民主改造的计划，他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结果到2006年，他把这个计划暂时搁浅了。为什么？因为在巴勒斯坦一人一票选出了哈马斯政权，而哈马斯政权在美国人眼里，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但到2011年前后，中东出现乱象之际，美国又开始推动中东地区的所谓“第二波民主化”，也就是“阿拉伯之春”。当时西方世界一片欢呼声，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终于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当然，我们已经看到结局，“阿拉伯之春”很快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上百万甚至更多的难民要么已经流入欧洲，要么时刻准备着流向欧洲，这也成了欧洲今天最头疼的政治难题。

2018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德国智库沟通，专门花时间了解中东难民问题的规模，德国研究机构说，土耳其至少有300万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在等着，难民问题简直成了土耳其政府的“人质”，动不动就用难民问题向德国要钱。整个北非至少还有300万难民等着，其中利比亚至少有100万，随时准备涌向欧洲。德国总理

默克尔最初的设想是，德国带头先接收难民，反正德国经济也需要劳动力，不如就以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名义欢迎中东难民。默克尔当时天真地估计其他欧盟成员也会跟上，没想到其他欧盟成员忘记了“普世价值”，他们只是把难民送到德国的大门口：既然德国人喜欢就让德国人来处理吧。结果默克尔在德国的威望一路下滑，现在已经准备退出政治舞台了。其实欧洲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为什么要大力支持“阿拉伯之春”呢？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还要提一下南斯拉夫解体，我曾实地考察了两次，今天想起来都痛心。我第一次去南斯拉夫是1986年，当时我感觉南斯拉夫就是发达国家，觉得中国哪一天能够达到这种水平，那就太好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看上去一片繁华，公寓、别墅、高速公路、超市，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后，我又专门实地考察了几个独立的共和国，感触良多，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民主是西方最喜欢向全世界推销的东西，但西方自己却忘记了，西方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在谈到民主的时候，都是慎之又慎的。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很大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对民主问题的思考。

谈民主一般都要追溯到古希腊，因为那是公认的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那是一种原始的民主状态，古希腊有很多所谓的“城邦”，规模大概等于中国今天的村和镇的人口数量，在那里男性公民，不包括妇女，也不包括占人口多数的奴隶，通过召开公民会议来决定是否对外宣战，是否对外媾和，还有法庭对犯人要判什么刑等。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因“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被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样的民主等于是“暴民政治”，英文叫“mob politics”。柏拉图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应该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必然导致“暴民政治”。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如果你生病了，你是找一个经过良好训练、有资质和大量实践经验的医术精湛的大夫，还是到广场上让毫无医学知识的人随便给你选个人帮你治病？他说你当然会找专业大夫，而治理国家这样的事情，其责任和难度，百倍于大夫，那么你该找谁呢？毫无疑问，应该找有资质、有经验的治国人才。我想，柏拉图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观念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治国要靠专业人才，而人才要有历练和资质。光是能说会道、耍嘴皮子就能当国家领导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属于匪夷所思。我想这也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一路走衰的主要原因。所以我经常跟美

国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说：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你们的制度好，一定留着自己用，别拖着别人下水，我们不奉陪。

西方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操作精致、内容丰富的民主大大简化。连国情、文化、传统、教育水平、法治水平等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只要有“多党制+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在推动这种粗糙简陋的程序民主的同时，还创造一套指标体系来证明西方民主就是好。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世界上劣质民主层出不穷，多少国家一失足成千古恨，致使国家陷于长期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今天西方国家自身也感受到“民主原教旨主义”带来的危机。英国脱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政客想通过豪赌公民投票，拿国家利益当儿戏，结果把戏演砸了。

所以我说，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好民主才是人民之福，烂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关于烂民主还有一个经典案例：“多党制+一人一票”选出了德国的希特勒。那是1932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利用德国百姓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的严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手段，轻而易举地获得了37.4%的选票，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德国产生了许多长于理性思维的哲学家，但德国人通过“多党制+一人一票”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不仅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甚至几乎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我想如果柏拉图能够活到1932年的话，他肯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而古希腊的另外一位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有这么一个洞见：民主制度要成功的话，需要两个元素，第一是要有足够的中产阶层，第二要有法治。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中产阶层，他认为民主制度很难成功，因为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穷人会忌妒富人，社会就会出现持续的不稳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中产阶层自我感觉易满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民主制度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崇尚稳定的群体支撑，才能巩固。

关于法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这对维持民主政权的稳定非常重要。民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议，没有法治就无法解决各种争议。如果解决不好，这些争议可能发酵，直至毁灭一个国家。比方说，一旦选举出现了选票统计上的争议怎么办？大家要听最高法院的裁决，否则就会出现输者不服、民主游戏玩不下去的局面，就会导致国家混乱，甚至崩溃。

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之后，许多国家陷入危机和动乱，这既与缺少中产阶层有关，也与缺少法治有关。过去一般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制度早已成熟，不会经历这样的危机。但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我们看到了令西方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场景：在特朗普和希拉里进行的竞选辩论中，电视主持人华莱士问特朗普，如果万一您输了，您是否会接受这次投票的结果。特朗普面对摄像机、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顾左右而言他，说：“我留给你一个悬念，我到时候会看。”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当然，我会接受完全公正无误的投票结果，但我也保留质疑并调查存在疑问的投票结果的权利。”当时美国主流媒体一片哗然，认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准备挑战美国的法治了，这是不可思议的。

最近情况也是一样，美国媒体经常报道特朗普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指控，从“通俄门”到偷税漏税等，特朗普可能会遭弹劾而下台。但特朗普的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也是一位共和党的资深政客，是这样说的：这样的举动会让美国陷入混乱，“有些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会‘造反’”。已经有很多媒体报道，如果特朗普遭弹劾，他的铁杆粉丝会暴动。今天很多美国人感叹：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现在越来越降低到“第三世界”的水平了。

谈民主，我们还要提一下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是最早在西方提出“主权在民”思想的人，这个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法国的仁人志士，甘愿为民主抛头颅洒热血。他在《社会契约论》这本著作里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很多学者看得不够仔细，可能没有加以足够的注意，他说假设你生活的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万公民，那么你手中的一票，影响力是万分之一。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变成十万，那你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减少了十倍，从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同样，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变成一百万，那你的影响力、你手中这张票的影响力，就减少一百倍。他的结论很简单：人口越多，选票的影响力就越小。所以他觉得像一人一票的民主，更适合小国家，而且小国家的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社会矛盾不能太激烈，否则民主将很难实行。卢梭的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国家越大，人的感觉就是自己手中选票的影响力越小，自己离政治决策中心的距离越远。这也是中国这样拥有超大型人口的国家在建设民主的时候，要特别思考的一个问题。

还要提一下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位重要学者哈耶克（F. A. Hayek），他对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多疑虑，他认为民主应该被严格地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程序民主，而不是终极价值。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其名著《通

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他对民主建设提出的忠告值得注意。他说：“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哈耶克特别反对民主对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等。他提出的这个概念“民主拜物教”很有意思，有点儿像我所说的“民主原教旨主义”。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都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他们主张为民主而民主，而民主又只有西方形式民主这一种形式，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也导致了西方自己的一路走衰。

毫无疑问，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随着特朗普上台，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西方民主的光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迅速褪色，但我们还是要注意，西方民主模式尽管遭遇重大挫折，但西方民主话语的红利还没有耗尽，西方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继续唱“空城计”，还可以忽悠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糊涂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汽车就没法开在泥泞的小路上。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铁、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与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还不如说好民主才是好东西。也有人会说，这样会使问题复杂化，比方说，我们可以讲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那么你是否也可以说好社会主义才是好东西。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民主这个概念，已经被西方先注册了，西方几乎掌握了定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西方话语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垄断，使我们有必要加上一个形容词，才能把事情说得更清楚。

我还要指出，随着西方民主自身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困境。2010—2011年，比利时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之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并在宣言中非常直白地指出：“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比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记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总之，西方许多有头脑的哲人对民主制度作过很多认真的思考。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如何，他们对民主的思考水准，从总体上看，远远高于今天那些在全世界到处推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人。

## 西方人权话语的缺陷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西方以及受西方势力影响的很多人天天在骂中国，毛主席曾说过，帝国主义是如此地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已经习惯于当全世界的法官，喜欢教训别人。其实，西方的人权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大量的问题，一点就破。西方对中国妖魔化的一个论调就是，不管中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都要质疑：为什么中国人权状况每况愈下。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西方人权话语的回应不够强势。我们经常用的话语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我们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语有道理，但我个人认为还不够透彻和强势，或多或少留了一个口子：我还没有发展到你的水平，还不能采用你现在的标准，所以西方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道德制高点，可以随时敲打我。我个人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首先就是要非常自信地剥夺西方的道德制高点。

对于西方无端的人权指控，我有几个回答在很多国际场合都用过，效果不错。2017年，我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西方学者劈头就质疑中国人权问题，我说中国今天每年出境的人数已经达1.2亿人次，99.999%都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为什么回到一个照你们说没有人权的地方？为什么回到一个照你们说人权每况愈下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情况一定是恰恰相反，中国一定是世界上人权进步最快的地方，人民对自己和对国家前途最乐观的地方。这是个常识判断，如果这一点都不承认的话，那我们还怎么交流？

如果是美国人质疑中国人权问题，你可以告诉他，21世纪对人权最大的侵犯就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超过十几万的平民无辜死去，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你可

以告诉他，如果美国不就自己侵犯伊拉克人权的情况作出解释和道歉，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

你还可以告诉他们一个如何看待人权的方法，就是一定首先要问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问美国人和欧洲人。我认为谈论中国人权的好坏，应该先问无论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境外的中国人，中国人权是好还是坏；你也可以查一查西方有信誉的民调机构，如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法国的益普索等过去五年到十年在中国做的民调。这些民调几乎都证明，中国人是对自己国家前途最乐观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国人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人似乎更相信三人行，我必为师。因此，对于中国，西方甚至要13亿人行，他必为师。这就太傲慢和无知了。

这种傲慢和无知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很多西方人总认为自己最了解这个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我去过不少非洲国家，西方总认为非洲的民主化必须是压倒一切的，但我认为，至少应该问一问非洲人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非洲人最想解决的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消除疾病问题，但西方硬要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结果使多少非洲国家陷入了动乱和饥荒？

中国现在积极在非洲推动“一带一路”，西方则质疑中国为什么不对一些所谓非洲独裁国家进行制裁。这就涉及一个理念上的巨大差别。从中国人的理念来看，消除贫困本身就是一项核心人权，帮助非洲国家脱贫就是在实现一项核心人权，任何国家都不能找任何借口来阻碍这项人权的落实。这就像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它是不分敌我的，而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如果要制裁一个国家，那需要通过联合国授权来共同进行，而不能只是几个西方国家说了算。西方在非洲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成了一种政治勒索，受援国家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的说法叫作“向东看”（looking East）。

西方之所以老是盯着中国人权问题不放，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习惯了“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做法，才能代表人类最好的制度和做法。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不文明。对于这种傲慢，我们必须给予

迎头痛击。

西方人权话语体系，从表面上看，头头是道，其实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下面我把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主要缺陷略作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们今天讲人权，如果采用联合国的人权标准的话，一般有第一代人权，也就是政治、公民权利；第二代人权，一般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还有第三代人权，如环境权利等。西方人权体系的缺陷是在不同的人权之间缺少一种平衡。西方一般强调的主要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比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到现在连第二代人权，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都不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参加国际人权公约最少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共有九个核心国际人权公约，美国有六个没有参加——《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

美国现在还有超过2800万人口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不少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美国妇女没有带薪产假。这些都属于违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当然美国没有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西方国家几乎迄今为止都没有做到男女同工同酬，这也是违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精神的。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学者向我质疑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说：你最好首先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人权，关心一下你自己和贵国的女同胞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是违背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第一款的。美国的问题则更为严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开始直到今天，美国的种族矛盾、族裔矛盾、种族歧视等问题，按照联合国标准，都涉及基本人权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就职后，美国各种右翼的活动明显上升。2017年美国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数量上升了17%，所谓仇恨犯罪就是基于种族、肤色、民族等的犯罪行为。

第二，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关系的困境。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但这种担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为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一位法国漫画家和一位丹麦漫画家以个人的言论自由权，挑衅十多亿穆斯林，亵渎伊斯兰教“先知”。一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人强调权利与义务

平衡的哲学理念将更适应全球化时代人权发展的趋势。

第三是一个国家有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推动人权的优先顺序。西方认为没有，这是荒谬的。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的方法几乎都是政治权力压倒一切。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优先，而不是消除贫困优先，结果很糟糕。在一个充满贫困的国度里，按西方的逻辑去推动人权，结果就出现了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烂民主”：缺少基本的社会秩序，几乎每天都发生各种爆炸案。

其实，实现人权应该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中国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在短短40年内实现了7.4亿人口的脱贫，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做，消除贫困根本就不是人权，毕竟美国至今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就这样做了，总体效果非常之好。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启迪，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问题就是消除贫困。无疑，会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希望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

第四个缺陷是法条主义问题。西方把人权问题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问题，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能算人权问题，这在法制不健全、律师力量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操作，代价也非常昂贵。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促进人权最好的办法是在推动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这是中国促进人权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然在讨论人权时，我们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是人类社会应该接受的共同底线，比方说禁止酷刑和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随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主流观点没有分歧。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整个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这些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人权的关系，这关乎人权机制或者体系下一步应如何发展。国内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争议，有一首歌在十多年前非常流行，叫作《常回家看看》。歌词是“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跟爸爸谈谈”，这首歌当时一下子就在整个中国流行起来了。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首歌歧视了妇女，但

大多数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生活的过分忙碌，但再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父母。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的文化传承，这是一种温馨的人文传统。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比西方人权理念的出现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么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权标准。世界人权事业的未来方向应该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从而丰富人权的理念。我们要防范那种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普世价值”、把别人的文化说成是落后习俗，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

今天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问题是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问题，它也和人权有关，它反映出整个西方人权机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西方国家支持“阿拉伯之春”，但很快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也门同时进行着三四场战争，这样一个小国，连2000万人口都不到，同时进行着部落的战争、族裔的战争、宗教的战争，还有南北方围绕国家统一还是分裂的战争。同样悲惨的还有叙利亚，15年前我曾去过叙利亚，当时那里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国家，大概有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但今天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成了难民，主要城市都成了残垣断壁。我对西方人说，你们是在这些国家造孽！把伊拉克搞乱了，把利比亚搞乱了，把叙利亚搞乱了，其实这些国家过去都不穷，有的甚至相当富裕，他们过去的人均GDP都高于中国，现在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但西方现在还企图搞乱中国，对于这种企图，我们要给予迎头痛击。

所以我跟欧洲人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时候，你们是一片欢呼声，但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充满了混乱和战乱，已经有100多万难民流入欧洲，还有更多的难民在路上，这已经把欧洲政坛搅得昏天黑地，今天欧洲的主要问题几乎都和难民危机有关。这背后所展现的人权困境，即西方当初推动“阿拉伯之春”，显然不符合当地的民情与国情，结果是严重的水土不服，导致全面打破了当地过去一些非常微妙的族裔的、宗教的平衡，变成了内战。

而在难民来到欧洲之后，西方人的很多行动和言论，也都是违反人权的。欧盟国家都签署了联合国的难民公约，这个公约有一个重要条款，叫“non-refoulement”，这是一个法文单词，在英文中也这样用，就是不能推拒的意思。也就是说，难民如果到你的国家申请避难的时候，你不能推拒，而是要甄别他是不

是难民，但现在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而是派重兵把手边界，拦上铁丝网，全部拒绝在外，这就违反了你们签署的联合国难民公约。欧洲的民主国家，当初几乎都是积极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有的甚至是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像英国和法国则是带头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今天闯了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民涌到了家门口，全都不接收，连甄别程序都不给人家。这些难民，在本国许多都是中产阶层，但国家完了，他们的一切也完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国破家亡”。中国人过去经历的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中国人把国家的命运看得很重，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痛恨西方搞乱中国的图谋，痛恨那些帮助西方搞乱中国的“带路党”。

现在欧洲内部困难重重，经济情况也不好。而西方国家的制度，只对自己国民负责，现在经济不好自顾不暇，哪有精力和资源来照顾涌入的难民。所以我跟欧洲人也说，你们老是搞人权外交，但欧洲内部各个领导人的说法都不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一种说法；英国前任首相卡梅伦是另外一种说法，卡梅伦早就说过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又是一种说法，欧尔班非常明确地拒绝欧盟分摊难民安置的计划。你欧洲内部都没有达成关于人权的共识，又怎么好意思向全世界推动人权外交呢？

所以，我从总体上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中国人自己也可以把人权问题说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把西方的人权问题，把世界的人权问题，把西方推动所谓人权外交所造成各种人权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今天我们解决“挨骂”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 “整体利益党”还是“部分利益党”？这才是关键

近些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西方自己长期地误读中国，误读中国共产党。直到2012年，西方主流政治观察家还认为中国要崩溃。“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主持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当时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他们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不对，就要走衰，甚至要崩溃。

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不必等西方觉醒，我们要大踏步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他们的学者、他们的智库、他们的媒体、他们的政客大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今天的极端焦虑、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一会儿关闭孔子学院，一会儿吊销中国学者的签证，一会儿宣称中美之间是不同种族的竞争，还有人要和中国经济“脱钩”。特朗普总统甚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防范外国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坦率地讲，中国一家公司可以让美国总统宣布整个美利坚合众国都进入紧急状态，这本身不就很震撼吗？现在变成我们要提醒美国：你要自信，你还是超级大国，没有人要夺你的权。但美国人不信，总觉得中国正在动摇他们的一切，而中国没有这个意图。

其实，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误读由来已久。大家如果关注时政，一定知道西方主流媒体，一旦涉及中国政治和政党，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几个：“为什么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怎么能成功？”“中国什么时候放弃一党制？”，等等，我把这叫作“懒汉做学问”“懒汉做媒体”，靠一个它自己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不需要做调查研究、不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只简单根据你跟我不一样，就认定你是落后的。这真是“武大郎开店，比我的不要”，正是这种心态导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会精英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结果只能是“黑天鹅现象”层出不穷，人民越来越失望。

现在是我们经常跟美国人说：你要自信一点，如果“四个自信”做不到，就做到“一个自信”吧。“一个自信”就是交流自信，现在连正常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都害怕，哪里还有一个大国的气度呢？

西方读不懂中国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源于在西方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偏见。随着中国的崛起，整个外部世界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越来越强。今天到欧洲或者非洲举办一个谈中国共产党的讲座，听众会趋之若鹜，当然前提是要讲得好，讲得人家能够听懂。美国也是一样，只是最近美国的极右势力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是真的害怕了，他们正在掀起一股“反华反共”的逆流，越来越像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美国号称有学术自由，但今天能够顶住这股逆流的学术机构还真不多，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真正的政治生态和学术生态，当然

这一切最终的最大受害者将是美国自己。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许多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其实，我们可以用大家都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讲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政党的“党”的含义完全不同。大家知道英文中，党这个词叫“party”，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词根都是“part”，也就是“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方的政党理论，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每个团体都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所以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然后不同“部分利益党”通过竞选和票决制对执政地位进行竞争：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理论上，一个多元的社会，在遵守法制的前提下，可以这样通过票决制，先是“分”，然后走向“合”。如果有争议，由最高法院裁决，大家不同意也要同意。

但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最高法院的裁决也没有用。其实，今天西方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美国现在就“合”不起来，一个特朗普，把整个美国社会深深分裂了；英国也是这样，一个脱欧公投，把整个英国社会深深分裂了。

与西方“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自己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是“百国之和”，也就是说，中国是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样的国家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如果中国也采用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模式，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出现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政党，上海党、天津党、石家庄党、哈尔滨党、湖北党、江西党，然后就是国家分裂、内战爆发，无数生灵涂炭。这就是为什么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采用“部分利益党”模式后，最终导致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而且每个军阀背后还有不同西方国家的支持，这是最深刻的政治教训。

我跟欧洲人说，我可以给你一个不准确但可以带来一定启发的比喻。我说，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点像欧洲的古罗马帝国没有灭亡而延续至今，而且已经变成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区域和文化差异，但这个国家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有现代经济，人民使用统一的语言，同时也使用上千种不同的方言。这

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这种对抗性的“部分利益党”模式，将会变得无法治理而解体。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欧盟的版图就是古罗马帝国延续至今的版图的话，那么欧盟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今天的欧盟也采用多党制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欧盟要么走向解体，要么变成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的空架子。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党终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执政集团，也都想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这不容易，然而即使不能代表，它也一定要宣布自己代表“天下苍生”。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政治文化里是行不通的。以上我是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从中国历史传承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基因的探讨。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重要的还有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建国党，它是通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上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才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这使我想起了台湾已故作家李敖生前对台独分子的嘲笑，他说：你们是孬种，是一批没有信仰的人。信仰就是为了事业，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李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研究过国民党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办过的近三万个案子，他发现那些把牢底坐穿的，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横尸法场的，都是共产党人。在这么多案子中，他发现只有一个“台独”分子，他被枪毙了，但后来发现他还是个精神病患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自己的民族独立，付出了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成功之路，我们当然坚定地拒绝和粉碎任何“颜色革

命”的企图。

除了传统基因、红色基因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有大量的现代元素。中国共产党具有全世界最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到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到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百年”宏伟蓝图，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机制，能够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大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西方多党制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往往难以延续了。台湾地区在所谓的“民主化”之前还有六年规划，当年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这样的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无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当然是有规划好。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从国际实践的比较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西方。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做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东西冗长烦琐，执行力很差，还得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而换了特朗普总统，又把它全部推翻，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在组织制度方面，我们总体上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如前所述，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等人才选拔制度，源于中国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治文化，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总体上已经形成了“选拔+选举”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大都经历过广泛的基层锻炼和各种岗位的历练，治理过超大规模的人口和超复杂的不同部门，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因而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总体素质要明显高于西方模式所产生的政党领导人。当然这个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之中，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与西方光靠“选举”的制度相比，明显胜出，而且前景看好。

过去30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我们看到了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褪色后留下的经济凋敝、政治混乱和社会分裂；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许多过去还算和平繁荣的国度被西方势力推入了族

群互相杀戮的战场；我们也看到西方及其模式整体走衰的大势，西方国家纷纷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的提高，中国加快了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中心的步伐。这是一张非常亮丽的成绩单，世界上还有哪个政党拿得出来？

我们现在反复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英文中的说法就是“*the institution*”——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所以把党建设好，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就可能落到一盘散沙甚至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确保党始终成为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1世纪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其中政治制度的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我认为在这场竞争中有三条标准特别重要，这也可以说是政治的标准。

一是看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胜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有，就是中国共产党，而美国已经没有了。

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需要改革，但我认为迄今为止似乎只有中国能够推动真正的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所以改革需要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必然被各种既得利益者阻拦而寸步难行，就像美国连禁枪都做不到，因为这背后有代表枪支和军工利益的利益集团。

三是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进行决策，其决策力和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模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也是世界公认的。

这三条标准也是一种中国话语，我们可以用它去评判和衡量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治制度，从而更加坚定我们自己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 中国定力：中国人，你要自信

## 从苏联解体看中国定力

苏联是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是1917年发生的，但苏联正式成立是1922年，到1991年底解体，正好70年。而2019年又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一个是超级大国70年轰然崩溃，寿终正寝，另一个是超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的崛起，这怎能不令人感叹万千。

大概是1992年，当时我在日内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校举办了一场讲座，主讲人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他是苏联改革进程中“休克疗法”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演讲结束后开始互动，此时一位正在日内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苏联资深学者站了起来，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直接走到讲台上，手指着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用非常清晰的英文说了一句话：“我的国家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便拂袖而去。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否则将这一幕拍下来会是一张极有画面感的照片。毫无疑问，多数俄罗斯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上了美国的当而走向崩溃，对于自己的人民数十年创造的财富被华尔街洗劫一空而耿耿于怀。萨克斯教授后来很少提及他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还在美国围堵华为公司的事件中站出来为华为说了一些公道话，随即遭到美国右翼势力的围攻。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我想主要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不管苏联有多少问题，但是它毕竟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变成了“二战”时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苏联的人口减少了近14%，也就是逾2600万人在战场上阵亡，每个家庭都有人牺牲。苏联曾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苏联也给予了宝贵的援助，包括156个大型项目的援建。中国现在使用的很多概念，包括“五年计划”“民主集中制”等都是苏联共产党人发明的。那么问题在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巨大影响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一度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怎么就一下子轰然崩溃了？

苏联解体给大多数俄罗斯人带来的是凄惨的生命体验。据统计，“二战”的时候，苏联的GDP减少了22%，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跟1990年相比，下降了55%。苏联解体对其经济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因为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产业分工已经相当专业化。比方说，汽车的发动机是在乌克兰生产的，轮胎可能是在哈萨克生产的，结果苏联一解体，整个经济协作网全部崩塌，经济走向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二战”的时候虽然德国对苏联经济造成了重大摧毁，但是同时苏联军工产业在拼命地生产坦克、大炮、机关枪、弹药等，所以从GDP来看，就出现了上述这么一个反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社会急剧动荡，人均寿命急剧下降，男性的人均寿命由70来岁降到了50多岁，一下子下降了十几岁。之所以今天俄罗斯有这么多人支持普京，恐怕与20世纪90年代这段悲惨的记忆有关。但是，虽然苏联共产党垮台了，苏联解体了，但西方国家还是不放过这片土地，北约继续东扩，大军直接压到俄罗斯边界，所以俄罗斯人很难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于2019年再次到俄罗斯进行智库交流，一位俄罗斯资深政治人物对我说，戈尔巴乔夫时期我们认为即将进入天堂，结果发现进入了地狱。俄罗斯电视台一位资深主持人采访我，趁摄像师、灯光师调试机器的时候，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问她如何评价苏联解体至今的个人经历，她说一言难尽，但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我问为什么，她说了一个单词：“稳定”。然后补充说，只有经历过太多的动荡才会真正懂得稳定的珍贵。

要了解苏联解体，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苏联的经济和经济模式，苏联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这个模式是有问题的，但是苏联有其特殊的原因。苏联面对的是整个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挑战，亟须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但代价是牺牲了轻工业。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很多经济发展的探索。开始是搞“战时共产主义”，年轻的苏维埃当时正经历着外敌入侵的困境，经济靠的是企业国有化、消费品配给制、粮食征集制、义务劳动等，但这种经济制度难以为继。从1921年开始，列宁对此作了务实的调整，叫作“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承认商品经济，允许外商到苏联投资。所以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说过：“苏联过去有过新经济政策。”邓小平1926年整个一年都在苏联留学，当时列宁已经去世，但他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完全终结，所以邓小平对于苏联比较灵活与开放的新经济政策有过切身体验：社会主义可以不完全是国有经济，可以有私营企业，可以有外资。但是后来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就转型成了我们后来所熟知的苏联模式，企业国有化，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重工

业、国防力量和科技力量迅速发展，但随着体制越来越僵化、官僚化，经济失去活力，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长期停滞不前，消费品奇缺，也就是所谓的“短缺经济”。当时苏联人日常生活用品大都凭证供应，购货大排长队，这一切给西方带来巨大的心理优势。我记得80年代中期曾看过美国人拍摄的一个纪录片。一位美国记者采访苏共宣传部副部长，说，美国的制度为美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消费品，你们的制度为苏联人民创造了什么？那个副部长竟一时失语，而美国记者也够损的，就把特写镜头长时间地对着这位苏共官员表情尴尬的脸。苏联经济的这种情形和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随便拿出一个二线城市，其繁华程度都超过洛杉矶或旧金山，甚至叫板纽约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苏联在其他政策上也有失误，比方说坚持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当时美国核武器非常之多，可以毁灭地球100次，苏联跟它竞争，也拼命发展核武器，力争具备毁灭地球101次的能力。现在来看，这是多么不明智的决策，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从来不参与军备竞赛，而是确保有效的威慑力，或者叫强大的止战能力，相比之下，苏联和美国当时都是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两个国家都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美国搞全球霸权，苏联搞全球输出革命，两者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90年，切身感受到了苏联经济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去莫斯科红场，到了红场最大的百货公司“吉姆”，当时商品之少超乎我的想象，因为1990年的中国市场已呈现初步繁荣，几乎什么商品都有，虽然质量不算高。但苏联市场的货架几乎空空如也。我记得我是6月份去的，天有点儿凉，我想买一件风衣，一问才知道必须带上护照，必须有住地派出所办的居住证，还只能买一件。准备好证件后，在护照上敲个章—计划供应。当时陪我的是苏联社科院的一个小伙子，我们一起进了一家电视机商店，那个小伙子跟我说：“张老师，苏联的电视机你千万别买，那是专门对付敌人的，看的时候一不当心可能会爆炸。”

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一些经济改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个苏联的改革就还只是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完善，鼓励劳动竞赛，增加优秀工作者的收入，总体成效不大，因为没有能够从根子上、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随后又转向激进的改革方案，我称之为“双休克疗法”：一个是政治“休克疗法”，放弃了党的领导；一个是经济“休克疗法”，1990年中期，也就是我在苏联考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由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为首的专家小

组，制订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这个计划的制订得到了美国专家的直接指点。现在回头看，这个计划是愚蠢的，它把国有企业的股份折合成债券，工人无偿地拿到了一部分股权，好像这个工厂就属于你了。但随着苏联经济陷入混乱，西方操纵的媒体包括俄罗斯当时的主流媒体，都开始制造经济恐慌气氛，随后债券和卢布大幅贬值，工人傻眼了，纷纷急着出售手中的债券，结果华尔街金融资本，以极小的代价，把苏联人民70年积累的十几万亿甚至更多的资产洗劫一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浩劫和财富转移，这个教训对于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多数俄罗斯人是刻骨铭心的。

政治上也是一样的，我自己总结过苏联大致是走了这么两步：第一步是他们的知识精英，包括大学教授、媒体精英被西方话语洗脑；第二步是政治精英，他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乃至总书记也被西方话语忽悠，觉得世界上有一个理想的世界，而这个理想的彼岸就是美国，就是欧洲，就是西方。苏联体制有很多问题，官僚主义、腐败蔓延、经济衰退，等等，但绝大多数苏联人绝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解体。我前面讲过，西方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陷阱”，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但其实过去数十年最大的“陷阱”就是两个：一个是政治上的“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一个是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最终，这两个陷阱苏联都失足了，所以走上了国家解体的不归路。其实，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陷入了这两个“陷阱”，一路走衰。

毫无疑问，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西方话语彻底洗脑了，他称自己是苏共二十大的一代，就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主政提出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一代的一批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去了信仰，戈尔巴乔夫正在其中。他在1987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书名叫《改革与新思维》。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提出要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我多次强调，人类价值也好，“普世价值”也好，需要世界各国讨论后达成共识才行，一切都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界定，那么美国入侵伊拉克就变成了“反对专制”和“捍卫人权”，而不是21世纪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了。

面对亲西方势力的步步逼近，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在谈党的领导问题时，他开始时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反对多党制，隔了一段时间又说采用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再隔一段时间又说，宪法中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包括第六条，即党的领导。

之后又说不要害怕多党制，最后干脆宣布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他最后完全失去了政治发展的主导权，一人一票选苏维埃代表，然后由苏维埃代表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行使行政权，结果出了大问题，叶利钦就是这样上来的。叶利钦原来是苏共成员，后来因为犯了错误被开除出党，但他通过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制度的改革，直接参加选举，后来被老百姓选上成为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直至成为俄罗斯的苏维埃主席。随后以这个平台直接叫板戈尔巴乔夫，直至苏联解体。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全面向西方缴械投降，苏共党史、苏共的领袖人物、苏联时期树立的英雄人物，包括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英雄人物，全部被污名化。当时苏联精英被西方洗脑洗到什么程度？我碰到的一些苏联学者，他们直接跟我说：“我们这个国家太烂了，让美国来殖民我们吧。”

在经济上，戈尔巴乔夫在亲西方势力面前也是步步退让。他开始时反对私有化，后来则大力推动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认为公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彻底实行以私有制和市场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然后就是“500天计划”，苏联随即陷入经济、财政、社会、政治的全面危机。加上美国引诱石油价格暴跌，苏联财政收入锐减，国库空空，政府和军队的薪饷都快发不出来了。如果访问解体前后的苏联，连着好几年，都会看到非常凄惨的景象：大学教授、医生、军官、工程师走上严寒的街头，兜售各种低廉的小商品，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不得不乞讨。当时的苏联真是可怜，戈尔巴乔夫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老布什，希望美国给他150亿美元贷款渡过难关，但老布什回信，大意是，贵国要向美国国会证明自己有还债能力的信誉。15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2018年“双十一”，淘宝一天的交易额就是300多亿美元！

共产党崩溃了、经济崩溃了、财政崩溃了，这些崩溃的背后是思想崩溃了，理想崩溃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解体的必然结局：1991年9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寿终正寝。

苏联解体给当时的中国人也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不少人担心，中国的红旗还能立多久，而西方世界则是一片欢呼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了。中国一些高级干部走向腐败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苏联老大哥完了，中国社会主义还有希望吗？赶紧乘机捞一把吧。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邓小平本人

对苏联、东欧的变化发表过很多次内部讲话，现在大都公开了。他要中国“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他掷地有声地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苏联解体前四个月，他明确地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国内不少人乱了阵脚之时，邓小平看到的是中国大发展的机遇来了，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证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走得通。在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邓小平就开始了南方视察，他心里着急，就怕中国错过这个机遇。他一路走，一路讲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善人民生活，中国社会主义一定能成功。而正是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70周年之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从英国脱欧看西方的制度危机

2014年我做过一个演讲，叫《中国人，你要自信》。在演讲中我是这样结尾的：“2014年6月，我们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逐步演进，它与时俱进，它不断地进行改革，它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我们一点儿都不害怕竞争，一点儿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儿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这番话是我在2014年6月讲的，没想到英国政治制度走衰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两年后的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一场世界上多数人都认为是愚蠢的脱欧公投。美国知名媒体人、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于2019年4月2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更多电子书访问[www.j9p.com](http://www.j9p.com)

了一篇评论，标题就是“正式宣布，英国发疯了”（“The United Kingdom Has Gone Mad”）。他写到，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卢瓦索女士最近给她家的猫起了个名字，叫“Brexit”，中文就是“英国脱欧”。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她说，我家那只猫，每天早上都喵喵地叫着要出门，但我起床把门打开，它又站在那儿只做怪脸，就是不出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脱欧方案，都被英国议会被否定了，很像这种情况。弗里德曼继续写到，今天的伦敦，大家都在讲政治笑话，与其说这些笑话可笑，还不如说这些笑话可悲：因为我们正看到一个国家下了决心在经济上要自杀，但迟迟无法就如何自杀达成共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领导力崩溃。

“政治领导力崩溃”的背后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困境。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我个人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总体上对欧盟的肯定多于否定。欧洲很多人，包括很多英国人，天天批评欧盟官僚化、低效率、腐败丑闻，等等，但我们应该有一点儿历史感。欧洲是历史上饱经战乱的地区，特别是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大国之间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二战”结束后，一些欧洲智者痛定思痛，觉得不能再这样厮杀下去，欧洲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当时的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设想：打仗需要煤炭和钢铁，那么法国和德国能不能把这两个国家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整合起来，这样两国之间就不会再打仗了。于是法国和德国，又联合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这就是欧盟的前身，它的成员不断扩展直到今天欧盟的规模。如果要问欧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想就是和平，1945年“二战”结束后至今的70多年，西欧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欧盟的作用。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德、法两国几乎每隔二三十年便爆发一场战争；而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应该说实现了完全和解。

当然，欧盟也存在很多问题。比方说，德国是欧盟内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德国交的“成员费”最多，这导致德国纳税人的钱变成了欧盟的补贴，用来帮助欧盟中不少相对比较穷的成员，特别是陷入债务危机的希腊和东欧国家。这使很多德国人不高兴。然而反过来，希腊这样的国家也不买账，他们动不动就翻历史旧账，不久前，希腊领导人公开说，“二战”的时候，德国占领希腊犯下了很多罪行，德国至少需要向希腊赔偿3000亿欧元。

这又使我联想到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许多英国人也认为自己的国家为欧盟付出

了太多，得到的太少。但这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从经济上看，加入欧盟后，英国与欧盟国家形成统一的关税联盟，极大地扩展了英国的市场，对英国经济显然利大于弊。但英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掺杂了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和英国人接触多了，会发现英国人一般只说自己是英国人，而不太愿意说自己也是欧洲人，这和欧洲大陆的情况很不一样。也就是说，英国人明显地缺少对欧洲身份的热情。访问过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人，细心观察会发现一个现象：欧洲多数国家在悬挂国旗的地方，都同时悬挂自己国家的国旗和欧盟的旗帜，而在英国这种景象比较少。历史上，英国跟法国打过太多次仗，英、法之间的矛盾比法、德之间的矛盾还要深。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人看英国的角度迥异，在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眼中，英伦列岛是镶嵌在银灰色大海里的宝石，但在很多欧洲人的眼中，英国人的心态是典型的岛民狭隘心态。

英国每年要缴纳巨额的欧盟“成员费”，作为欧盟成员国，各种事务都要受制于欧盟的法律。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英国人感觉自己深受其害，而其后不久又赶上了欧洲“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需要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盟成员提供资金帮助，这引起了很多已经处于困境的英国民众的反感，他们把欧盟看作一个应该甩掉的“包袱”。当然最令英国人担忧的是欧洲移民问题。欧盟从2004年开始东扩，10个中东欧国家先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根据欧盟的规定，所有成员国公民都有欧盟内自由迁徙和工作的权利。由于英国收入相对较高，大批中东欧的公民涌入英国，在不少英国人眼中，这些中东欧人抢走了英国人的饭碗，也被看作是不少社会问题和治安问题的根源。这些看法并不准确，但显然被民粹政客和社交媒体无限放大了。这些都造成了在英国内部，特别是执政的英国保守党内部，脱欧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并不想脱欧，根据多次民调结果，他发现尽管英国人对欧盟有很多抱怨，但赞成英国留在欧盟的还是略占多数，所以卡梅伦想豪赌一次，干脆就脱欧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一旦如民调所显示的多数英国人拒绝脱欧，那么他所在的保守党内那些给他找麻烦的脱欧派人士也就无话可说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长达15个小时的公投，最终的计票结果是支持脱欧的票数占总投票数的51.9%，支持留欧的票数占总数的48.1%，英国的脱欧派以3.8%的微弱优势获胜了。

应该说，我个人和许多学者的观点一样，英国脱欧是一个“颠覆性错误”。脱欧对英国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英国将失去自由进入由它最大的贸易、资本和技术伙伴构成的欧盟市场，这使英国经济前景陷入中长期的不确定，导致英国贸易和更多电子书访问[www.j9p.com](http://www.j9p.com)

外国对英投资下降。很多英国人已经开始囤货，从卫生纸到罐头、到饮料，等等，很多百姓担心一旦脱欧，源于欧盟的产品将变得更贵。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其普通百姓开始囤积日常生活用品，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这样的公投结果，以卡梅伦首相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居然没有任何应对预案、没有任何底线思维，这个案例几乎完美地展示了什么叫作把国家治理真当儿戏。英国经济和政治的未来就这样被一波对国家极不负责的政客给弄砸了。结果就是全世界都在看英国的笑话。这使我想到了英国乃至西方整个政治模式所面临的危机。八年前，我在与福山辩论时就提出，西方现在这种民主形式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形式的民主，在实际操作中，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也就是它是基于三个错误的假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我认为这些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不断走衰的深层次原因。

“人是理性的”，即所谓“理性人”假设，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作出理性的选择，从而投下庄严的一票。但迄今为止的社会学研究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可以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金钱卷入政治，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更容易被强化。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了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而新媒体时代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便于操作的条件。

英国脱欧公投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人的非理性所带来的政治困境。脱欧公投之前，支持脱欧的政客利用各种手段宣传一个观点：脱欧后每周就为英国省下3.5亿英镑的“成员费”。这个承诺是脱欧运动的核心招牌，当时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一个极端滑稽的政客，经常乘坐涂有“3.5亿英镑”字样脱欧广告的红色大巴，在英国各地拉票，口号是这笔省下的钱可以用在英国人自己的医疗福利上。这个说法太有诱惑力了，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选民，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疗福利开支。当然，最后证明这都是谎言，但选民当时还是被这个动听的谎言给忽悠了。

第二个例子更有意思。英国公投结果公布出来之后，谷歌公司就当天英国人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发了一条消息，说那天英国人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居然就是“欧盟”。换言之，可能很多英国选民还没有搞清楚欧盟是什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票投出去了，等到结果出来后，他们才真正去关心欧盟是什么，关心脱离欧盟会给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普兰 (Bryan Caplan) 曾写过一本书，叫作《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所谓“理性选民”的“偏见”，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一般都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一次交给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足够好的表演和作秀能力，再加上各种媒体的渲染，就可以迎合选民的短视和局部利益，走上执政之路。

第二个基因缺陷：权利是绝对的。西方今天在政治文化中把权利绝对化，这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利与义务失去了平衡，权利压倒义务，结果就是“权利任性”，带来权利的绝对化和极端化。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里，权利绝对化表现出来的是党派政治“极化”，妥协变得越来越难，导致今天英国和美国等许多民主国家“否决政治”盛行。正如英国公投结果出来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多个脱欧方案，都在议会里被反对党封杀。多数观察家认为，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不停否决梅的脱欧方案，其实是为了自己夺得权力。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被否决不久，科尔宾就提议对特雷莎·梅举行不信任投票。他的目的是为了举行新的大选，进而击败梅，成为新任英国首相。

美国政党恶斗的情况，大家就更熟悉了。特朗普上台以后，政府已经关门多次，因共和党、民主党双方势均力敌而政府停摆，时间之长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2019年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双方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墙拨款发生争执，其背后是双方的战略对决。议长取消了总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总统则取消了议长外访。尽管后来双方态度有所转变，但总体上两党高度对峙的问题无法解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认为，美国两党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

最后，就是程序是万能的。一个涉及英国人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决定，其决议的

程序设计竟然只简单依遵多数，这本身就反映了程序制定者与英国社会严重脱节；也说明决策程序非常粗糙，就像卡梅伦首相本人拍拍脑袋就做公投决策一样粗糙，而结果是全体英国人民为这种粗糙简陋的程序埋单。西方民主已经变成了程序高于一切，认为程序正义就等于实质正义，然而有三分之二的18—24周岁的英国年轻选民宅在家里，没去投票，而这项公投的结果恰恰对这些人影响最为长久。这些年轻人与欧盟一起长大，看到了英国加入欧盟给自己带来的许多好处，但他们大意了，输掉这场公投后，也没有任何办法纠正，因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演变成了程序就是一切。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比方说，美国多数公众也认识到，美国需要更好地管理枪支，才能减少枪击造成的大量平民死亡，但这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程序通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修宪要求国会有四分之三的成员通过，这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律程序所害，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理由。换言之，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结果不公或者实质不公。

2017年，我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结合英国脱欧公投的案例向英国朋友很认真地介绍中国的“协商民主”。我说，2000多年前在小小的雅典城邦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可能还说得过去，但今天像英国与欧盟这种由成百上千个条约组成的复杂关系，居然要求通过最原始的公投方式来决定，只能说明英国政客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极端之不负责任。下面多数英国人都点头一说到了他们的要害。从投票的情况来看，赞成脱欧和反对脱欧的差距才不到百分之四，依此来看，采用公投的方法只会使社会的分裂越来越大。我对英国人说，我是研究政治的，经常对政治问题作预测，我说我敢预测中国未来的十年，但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预测英国未来的十年，更具体地讲，如果英国不改革如此简单粗暴的政治模式，动不动就搞公投，我担心十年之后“大不列颠”会不会变成“小不列颠”。我告诉英国人，这样的问题如果采用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方式，可以相当容易地解决。他们问我协商民主具体如何操作，我说协商民主在中国已经是上上下下最常用的工作方式，包括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在内的各个单位、各个团体，几乎每天都在实践。协商民主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三四轮下来，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3.8%的差异太容易解决了，38%的差异都可能解决。其实，我也知道英国实践不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因为协商民主需要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统筹，西方政党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干不了这个事儿。因为领导层无法达成共识，结果只能采用公民投票的方法，赢者通吃，只会使西方社会日益分裂。但即使西方国家

无法实践中国式协商民主，我们还是要告诉他们，至少使他们一部分人心向往之。今天有许多西方人羡慕中国人团结一致做事情的能力。尽管中国人口约等于20个英国，超过整个西方人口之和，但中国能够通过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在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层面形成最广泛的全民共识，创造中国全方位崛起的奇迹。所以，还是回到我2014年的演讲：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中国一点儿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儿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 “美国梦”风光不再，为什么？

我记得大概在三年前，我在国内一所知名学府作演讲。互动时一位同学站起来问我说，我们现在很多同学毕业以后都想去美国留学，那么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做“美国梦”还是做“中国梦”呢？我是这样回答的：以我自己的判断，你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但从过去30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梦”显然已经更加精彩，我相信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梦”也好，“美国梦”也好，我觉得在生活层面，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美国梦”最经典的表述，就是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 T. Adams）曾经所说的：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移民都是怀着这个梦想去美国的。用今天“中国梦”的表述方法就是，只要你努力，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从生活层面上讲，“中国梦”和“美国梦”差别似乎不大。

那么“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差异主要是什么呢？在讨论“美国梦”的时候，美国主流媒体的声音也好，主流学界的声音也好，主流政客的声音也好，基本上都认为“美国梦”得以实现的背后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至于“中国梦”，我们现在的表述也非常明确，叫“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果要谈制度原因的话，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好保障。

“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精彩，我们需要用事实说话。2012年美国出版了

一本书，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引起了轰动。作者是两位美国资深媒体人，一位叫唐纳德·巴利特（Donald L. Barlett），另一位叫詹姆斯·斯蒂尔（James B. Steele），他们俩是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曾两度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的中文版是我作的序，两位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梦”风光不再的现状和原因。两位作者指出，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则只有89.4。也就是说，多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所以才有后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一项又一项研究揭示，美国曾经是充满机会的国度，对这个结论，100年前是这样的，但是这20多年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美国人的退休金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20年里，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后来被一个叫作“401K个人退休储蓄”的方案所替代，按该计划，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但这个储蓄账户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而且“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金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所以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质疑：谁出卖了“美国梦”？他们几乎都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认为他们的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并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许多公司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的钱要么留在中国继续投资，因为中国的投资前景好，要么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等逃税天堂。另外，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美国许多智库的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20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许多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所以我经常讲这个观点，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40年前是零，到2018年是4亿，他们都拥有房产，到美国也可以位列中产阶级。相比之下，同一时间段内，美国的情况是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几十年内几乎没有增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调查，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与1978年也就是40年前的水平大致持平。

相对于“美国梦”的一路下滑，“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就我

的观察，仅就物质生活而言，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一个中国人，如果在过去20年间移民美国的话，如今再回到家乡，他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如果只比较中等收入群体的资产，我想今天移民美国的华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中国有投资或置业的，这是少数；一类是没有在中国投资或置业的。后者如果今天回国的话，相当比例可能都属于国内较为弱势的群体。多少海外华人后悔自己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速度、规模崛起，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也快速增长。当然财富高速增长，也带来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棘手，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先肯定自己的成就，再来自信地解决各种问题。今天若还有人冲着“美国梦”移民美国，千万不要阻拦他，而且我估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他离去：要准备吃苦啦。

这也使我想起了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这篇就职演说无疑是他精心准备的一篇演讲，如果读懂了他的这篇讲话，就可以理解特朗普后来很多看似难以理喻的事情。我可以用中国人的话语来概括一下他的这个演说，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美国人民从今天开始总算站起来了。他说：“今天的典礼，意义非同寻常。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盛顿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人民。”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天天宣扬美国民主制度代表了人民，结果现在美国总统自己都认为，只是到了2017年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就职演说这一天，美国人民才站了起来。当然，是否真正站了起来，我很怀疑。

第二，消除贫困是当务之急。他是这样说的，全国各地一个个家庭在挣扎，在内城生活的母亲和孩子们深陷贫穷，工厂锈迹斑斑好似墓碑。犯罪、黑帮还有毒品已经夺去了太多生命，盗走太多未能发觉的天赋，这是对美国人民的屠杀。他用的英文单词是“carnage”，这是描绘大屠杀的一个很重的词。其实这是一个常识判断，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美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

第三，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他是这样说的：从今天起，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我们必须买美国货，我们的公司必须首先雇佣美国人。已经是21世纪了，世界各国的利益早已随着全球化而互相关联，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开始搞保

护主义、民族主义。这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观点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对世界格局的负面影响。而就是这样的倡导，让美国人高呼“USA，USA”。这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一种心胸狭窄的爱国主义。

第四，空谈误国。总算有一个西方领导人公开点出了每个中国人都懂的道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实，特朗普还是看出了美国存在的很多问题，只是他开出的药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错的，背后是美国整个体制的决策水平江河日下。

第五，他号召美国人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美国复兴之梦而奋斗。

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也认为“美国梦”遇到了危机。对于这种危机背后的原因，我个人以为是美国的政治模式出了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

我这里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供大家参考。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其实左右了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我经常说，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一个21世纪现代性的理想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三者之间的某种平衡。而这三股力量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模式。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比方说，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体现的99%与1%之间的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平衡。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中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优势。资本力量已被充分组织起来，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影响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美国号称自己有新闻自由，但美国主流媒体的大老板是金融资本，它们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利益捆绑，难怪连特朗普都为他们贴上了“假新闻”的标签。

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资本力量还是有过某种限制的，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2500美元。但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基本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70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不足，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会带来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酿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就可以左右白宫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比之前大，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的社会力量延续了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中国这三种力量的总体平衡，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普通百姓“中国梦”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民粹主义的趋势和追求福利最大化的趋势。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当然，如何在治国理政中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还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数十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 中美贸易战小议

美国号称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有一句话在美国基本上是不能说的，那就是“美国可能变成世界老二”。但我的好朋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资深访问学者、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在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标题就是：美国要准备当世界老二。那次演讲赢得了很多掌声。马凯硕说，道理很简单，过去2000年，中国在1800年中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而中国回归它原来世界领先的位置才是历史的常态，他说，美国要调整心态，这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

但哈佛大学的演讲是一回事，美国社会的普遍接受是另一回事。美国今天害怕

失去的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老大的地位，更担心的可能是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失去技术老大的地位。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说自由竞争是个好东西，政府的作用仅仅是“守夜人”，但现在美国政府天天给我们的自由派上课：你真的动了美国的奶酪，美国政府就发狂，不惜采用一切保护主义的手段，甚至是下三烂的手段，全面扼杀竞争对手。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华为设备可能留有后门，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但谁都知道美国很多产品是留有后门的，无疑，美国最大的担心大概是万一别人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还怎么监听世界？难怪《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对5G“控制权”的竞争定义为新的“军备竞赛”。认为谁控制了5G谁就能在经济、军事和情报上领先他人，甚至有专家说，5G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力可能会不亚于电力给人类带来的改变。美国极右势力的代表，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甚至说，干掉华为比达成中美协议重要十倍。这种声音在美国很有市场。中国已经崛起，美国阻碍中国崛起的企图不可能成功，只会失败。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我和我们团队就一直持这个观点：中美双方都会受到损失，但美国将受损更大，直至失败。我一直用三句成语来概括我本人的看法：

第一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的消费市场折算成美元已接近6万亿，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那就更大。换言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要与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打贸易战，是不可能胜出的。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大豆、芯片、飞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美国哪里还能为它的大豆、飞机、芯片找到14亿人口的市场？

特朗普打贸易战，想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但一年过去了，美国的赤字还在增加。而因贸易战所增加的税几乎都由美国消费者埋单。美国大豆协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都在控诉，“提高关税只会惩罚美国的农民、企业和消费者”。这真是应了一句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我们知道，美国打贸易战的本质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是这样说的，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如果今天中国停止发展，中国实力停滞不前了，中美所有的冲突就消失了。美国最近对华为公司发起的一轮接一轮的围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华为很淡定，芯片已经有了备胎，华为旗下的海思公司早就开始研发。海思总裁的信广为流传，他说，我们的

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接着谷歌又宣布终止华为更新安卓系统，一些西方人士称，这会“使华为瘫痪”，但华为还是很淡定：我们也有应对方案，华为操作系统团队七年前就开始研发了鸿蒙系统，兼容全部安卓应用，还打通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统一成一个智能操作系统。坦率地说，这应该是下一代的操作系统，据说很快就能面市。美国人有一点始终没有搞懂，美国越是封锁和打压，中国人就越是憋着劲要超越你，华为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连续这么多年，全世界每年30%以上的增长来自中国。要是美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那他们就退出了全球财富500强的地图，这是林毅夫教授不久前说的话。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如果真的执行美国政府的指示向华为等中国公司断供，这些企业可能很快就会走向大量裁员，甚至破产。

第二句，“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美国领导人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还是产品经济的概念，还是停留在当年因完全由日本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汽车竞争不过，所以要打贸易战。美国领导人没有产业链经济的概念，也没有全球化的概念。产业链意味着，任何一个产品，比方说，苹果手机，它的零部件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最后在中国组装而成，所以增加关税，大家都受损，这是典型的杀敌一千，自损一千，甚至一千五的游戏。美国愿意玩，我们将奉陪到底。

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想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但美国不卖，那我们只能买它的大豆。现在倒好，美国主动要打贸易战，那我们只能拿大豆开刀，我们转向买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大豆。何乐而不为？俄罗斯非常高兴，双方的农业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美国的大豆农场主来说，他们可能将永远失去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但这是美国自己的选择。2018年美国农民净收入已经同比下降16%，跌至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水平，美国农民叫苦连天。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我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引用了一位美国商界领袖的话，他是这样说的：特朗普好像没有思考过就提出了一个大数字—2000亿美元，然后为了凑足这些数字，轻率地给商品加税，这是愚蠢的。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政策要稳定和连贯得多。当时美国政府还召集美国公司和企业代表开了一个听证会，最终发现95%左右的美国公司和企业不愿意和中国打贸易战，因为他们从中国

进口的产品，要么中国是唯一的供应商，要么中国是最大、最好的供应商，加税只能是美国惩罚自己的消费者和进口公司。但美国领导人还是一意孤行，硬着头皮要打贸易战，想吓唬住中国人。对华为的围剿也是如此儿戏，先宣布紧急状态，然后发布禁令，但突然又宣布禁令延缓90天。华为的掌舵人任正非笑着说，我们不需要。其实是美国自己还没有准备好，90天之后也准备不好，这背后暴露的是美国政客决策水平之低，之简陋粗糙，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 第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美国采用如此粗暴的手段，四面出击，对外国产品横征关税，还动用国家力量围剿和打压中国一家民企，把公平贸易和竞争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这连美国的许多盟友也看不下去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撰文说：一般情况下，作为盟国，欧洲应该站在美国一边，但特朗普总统现在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流氓超级大国”，为一己私利，要毁掉战后形成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这对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国内更是怨声载道，耐克、阿迪达斯等173家公司联名写信给特朗普，要求他改变打贸易战的主意。连那些为遵法令不得不不断供华为的美国公司，都在极力说服美国政府，不要停止给华为供货，谁都知道，没有中国的生意，这样的公司很快就会度日如年。

比这些损失更大的是美国的信誉。美国针对中国一家民企做出如此上不了台面的行为，以后谁还敢信任美国，信任美国公司？今天能运用国家权力封杀华为，明天会不会封杀爱立信、三星？今天美国把美元及其支付手段都武器化，这必然加速整个世界摆脱美元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华为公司打赢这场保卫战，中国打赢这场贸易战，其意义远远超出中美关系，它将是改变整个世界未来格局的大事。美国人对此已经看得很清楚，可惜我们一些国人还没有看清楚。我们本不想打，但美国把华为、把中国“逼上梁山”。既来之，则安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贸易战是美国发动的，但下一步如何发展，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可能将越来越由不得美国了，中国可能会掌握越来越多的主动权，直至美方最终认识到发动这场贸易战是如此愚蠢和荒谬。

##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谈到中美关系，不得不提2018年去世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又叫老布什。他是一位很值得怀念的美国政治人物。1985年7月下旬，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等人随行，我担任李鹏的英文翻译，而美方出席接待李鹏的就是时任美国副总统老布什，所以我们之间有过一些接触。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美方的礼宾安排很有意思，他们让里根总统与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林佳楣坐在一起，李先念主席与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坐在一起。李先念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管经济和财政；南希是家庭主妇，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好像不多。我陪李鹏副总理和布什副总统坐在第二桌，他们的夫人不在，李鹏和布什聊得挺开心。布什一见到李鹏，就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他戴着“上海牌”的手表、中国生产的领带，还告诉我们是在哪里买的，他们谈了一些外交和战略的大话题，但主要聊的是周恩来。布什说，他对基辛格很有意见，因为他当年在北京担任中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基辛格會晤周恩来总理时从不让他参加，未能见到周恩来是他一生的遗憾。他还谈到他后来访华时见到邓小平，他问过邓小平，你们打算派多少学生去美国留学，邓小平问他，你们能接受多少？我们没有限制。他很感佩邓小平的魄力，说这与苏联领导人完全不同，苏联很害怕知识界与西方接触，而邓小平显然很自信。回想这一点，确实不得不感佩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魄力，当时不要说中国和美国生活水平之间差距巨大，即使和泰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少。然而在今天，中国留学生中85%以上都回国，并且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大，这再次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

今天回想起来，34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中国与美国呈现了此长彼消的发展大势，中国“追趕”的速度之快、“超越”的势头之猛，令人感叹万千。1985年我们访美的时候，中国经济规模连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今天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中国也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4年前，中美一年的贸易额还不到60亿美元，今天中国一天的贸易额就超过110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

34年前的这次访问中，美方考虑到李先念主席年事已高，给他安排的活动较少，但美方已经预测到李鹏将出任中国总理，所以给予李鹏非常特殊的礼遇，为他安排了专机以及长达四天的单独行程。对李鹏来说，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和借鉴美国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鼓励美国加大对华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力度。在四天内，我们先后考察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福特汽车公司、密西西比河航运系统、胡佛大坝、兰德中心，又因为李鹏也主管教育，我们走访了硅

谷，走访了斯坦福大学，了解他们的“产、学、研结合”等。一路走来，李鹏兴致勃勃，不停地提问题，不停地记笔记，认为美国有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回顾过去这些年，中国借鉴和学习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益经验，改进了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在访问的一路上，李鹏也告诉那些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美方人士，中国坚持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是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美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做法。

34年飞逝而去，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个例子让我感触尤深。34年前，我们抵达芝加哥，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从高速公路到超级商场到摩天大楼，对我们而言都是很开眼的东西。李鹏会见了芝加哥企业界的人士，会见了芝加哥市市长和伊利诺伊州州长，希望美方多来中国投资。但34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多数的州和城市都深陷债务之中，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也不例外。尽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但美国许多州长和市长还是希望和中国保持大规模交流，希望中国去他们那里投资。芝加哥市前任市长理查德·戴利任期内曾多次访华，专程造访过中国五个城市，推广“芝加哥—中国友谊项目”。他反复强调芝加哥在地理上和经贸领域都“位于美国心脏地带”，并承诺把芝加哥打造成“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城市。

另一个例子是技术转让。34年前，李鹏在会晤布什之前，叮嘱我说会晤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词汇，让我事先准备一下。他说他会提及希望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当时电脑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李鹏向我简单解释了CPU、64k等概念。与布什会晤时，李鹏提到美国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远远领先中国，但对诸如64k这样的技术转让还设限制，有点说不过去。布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表示这些问题可以由双方相关部门去商谈。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限制是最严的。好在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也很争气，在高科技领域内奋起直追。如果说在PC时代，我们和美国的差距还很大，那么到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差距已经迅速缩小，今天世界最大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11家，中国占9家，欧洲一家都没有；而在移动互联网应用方面，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美国前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崛起所产生的恐惧很能说明问题。许多研究表明，随着5G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中国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应用技术方面已经领先。这34年正好见证了从PC时代

到互联网时代再到大数据时代，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并在不少领域内正在实现弯道超车。今天美国不仅害怕失去经济总量老大的地位，也担心可能失去新一代技术老大的地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一直说竞争是个好东西，能够提高效率，降低价格，使客户受益，但若真的动了他的奶酪，他就不惜采用一切保护主义的手段，扼杀竞争对手。

2018年年底我走访了美国不少地方，我感觉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自信。他们关闭了好几所孔子学院，我跟美国人说，几个孔子学院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恐怕都可以找出至少十个研究机构或项目是由美国资助的。我告诉美国人要有点“四个自信”。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不自信的人，至今还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我认为这种思想最终只能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如我刚才所说，中美关系早已今非昔比。过去40年间，中美间的各种交流增加了上百倍：以双方的贸易为例，2017年的中美贸易额是1979年的233倍。双方的人员交流也从无到有，到如今每天有14000人来往于中美之间，每17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往对方国家。

但美国就是有那么一股势力，认为过去40年的交往中，美国亏了，中国赚了，所以要把中国赚到的便宜要回来，于是就有了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的极右势力也乘机行动起来，要遏制中国，要开始新一轮“冷战”。这只能说明美国自己乱了方寸，这只会使它日益陷入孤立，加速衰落。

至于贸易战，如上一节所说，严格讲不会有赢家，双方乃至多方都会遭受损失，但依我之见，美国会输得更惨。中国的消费市场折算成美元已接近6万亿，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那这个市场就更大。换言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要与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打贸易战，是不可能胜出的。美国商界人士自己有个说法：一个跨国公司一旦失去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那么它将沦为区域公司、二流公司。

有人说，你看，中兴公司的芯片依赖美国公司供应，中国的技术软肋暴露无遗。其实在芯片领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与美国确实存有差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的国防工业，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的是中国自主设计和生产的龙芯芯片；我们的“神威·太湖之光”，也就是2017年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用的是中国自主设计生产的国产“申威26010”芯片。我们的民用产品，如手机，除了华为，仍然用美国高通等公司提供的芯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把美国公司提供的芯片看作一种普通商品，乃至公共商品，也就是只要花钱你就可以买到。

美国这次犯了一个商业大忌，它把普通产品或公共产品武器化了，在我看来，就此一项，美国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美国市场有大概一半的普通消费商品都是中国生产制造的，小到螺丝钉，中到汽车轮胎、自行车，大到集装箱、重型起重机、波音737的尾翼，重要到抗生素……如果中国也和美国一样，把这些普通产品都武器化，美国消费者还怎么过日子？美国中小企业还怎么过日子？美国的医院都要关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真不知道美国发起的这场贸易战将怎么收场。当然，从两国人民的福祉出发，我们希望两国政府能够通过谈判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顺便说一句，我们要真诚感谢特朗普，因为他使中国的芯片乃至整个高科技行业都警觉起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华为走过的路是正确的，“自主创新”真的成了全民共识。我们的国防工业有这么一句经常说的话：美国限制中国什么，中国最后必然就能研发和生产出什么，而且质量甚至可能更好。

中美关系究竟将何去何从？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纠正自己的三个认知误区：第一个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冲突乃至战争难以避免；第二个是美国认为中国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第三个就是美国不少人认为中国要推行扩张主义。

2018年10月15日，我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重点就是解构这三个误区背后的文化逻辑。我认为这些误区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典型的西方式或者说美式思维逻辑，即非此即彼、你赢我输、零和游戏。这一逻辑的例证，还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要么与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with us or against us）。特朗普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假设为：中国贸易顺差，便是中国得了好处，美国吃了大亏。远比这两位政客更加睿智的两位哈佛教授似乎也没有摆脱同样的逻辑，认为一方崛起必然要以另一方衰败为代价。我指的是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他多年前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还有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艾利森教授的本意是

力求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爆发冲突。

中国是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似乎比西方更加包容和淡定。我们一直认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这种差异背后是中西方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别。欧洲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之间都进行过无数战争，有人甚至说，这样的战争今天还在继续。这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的一神教传统有关。一神教传统往往意味着：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与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包容与综合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年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启蒙思想家面对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欧洲，都高度羡慕和赞扬中国这种他们称为“自然宗教”的传统，也就是切近自然、非政治化、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当然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所以中国政教分离的传统源远流长。

正因为如此，如果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发现，艾利森教授所举出的16个案例，几乎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戏的国家。用这种情况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是没有说服力的。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显然不适用于中国。

同样，中国也没有传教士的传统，中国从来不想改变别人的信仰或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历史上，只有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没有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去。如果说很多发展中国家今天把眼光投向中国模式，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尝试了西方模式却失败了，甚至是惨痛的失败，所以他们想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这是发展经验的交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中国从来没有要推销自己的模式。

我还要指出，艾利森教授的16个案例中所有发动战争的国家都是迷信军事征服的国家。这也是中西方政治历史的一个重大差别。欧洲历史上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他国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帝国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

争，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中国没有西方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于15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的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所乘的圣玛利亚号，但中国没有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对他国殖民。中国是一个修建长城的民族，长城是防御系统，不是进攻系统。

这种政治文化差别在中美两国对战争的态度中也显示得很清楚。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就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中国可以在24小时内收复所有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分歧。我们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中国刚开始拥有核武器之时，那时中国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如果今天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能像中国这样做，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免除核战争的恐惧了。

美国媒体把这样的中国说成好战，显然是荒谬的。中国只是从自己近代史上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任人宰割，所以才开始追求民族复兴和国防的强大，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但中国也不会去挑衅任何国家，认为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这使我想到了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访中国，当时西方世界刚刚经历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西方文化崇尚暴力的传统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那是一种“发疯”的文化，对中国崇尚和平的传统给予高度赞扬。但当时中国许多知识界人士由于国家被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打败，丧失了必要的文化自信。罗素则富有远见地指出，终有一天，当中国人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之际，中国人崇尚和平的文化将造福整个世界。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中国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奋斗，经济发展起来了，获得了充分的自卫能力，但中国不侵略他国，当然也不允许他国侵略中国。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全世界推动和平与发展，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选择将变得非常重要。想把中美

关系拉入“冷战”，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利益。关键是要与其作出愚蠢的“冷战”选择，不如作出明智百倍的合作共赢选择。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双方的利益已经十分密切地捆绑在一起，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方面对于这种选择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基因。实际上，美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展示过这样的包容文化。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等美国奠基人都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大量的智慧。

同样，中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从美国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智慧，我们过去向美国学习，现在还在向美国学习，今后还要向美国学习。但这样做不是照搬美国模式，照搬别人的模式从来都不会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眼光是超越美国模式的。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和探索，这个过程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其中不少内容，值得美国朋友研究乃至借鉴，特别是“和而不同”与“合作共赢”的经验。

在世界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防止任何把中美关系推向冷战的势力。冷战是基于一种恐怖平衡，即所谓的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中文是“互相确信的毁灭”。这种选择会产生对双方和对世界都极为严重的后果，即罗素所说的“发疯”。我们今天完全可以选择比MAD好百倍的MAP (mutually assured prosperity)，也就是“互相确信的繁荣”，这种选择将给中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和繁荣。如果我们还能更为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那么我们两国的关系就会发展得更好、更顺利。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中长期前景还是谨慎乐观的。我相信，英文中的两个成语也是美国人的哲学：一是“Things may have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情况只有变坏之后才可能变好），这很大程度符合事情发展的辩证法，只有经过误解乃至摩擦双方才能更好地了解彼此，最终在新的平台上形成更为稳定的关系。二是“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如果你无法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美国是最承认实力的，这实力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美国最终会看到其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将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失败，然后可能就到了它改邪归正的时候了，这一天会到来，而且可能不会太久。

## 从“世纪之辩”到“世纪之变”

2011年前后，“阿拉伯之春”爆发，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当时，西方媒体一片欢呼声，宣布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的春天来临了。与此相反，我的判断截然不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现在考证下来，我是全世界最早作出这个预测的学者，至今引以为豪。英文维基百科在“阿拉伯之冬”词条下是这样表述的：2011年6月，中国的张维为教授与（“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进行了一场辩论，福山当时认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蔓延到中国，而张维为教授则率先预见了（“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体现了人们好像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四次。20年前开罗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五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的冬天’。严格地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会看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阿拉伯之春”很快就变成了血雨腥风的“阿拉伯之冬”：埃及的全面动荡、叙利亚的全面内战、利比亚的全面失控、也门的全面厮杀。我想“阿拉伯之冬”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全世界第一个作出准确的预测，这既是对自己的国家的尽责，也是对世界的尽责。我经常跟国内的朋友说，当时不少国人被来势汹汹的“阿拉伯之春”吓倒了，认为中国制度也岌岌可危，哪里还敢向西方政治话语亮剑？我经常跟欧洲人说，如果当初你们能够听取像我们这样中国学者的预判，你们也许就可以避免今天席卷欧洲的难民危机了，但现在已经晚了，你们只能自己去承担这场危机所带来的一切。我也经常对美国人说，不要再到处放火，一会儿“颜色革命”，一会儿“阿拉伯之春”，这叫害人害己，结果将一个比一个糟糕，你们驻利比亚的大使都惨死于“阿拉伯之冬”，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今天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雄心壮志。我们要通过自己对中国和世界扎实的研究

究，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千万不要满足于给西方学术当打工仔。我们应该花大功夫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世界，了解西方话语，进入西方话语，但进去之后一定要出来，否则是没有出息的，而走出西方话语就是海阔天空。总之，我们尊重西方，但绝不迷信西方，绝不迷信西方的智库，绝不迷信西方创造的指标体系。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创性的研究，绝不人云亦云，西方的东西只能是参考。以我比较熟悉的中国政治研究为例，多少西方政治学者，多少西方的智库，对中国政治作过准确的预测？我几乎找不到，我怎么尊重他们所做的学问？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提出能够影响中国和世界的观点和理论，中国学者和中国智库应该自信起来！

让我们回到那场“世纪之辩”。这场辩论发生在2011年6月，距今正好八年。我们可以简单回顾这场辩论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还在影响我们今天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它所涉及的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民主还是专制问题、问责制问题、中国和美国制度的未来问题、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问题、西方民主的未来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世界文化会不会趋同等问题，将会长期地影响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这场辩论的地点在上海文广大厦。福山先生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家，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the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当时《文汇报》和上海春秋研究院邀请他来，希望他谈谈国际秩序中新型经济体的作用，并和我进行一场对话。但他到了文广大厦休息室后对大家说，他要谈谈中国模式。坦率地说，我们有点儿惊讶，这跟我们原来给他的题目不完全吻合。这些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话语的渗透非常之深，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在与福山先生辩论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国学者与他的对话和讨论，恕我直言，那不是对话，而更像是“汇报工作”。我们一些学者关心的是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美国民主和法治水平。这种弱者心态使许多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在任何问题上都被看作专家，观点被广泛转载和引用。这种局面该走向终结了。我对在场的《文汇报》负责人轻轻地说了一句，“给他一点儿中国震撼吧”，当然，双方都保持了礼貌和互相尊重，但我们的观点分歧很大，辩论激烈但不失理性，应该说这场辩论已经成了中西方学者，就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进行理性对话和正面交锋的一个经典。

让我简单回顾一下那次辩论涉及的12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刚才已经讨论过的，中国是否会经历“阿拉伯之春”，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未来，这里就不重复了。

第二个问题同样尖锐，福山说他研究中国历史，觉得中国模式实际上是这样的：碰上个好皇帝这个朝代繁荣昌盛，碰上个坏皇帝这个朝代一蹶不振，他叫“坏皇帝问题”。我的回应是，即使退一万步，中国历史可以被简化为“好皇帝、坏皇帝问题”，那么中国至少有七个朝代的寿命都在250年以上，比美国历史都长，谁也不能保证美国和西方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然后我说，中国已经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解决了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中国领导人大都担任过两三任省委书记，治理过至少一亿人口。而且中国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像美国小布什当政后，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中国制度，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不会产生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第三个问题是“小布什问题”。我接过福山的“坏皇帝问题”，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所谓中国的“坏皇帝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步，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的产物，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我担心美国今后选出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非常认同我的这个预测，2017年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一点，下面掌声一片。

第四个是问责制问题。福山理解的问责制就是西方那样的每四年进行一次的大选。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我说我长期在西方生活，熟悉西方这种问责制，现在看来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真正的问责。我跟他说：中国现在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治制度。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超越了西方模式，因为西方模式有太多的问题，无法做到真正的问责。中国进行的政治试验，包括政治问责、经济问责、社会问责、法律问责等，比西方这个问责制的面要宽得多。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在上海市静安区，这个区不久前有一栋民居着火了，造成了不少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实际上这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个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出了事故。我们实行了问责制，有关的官员、有关公司的负责人都受到处理，被绳之以法。我说相比之

下，美国金融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我们这场辩论是2011年，整整三年过去了，现在又八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被问责，一笔糊涂账。而就因这笔糊涂账美国老百姓的财富平均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法治的。福山说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治。我说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也一直在学习西方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中国的眼光超出了西方法治模式。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金融大鳄，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将他们绳之以法，还以法治的名义给予他们上亿美元的奖金。为什么？因为这些华尔街大鳄几乎都签过合同，英文叫“golden handshake”——“黄金般的握手”，以吸引人才的名义，就是不管盈利不盈利，我离开你这个公司的时候这笔奖金都是要给的。这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公愤，但他们还是心安理得，奖金照拿。我告诉福山，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叫“天”，中国文化“敬天”。这个概念如果翻译成现代的政治话语，“天”就是民心向背，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核心的利益。我说我们认为我们99.9%的情况是严格照法律来办，但我们一定保留一个小小的空间，在涉及民心向背的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民整体与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会在不违反法治精神的前提下，作出政治决定，否则就可能是“法条主义”，治理中国这么一个100个欧洲普通国家规模之和的“文明型国家”，“法条主义”会出大问题。换言之，中国法治建设一定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的，美国今天的“法治”（rule of law）几乎已变成“律师治”（rule of lawyers），律师是按市场收费的，这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而且律师在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使美国国家治理的成本奇高，使许多必要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六个问题是“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在这个问题上我给他讲了“文明型国家”的观点，“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大周期，中国现在还处在这个大周期的上升阶段。西方学者和深受西方话语影响的人，预测中国老是出错误，就是因为他不懂“文明型国家”的大周期。我说，历史上，中国一个好的朝代怎么都持续250年、3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今天不能用朝代来形容，但中国人讲势，势一旦形成，即使有相反的浪花，相反的力量，也扭转不了这个大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中国今天还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第七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福山对毛泽东主席有颇多微词。我说你一定要了解中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至今对毛泽东主席仍然非常尊重，这一定是因为毛主席做对了很多事情。我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毛主席统一了这么大一个国家；二是

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国的农民今天是有土地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三是妇女解放，中国妇女地位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第八个是腐败问题。我说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历史眼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也就是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时候都经历过腐败增多的问题，因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监管，后来都是通过补短板，把监管这一块做上去，这就是中国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力度非常之大。福山认为只有西方模式才能遏制腐败，我说历史经验不能证明这一点。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亚洲四小龙”在初步完成现代化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采用了美式政治制度，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还是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来的模式。结果在治理腐败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要成功得多。我还讲了美国的第二代腐败。美国金融危机，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那是严重的金融腐败造成的。美国的监管公司搞“监管套利”，把许多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评定为最好的3A产品，向全世界兜售，害得全世界多少老百姓包括许多美国人倾家荡产。但美国不把这个叫作金融腐败，而是简单地称为“moral hazard”（道德风险），美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九个问题是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问题。福山认为中产阶层崛起必定带来民主化，因为中产阶层要求问责制，要求发表自己的声音，要求参政。我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实际上是最支持中国稳定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稳定和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

第十个问题是所谓的“文化趋同论”。福山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世界文化将越来越趋同，我说可能不是这样的。我提及了当时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中国人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在这首歌里都找到了感觉，觉得不管你多么忙，也要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歌在美国不会流行，因为中国人为家所愿意付出的远远超过美国人。我还说，中国的文化像八大菜系，美国的文化有点儿像麦当劳。麦当劳文化有其长处，值得中国借鉴，但不可能是八大菜系融入麦当劳，而是八大菜系怎么收编麦当劳的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涉及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明确表示，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难以解决“低智商民粹主义”问题，美国的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福山当时是这样回应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有一名言‘你可以在

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对于美国这样一种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人民有自由的言论权、评论权。从长期角度来说，人们最终还是会作出正确的抉择。”我当时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想：这个福山呀，有一点“简单天真”啊。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您很乐观，认为美国会吸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问题。”从2016年英国脱欧的公民投票和美国特朗普上台这些黑天鹅现象来看，西方民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金钱的卷入，新媒体的卷入，最终西方这种“低智商民粹主义”可能会毁掉西方的未来。至于林肯的表述，在哲学层面是对的，语言也是诗一般的，但现实很骨感，政治有许多维度，比方说，政治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还有成本维度。就好像说，你今天丢了手机，我可以安慰你：没关系，你的手机一定还在这个地球上。

第十二个问题就是讨论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我讲了一个很大的观点，我说从历史长河来看，我认为西方现在这种民主制度，即所谓“多党制+一人一票”，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两千四五百年前在古希腊有些很小的城邦，那里的男性公民有一人一票。最后这个所谓雅典民主也被斯巴达给打败了。之后的2000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一直是贬义词，相当于暴民政治，直到西方国家完成了现代化之后，一人一票才开始成为主流，美国是1965年才开始的一人一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开始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就差十几年，我们可以竞争的。我直白地对福山说，我认为不是历史终结论 (end of history)，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我想到了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1793年的时候派特使到中国，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会见了英国特使，乾隆皇帝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好的制度了，你们英国送一些雕虫小技的东西，我们大清帝国不屑一顾。后来历史证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运急剧下滑了。我说我觉得恐怕西方现在有点儿像中国的乾隆时期，正在明显地走下坡路。

以上12点，就是我们当时辩论的主要内容，八年过去了，大家可以作出初步的评判，谁的判断和预测更为靠谱。一些问题再等一些时间下定论也无妨，但我相信我的判断和预测是准确的。

# 后记

《这就是中国》于2019年1月7日在上海东方卫视开播，所受到的欢迎和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这就是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原创性理论研究，坚持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创新，我们能够赢得中西方的话语之争，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真正认同。

本书收集了《这就是中国》开播以来的27篇文稿，反映了我对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最新思考，其中部分内容进一步展开了我在“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论点。

这个节目是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观察者网的联合支持下，由观视频工作室与上海东方卫视联合制作的，所以我要由衷地感谢潘小礫研究员、王之宇编导和《观视频》整个团队，感谢金仲伟研究员和他的《观察者网》团队，感谢中国研究院的范勇鹏、陈平等研究员，感谢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袁雷副总裁、任静监制、高健导演、主持人何婕等。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节目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和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高韵斐的高度信任和坚定支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副总编辑姚映然和编辑贾忠贤等的辛勤付出。我还要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的理解和支持。

本书部分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8MZD024）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谨将此书献给所有新中国的奋斗者！

张维为

2019年8月1日

于淀山湖畔